

中共党史资料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

皖南事变和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纪念南五会议的军事谈判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

5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发展变化

桂北四清时期的陶铸

动荡的中苏关系(1942-194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69

总第六十九辑

1999年3月出版

0101911

D239
6: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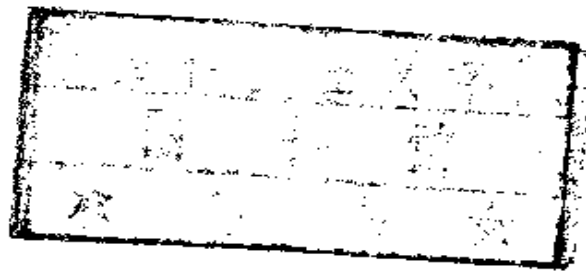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201019110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北京

主 编:李海文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

文献编辑:罗一恒

责任编辑:陈 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69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3
ISBN 7 80136-263-2

I. 中… II. ①中… ②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N. 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4809号

中 共 党 史 资 料 (69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北门10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京通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7.125印张 160千字

1999年3月北京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ISBN 7-80136-263-2/K·229

定 价:10.00元

D49431

目 录

文献资料

-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 (1)

回忆录

- 皖南事变和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陈舜瑶(14)
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 雷英夫(56)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穆欣(63)

专题资料

- 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 李良志(95)
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
访问延安始末 袁武振(106)
建国初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演变
及中央人民政府调整的原因 李格(124)
5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发展
变化 郁曼飞 林晓光(137)

人物介绍

- 桂北四清时期的陶铸 张汉青(160)
秦邦宪青年时代的一首诗作 周国昌(179)

会议介绍

- 扭转东北战局的“七道江会议”
..... 洪英莲 白玉武 于晓航(184)

史实考证

- 一张护照的来历 杨德修(191)
入党誓词演变考 薄金花(194)

译文选登

- 动荡的中苏关系(1942—1944)
..... [俄]A. C. 潘友新著 峦景和译(198)
- 新书选介 (222)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 任务的意见书

《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一项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交来的若干补充材料，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作了研究，兹对上述文件提出如下意见。

文件中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文件中提出的五年任务是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有的巨大成就为依据的，这些任务既符合于中国人民的根本需要，也符合于加强民主阵营力量的利益。

为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首先需要发展工业和建立中国自己的重工业。

目前中国工业大部分主要产品均已超过中国解放前达到的最高水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了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很高的速度。然而，我们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十点四，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百分之二十四，都是过高的。

要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业生产，就要建设和掌握新企业与改建现有企业，而不仅是要恢复原有工业，无疑的，这将会降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由于熟练工人和工程

技术人员不足,工业增长的速度和先进技术的掌握必然要受到限制。此外,预定要在五年内建设起来并开工生产的许多矿山企业,还没有获得经周密勘察而得出的可靠地质资源。因此,个别企业开始建设的期限就要更加推迟,以致要缩小这五年中的产品生产规模,从而也就要降低预定的工业增长速度。

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有鉴于此,并为必须无条件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起见,我们认为,以更谨慎的态度来确定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同时并建议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量的每年增长速度由百分之二十点四大体上改为百分之十四至十五。

如在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有足以扩大工业生产的额外后备力量时,则可在编制各年度计划时把它们估计进去,因为各年度计划不仅要完成而且要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

在矿山工业方面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加强地质勘察工作,同时,按五年计划进行的勘察工作,不仅要发现供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使用的原料资源,而且要发现供以后几年建设企业用的原料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为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工业人才,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指导手工业的发展,供给其原料,

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中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并提高其商品率,应设法以农具和矿物肥料供应农业。必须保证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并特别注意把农民生产的产品更大量地纳入商品流通之中,尤其是在目前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地区,以及因交通不便而与国内工业区缺乏联系的地区。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保证日用工业品源源不断地从城市流入农村。中国农村在进行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要利用农村中大量人力来增加农业生产并提高其商品率,就需要在全国各省组织小型工厂来大力发展简单农具的生产。

为了建立重工业,开发中国天然富源,发展农业,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增强国防力量,以及加强中苏两国的联系,在五年计划中拟定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是完全正确的。在五年计划中还必须规定若干措施以改善现有线路和车辆的利用,发展水路交通并改善船只的使用。

应当指出: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可是,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巩固国家财政,并在发展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巩固金融。有鉴于此,在五年计划中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

面的措施。

草案中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培养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作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

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必须补作一些在提出的材料中所缺少的各种计算，特别是各种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计算（物资平衡），逐年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资量，必须确定投资拨款和保证进行建设所需物资的来源；还必须作出五年计划时期提高农产品收获量和商品率的计算以及商品流转和财政计划的各种计算。

对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我们认为必须提出以下意见：

地质勘察工作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函件，尚缺少按苏联通行的 A、B、C₁ 分级法勘察确定的、为设计、建设新工业企业和扩大现有工业企业所必需的、为黑色、有色冶金工业、煤炭和化学工业供应矿物的若干矿区的藏量。

例如，在预定建设的四个冶金联合工厂中，大冶和包头两个联合工厂的建设是最有根据的。但是就以这两个联合工厂来说，在下定建设的最后决心之前，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认真的地质工作，以便确定已勘察出的铁矿藏量。

在矿物原料未经勘察的基地上建设企业，会招致得

不偿失的结果，并且使得不能集中资金去完成首要任务。

因此，目前应当加强地质勘察工作，查明预定建设地区的确实可靠的矿源。然后再去确定企业建设的期限问题。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查明已勘察过的煤炭和铜矿矿源的任务是适当的。预计增加勘察铁矿和石油藏量的任务，应再加以审查，因为它们没有为设计中的钻探工作量给以保证。

草案中没有定出勘察炼焦煤的任务，也没有规定勘察锰矿的任务，而这对发展黑色冶金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在勘察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铜矿除外）的藏量，以及在勘察化学工业所必需的主要原料的藏量方面，也都没有规定出任务来。

为了保证黑色冶金工业企业的需要起见，建议规定一项任务，就是在五年计划期间要增加勘察炼焦煤和锰矿的藏量。最好也规定出五年内增加勘察铅、锌、钼、钨、锡、锑、水银和铝矿藏量的任务，以及查明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所必需的主要矿物原料和冶金工业所必需的非矿物原料的任务。

为了更合理地使用中国为数不多的现有地质工作干部和设备，地质勘察工作应集中在预定建设企业的地区进行，以查明发展黑色、有色冶金工业、煤炭、石油、化学以及建筑材料工业所必需的矿物之已经勘察出的藏量。

为了正确估计中国矿物原料资源的状况，建议重新估计关于著名矿区的全部地质资料，首先是预定建设企

业地区的这种资料,同时建议组织矿物统计工作,并在地质勘察工作中采用苏联通行的矿物藏量分级法。

黑色冶金工业方面。预计在五年内开始出铁的十二座高炉中,最有实际可能的有九座,其中:六座在鞍山冶金联合工厂,两座在本溪,一座在大渡口。

其余分属两个新联合工厂的三座高炉,其建设期限,要等到该两厂所在地区必要的铁矿藏量勘察清楚后才能最后决定。

由此而来的生铁减产情况,是不会影响钢产计划的,因为计划中规定的生铁产量比实际需要量多得多。

有色冶金工业方面。关于原料蕴藏的现有地质资料,仅可供解决能否建设和改建下述各有色冶金企业的问题:扩大个旧的锡联合工厂,扩大杨家杖子的钨矿,改建热河省钛钒矿,抚顺制铝厂第二期建设,建设一个硬质合金工厂,扩大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工厂,恢复江西的制镁工厂并在该省开建一个钨矿(包括一个选矿厂)。

其余为保证预定的有色金属生产水平所必需的企业,主要是炼铜、制铅、制锌企业,我们认为在建设之先,必须对预定建设地区的矿源再作进一步研究,并与此联系地,结合动力资源和水利资源对这些企业的规模和布局问题加以研究。

至于东川和白银厂两矿区的冶铜联合工厂,则只有确实知道矿源勘察数字之后才能动工建设。

吉林的制锌厂也是如此。

煤炭工业方面。计划规定,必须改进五年计划开始时

已有的各矿井中设备能力的利用,以大大提高采煤量,我们认为这个规定是正确的。

一九五三年年初正在建设中的矿井和露天煤矿有十九对,年产煤一千四百五十万吨;规定在一九五三年动工建设的矿井有六对,年产煤四百万吨,其中在设计上有保证的矿井只有三对,年产量约为二百万吨,到一九五七年才能出煤。

这样,可以指望五年内将有年产量约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煤的若干新井可以开始出煤。按照通常掌握新井设备的程度来看,这些矿井所能增加的采煤量,大约将是九百万吨,而不是原定计划的一千五百万吨。

因此,计划规定的九千三百八十万吨的采煤量,还应当减少一些。

计划中预定建设一百零七对新矿井。在提出来研究的年产量为五千三百七十万吨的四十四对大矿井中,现在只有总年产量约为两千万吨的八对矿井和一个露天煤矿有地质资料,其余年产量共为二千三百三十万吨的六十三对矿井完全没有地质资料。

由于新矿井的建设目前没有地质资料的保证,除上述建议外,我们认为,最好看地质资料准备得如何,各矿区肯定的煤炭的工业藏量如何,在年度计划中再来考虑这些矿井的数量及其建设的期限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需要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要特别注意地质勘察工作,首先对于五年内要设计和开始建设的矿区,以及在增加勘察炼焦煤藏量方面,必

需进行周密的勘察；

根据必须最大限度缩短煤的运输线的原则，重新订正新矿井的地区分布；

重新订正新矿井出煤期限，使之与工业企业开工期限和铁路通车期限相适应。

石油工业方面。甘肃和陕西两省采油区是经过多次研究的，其预计发展计划是正确的。可是，在这些地区，必须仔细检查 A+B 级的石油藏量，因为这些地区将成为今后石油工业发展的基地。

在增加勘察石油藏量到十一亿吨的预计总数中，应当除去“C”级勘察量，因为这一级勘察量不能作为建设采油、炼油企业的根据。A+B 级的勘察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函件，在五年终了时将为六亿二千万吨，但根据预计的钻探工作量，我们认为这是规定得太高了。因此，应当根据预计的钻探工作量来规定增加勘察石油藏量的任务。

恢复抚顺及其他工厂以煤和油页岩为原料的人造液体燃料的生产，使之达到年产三十万吨液体燃料的产量，这是适当的。

这五年内在兰州建设的石油加工工厂，其生产能力应从每年炼油三百万吨改为一百万吨。

为了准备开采老君庙地区的石油，使之当兰州石油加工工厂开工时足以保证其全部需要，必须首先完成足够数量的采油井，以便石油加工工厂开工时开始使用。

对现有各石油加工工厂较原定处理量增加处理原油

量可能性的问题,也应该加以考虑。

电站方面。根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速度方面的意见看来,电力的需要是会减少一些。因此,电站的建设计划必须根据电力的需要情况来确定。

我们认为规定首先扩建、改建现有的火力电站和丰满水电站,是正确的,因为这可以保证最迅速地增加电力。

在今后制定五年计划时,应当特别注意各个地区电力系统发展的计划,以便保证电站的发电能力和现有工业企业的发展以及新工业企业的建设完全协调。

最好还制定一项建设高压送电网和变电站的计划。

黄河水力资源的利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巨大的国民经济的意义,但实现起来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技术问题,特别是由于水流速度极大,而水库又有迅速被泥沙淤满的危险。

苏联在设计大河上的巨大水电站时,首先要作出这些河流水力资源的综合利用设计图,然后才根据地质、地形以及其他各种条件正确地布置电站和其他水利工程,才能确定调整水流和在各经济部门之间分配水源的适当程度,也才能确定各水电站的建设顺序。在与编制这种综合利用设计图的同时,就要考虑到将来利用这些水电站所发电力的工业发展的问题。黄河也必须有这样—个综合利用设计图,在编制这种设计图时,可以利用一切过去积累的勘测资料。

因此,关于在这条河上建设第一批水电站的期限问题,最好当总的综合利用设计图作好以后再作决定。

资水和桓仁两个水电站的建设问题,也应该采取这种办法解决。

机器制造工业方面。在机器制造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是设立若干机器制造厂,并且掌握蒸汽透平、发电机、配有发电机的水力透平、变压器、电缆制品、电动机、金属切削机床,冶金设备、矿山、化工设备和汽车的生产。

应当特别注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机器配件的生产,以便为装配设备保证各种半制品、部件和制成品。首先必须发展为机器制造工业所需的大型锻压设备和大型钢铁翻砂设备的生产,发展电木、磁器、陶器、电机用钢、绝缘材料、汽车发火装置和汽化器、橡胶制品、照明装置、量具和矿井支架的生产。

与改建现有企业之同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内应当建设若干新的机器制造厂并使之开工,首先是:

哈尔滨透平制造厂,总生产能力为每年三十六万瓩,并且以后可能扩充到每年六十万瓩;

西安电气器材和水银整流器制造厂,每年生产高压开关达二万六千套和水银整流器达二十五万瓩;

西安静电电容器制造厂,生产能力为一百万无功千伏安,而不是原定的三十五万无功千伏安;

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制造厂,生产能力为每年四万吨各型机械制品;矿山设备制造厂,生产能力为每年一万五千吨到两万吨,一九五八年开工生产;

重庆汽车制造厂(第一期);

西安滚珠轴承制造厂,年产一千万套滚珠。

此外,为提前出产拖拉机起见,不必建设一个年产四万台的,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才能出货的拖拉机制造厂,而最好建设一个年产一万五千台的拖拉机制造厂。

化学工业方面。在所提供的材料里,没有各经济部门对化学产品需要的材料。因此建议根据需要化学产品的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军事工业的需要,来重新审查化学工业的生产规模。

最好在炼焦工厂组织硫酸铵的生产,因为我们认为在利用合成氨的化学工厂制造硫酸铵是不合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供的关于已勘察出来的化学工业原料的藏量资料,不能说明依靠建设新厂就可以把化学产品的生产提高到预计的水平。建议最好首先确定勘察出来的原料藏量,然后再解决建设化学工厂的厂址问题,首先是建设硫酸和纯碱制造厂的厂址问题。

我们认为建设一个利用石油加工工厂废气进行生产的、年产一万五千至两万吨橡胶的工厂和两个氮肥工厂是正确的。

建筑材料工业方面。为保证预定的水泥生产并保证在水泥工厂的建设中建立储备起见,必需改建现有工厂并改进其工作,以及恢复曾被破坏的五个共年产八十万吨水泥的工厂和建设五个共年产七十万吨水泥的工厂。建议确实查明水泥原料藏量,确定将为新厂安装的设备(水泥焙烧炉)的形式,并根据各地区对水泥的需要,确定

新厂生产能力及其厂址。

关于投资的增加速度和建筑工业。基本建设的规模是应当根据生产增长速度、经费来源和金属平衡情况来规定的。

为保证建筑计划的执行，必须规定在大规模建设的地区建立部门性和区域性的专门建筑组织，同时要有固定的熟练建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完成一般建筑工程（石造，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等等）和完成各种专门工程（电气安装，暖气、通风设备、上下水道安装等等）。

最好规定在各工业部和建筑工程部中扩充和建立新的设计机构，并且创办和扩大训练建筑设计人员的学校，为这些机构供给熟练干部。

关于劳动与干部问题。在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交来的补充材料里，没有提出关于整个国民经济和各个部门对专家和熟练工人的需要数量的方案，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来源的计算。上述材料中也没有作出一项劳动计划，而没有这种计划要有根据地规定培养专家和熟练工人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因此，建议在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时，必需作出一项劳动计划，其中应规定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充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数量的任务，并规定平均工资和工资总额。

在拟定培养专家的计划时，必须使专家的培养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专家的需要协调起来。

在五年计划的材料里，曾规定学校毕业出来的工程师为十三万二千人，而技师为十六万到十八万人。必须修改培养工程师与技师的这一比例，使工业和建筑业中的技师对工程师的比例更为扩大。中等技术学校的招生人数必须较预定计划加以扩大。

因为高等学校预定的招生人数超过了中学毕业生人数，所以在五年中，特别是在五年计划头几年，必须规定开办各种准备升入高等学校的短期训练班和类似苏联从前附设在高等学校里的工人预备学校那样的中等学校。

在规定培养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所需要的熟练工人的任务时，最好采取在企业中以及在短期训练班中把现有各种手工业人才加以个别的和小组的训练的办法，把他们利用起来。

苏联的经验证明，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为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范围之间保持必要的比例，就需要有更精确的根据和各种经济计算。同时，鉴于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解决的许多重要问题尚未能加以充分研究，所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草案还必须进行很大的研究工作。

皖南事变和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陈 舜 瑶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当局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规模最大、持续最长、最剧烈、最复杂的一次，要数皖南事变。党中央领导全党胜利地击败了国民党的进攻。周恩来在重庆直接指挥了政治大反攻，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展示了他的党性、才能和领导艺术。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深刻生动的范例，是毛泽东策略思想的灵活运用和白色恐怖下党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也是惊心动魄的一堂党课。

我曾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过，亲身经历了这场斗争，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读到一些书刊新披露的有关皖南事变前后的档案资料和当年南方局同志的回忆录，深受启发，引起我重新回忆和学习这段历史，学习周恩来的思想、品德和领导艺术。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分为三个阶段：一、反共高潮的开端，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下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限期调到黄河以北到1941年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番号，审判新四军军长叶挺；二、反共高潮的顶峰，1月17日反动命令的发表到3月2日第二届参政会开幕；三、蒋介石参政会退兵一战到会蒋约见周恩

来,形势暂告缓和。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蒋介石说过:他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为形势所迫,联共抗日,仍企图在抗战中伺机消灭共产党。1939年他在华北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武装斗争中得不到的,他又企图在谈判中取得。1940年6月、8月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必须限期调到老黄河以北,并且以军令相胁迫。周恩来洞察他的险恶用心,欲驱逐八路军、新四军到河北,再构筑封锁线,伺机与日寇南北夹击,全部消灭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于是断然予以拒绝,并且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队的动态。9月初,得到确实情报,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发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周恩来立即报告中央,蒋介石即将在华中发动反共高潮了。

国民党当局敢于悍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包含皖南事变)是与国内国际的情况紧密相关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第二年,德、意相继在欧洲发动战争,而且不断扩大,法国投降后,德军锋芒又指向英国。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由此帝国主义国家分成了两条阵线。德国劝中国与日本尽快结束战争,以便日本分兵南下,攻击英、美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英、美则希望中国能牵制日本,不使南下。为此,英国重开滇缅公路,运输援蒋物资。美国也答应给国民党

政府巨额贷款和飞机。蒋介石感到左右逢源，兴高采烈。他一面派亲英美派、亲苏派、亲德派、亲日派四出活动，同时自己居中，以“剿共”来运作。他以为，日本对他“剿共”一定坐山观虎斗，英美正有求于他，必不会出来干涉，因此利用这个机会，放胆地调兵遣将，包围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毛泽东估计长江南北将有较大规模的武装摩擦，一再指示新四军要准备自卫，尤其是处境不利的皖南部队和军部要北移渡江或者到江苏南部。但项英强调北移困难，“以军部所在地为基点较有利”。

9月底，反共高潮拉开序幕，江苏韩德勤部向陈毅所部发动进攻，想乘陈毅渡江立足未稳，攻取江北阵地，然后在南边一压，皖南部队就进退无路了。陈毅按中央方针，先退避三舍，退到黄桥一个反击，消灭韩德勤两个师。周恩来建议，不乘胜全歼，而是与他们谈判，既显示我们顾全大局、团结抗日的诚意，又起到牵制作用。若何应钦等在江南动手，我们便将消灭韩部。

蒋介石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首战遭到失败，“捏着鼻子不作声”。周恩来料定，蒋介石决不甘心罢休，必然要报复。

江北打响，毛泽东急电项英“速速渡，绝对不要再迟延”。又嘱“军部如不走，就要做好准备，蒋军进攻时突围”。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发出命令（“皓电”），借口统一军令，要求八路

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撤到老黄河以北。“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打日寇，专门吞并友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自由扩军，以及破坏行政系统等等。国民党当局开动宣传机器，人造舆论，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了。

周恩来认为“皓电”表示“蒋的决心已下，是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随即电告叶挺、项英，“蒋、何逼我渡江的决定决不会取消。急需抢渡一部，并可以对顾祝同表示，如相逼太甚，背水之军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威慑他便于我转移和分散。10月20日周恩来再电毛泽东，“反共高潮正着着上升”，“蒋介石整个计划大意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第一步以切断我在大江南北及苏皖的联系，第二步恐为进攻”。10月29日又电中央，“国民党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我们应准备自卫，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要转入地下。

毛泽东分析皖电后的局势，认为有两种可能，须作好两手准备。首先“是投降日本，这种可能性较大，因为日本对蒋压力大，引力也大，他可以退出一部分地区，由蒋代为镇压抗日运动。其次是加入英美集团，放弃独立自主的抗战，作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三是拖”。反共内战是为投降或加入英美集团肃清道路。时局极严峻。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

的。”同时又指出：“蒋介石全面投降破裂的决心也不易下，也存在着阻止投降、内战的因素：一、中共；二、人民（包括中间派乃至国民党尚不愿投降的将领）；三、苏联。三种力量配合得好，时局仍有好转可能，时间还来得及，因此，应动员全国反投降内战运动，争取每一个可能的中间派，同时作最坏的准备，如此便可避免陈独秀的覆辙了。”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要争取每一个可能争取的中间派，利用一切矛盾动摇蒋介石剿共的决心，并且要“准备蒋介石和我们破裂”。

怎样对付这样严峻的局势呢？最初，毛泽东提出两个方案和周恩来商量。一是政治军事都采取攻势，即“炸弹宣言”加“兵谏出师”，针对“皓电”发出尖锐、强硬对立的“宣言”，并从八路军中抽几万精兵，打入国民党军的后方，打几个胜仗，蒋介石是只怕实力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遏止蒋介石的进攻，我军事上取得主动，不至于被他封锁死；缺点是广大群众不了解，对我在政治上不利。二是军事抵抗，政治进攻。毛泽东就此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并且说：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期，故须紧张地应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

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应做好两手准备的分析，主张一切布置以最危险、最困难的可能性为出发点。周恩来和南方局分管组织工作的博古提出：“为准备蒋破裂，‘炸弹宣言’缓发，以免打草惊

蛇,使各方受到不可避免的袭击,也便于此间争取避免破裂的最后可能。”国民党地区党组织要争取时间撤退、隐蔽。周恩来认为“皓电”我们决不能同意,但是须要答复。他们这次是以政府军令名义形式,与以往地方摩擦、冲突不同。周恩来、叶剑英遍访中间派代表性人物,大家都感到形势严重,为中共担忧。只个别进步人士认为应当抵抗,绝大多数害怕分裂,劝我让步。周恩来转达了冯玉祥出于爱国的建议:“中共可以表面服从,实际自干,软硬兼施。”这样他和孙科等人便可以向蒋进言,从中斡旋。

苏皖是中共长江南北联系的重地,经济较发达地区,邻近沪杭宁三角地带,又是蒋介石必争的地方。1939年周恩来曾亲自到新四军考察,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得到中央批准。陈毅等7月渡江,便取得主动,而军部局促于皖南一隅,处蒋军包围之中,很难生存发展,不如集中江北,以加强我江北的阵地。周恩来认为这样政治上、军事上都较为有利。11月2日,周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潘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认为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能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周恩来将潘的意见报告中央。中央反复衡量军事、政治得失,决定缓发“炸弹宣言”,改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抵抗,江南让一步,争取中间派。毛泽东把这个方针概括为几句话:缓和以争取同情,抵抗以保存实力,软给蒋以面子,硬给他以畏惧。软硬兼施,缺一不可。这样才能打破蒋的诡计,制何的进攻、争取中间向我。根据这方针,毛泽东草拟了复电,以朱德、彭德怀、叶挺、

项英名义于11月9日发出，通常称“佳电”。

“佳电”与“皓电”针锋相对，驳斥了种种无理责难，提出我们的严正主张，是打退此次反共高潮开始阶段的核心文件。

“佳电”说明我军一切行动都不违反国策命令（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原则、蒋之文告等），都是合乎敌后实情和民心、人情的。不言而喻，国民党当局把八路军新四军都赶到老黄河以北的命令是不利抗战，不合国策，有悖人情事理的。虽然如此，我们为顾全团结抗日大局，还是隐忍退让，将江南新四军主力北移，这篇电文讲道理有说服力，文词也委婉感人，许多中间派人土读了都深表同情。

“佳电”对蒋介石是软硬兼施，给面子，也给以威慑。如说战士深怕调离后，重演平江惨案、确山惨案，暗指第一次反共高潮。江南主力北移，让他一步，江北部队暂时请求免调，说“暂时”是给蒋面子，说“免调”是塞他幻想。说鹬蚌渔人是暗指他若进攻，我必自卫。最后一段点出有人煽动反共高潮，目的是为破裂投降铺路，陷中国于分崩离析、统帅身败名裂的境地。希望蒋明确团结抗日方针，改善各方面工作，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抗战胜利。这是“国家民族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的大事，不是只关乎两党和军队防区问题。这里把蒋与亲日派加以区别对待，痛陈利害，争取他留在抗日阵营。“佳电”即使中间派看到中共仁至义尽，也使蒋、何明白中共决非软弱可欺。“佳电”对“皓电”是有力的政治反击，也为以后转为政

治反攻作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

11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对时局的估计逐渐有变化，从部分电报中可以看到：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中日妥协和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是严重地存在着。”但是毛泽东得知11月30日日本同汪精卫集团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并正式承认汪政权，就认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从此有转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在蒋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原来很担心蒋为加入英美阵线，以剿共来肃清道路。10月12日曾电项英：“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的可能”，但11月6日看到周恩来一个重要情报后，想法大大改变，“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派亲德派活动。根据3日情报（——指周三日重要情报）如能由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周恩来报的这份重要情报在《皖南事变》和《周恩来年谱》中都查不到，也不能妄加猜测。毛泽东在法国贝当投降后，就认识到，应把英美政策在东方慕尼黑时期与德意日三国联盟后加以区别，英美以前的政策是以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三国同盟后，英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南下，因此要援蒋抗日。而内战则不能抗日，我

们可以利用英美与日的矛盾和蒋对英美的依赖来遏制蒋降日内战。

——蒋内外不稳，危机空前。国民党内民主派反对内战，胡宗南、阎锡山等驻西北、华北的将领对华中剿共也不感兴趣。白崇禧也软下来，经济政治各方面困难重重，“佳电”以后，广大中间势力反对内战，同情中共。

——蒋对进攻新四军有种种困难，我取缓和态度，进攻没了借口；蒋怕八路军南下，尤怕我从西安突出；怕我皖南部队不动，扰其后方；怕我消灭韩德勤，蒋未与日本真正讲好条件前，剿共战场是不方便的。如我各方工作做得好（皖南让步、华中自卫、全国反投降内战运动、争取中间），这次反共高潮可能打退。蒋决不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仍须防备。

综合以上各点，从11月下旬起毛泽东认为蒋介石一切办法都是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可能有局部进攻，是攻势防御，决非战略攻势。毛泽东甚至预计规模会比第一次反共高潮小，但要求这不向下传达，以免下面松懈。中间派被蒋吓倒了，要求我让步，要善为解释。

基于以上估计，毛泽东10月间曾令叶挺、项英速速渡江，决不可迟疑。11月下旬却叫他们再拖个把月，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时间还来得及。毛泽东一面叫叶挺、项英尽快作好北移准备，同时叫周恩来、叶剑英加紧与蒋介石、何应钦交涉，要求缓期（“皓电”原定须11月20日以前撤毕），并发给被何应钦无理扣发的11月军

饷,指定北移路线,保证安全通过。周向中央报告顾祝同指定的路线时说“靠不住”,仍以走苏南为好,毛泽东告叶、项按周恩来的意见北移,并说:“你们北移让他(蒋)一步,从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不会为难你们的。蒋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障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蒋有手令缓期到12月底前移完)

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在华东进攻必不可免,反共高潮仍在发展,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但是否全面破裂,就要看国际国内的变化了。他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作坏转准备,高度警惕地注意着国民党当局的动态。他组织各办事处和上层统战人员,不放松政治进攻,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宣传,充分利用“佳电”这有力武器,广泛争取中间派的同情,不放过每一个可能争取的对象。

组织上抓紧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转入地下,撤退暴露的党员干部,组织两个秘密的领导机关,一旦重庆办事处被封,就可代替南方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建立了备用的秘密电台,还准备了一条撤退的秘密通道。

周恩来依他的预见,下了两步棋。12月23日他会晤美国进步记者斯特朗,约她长谈数次,把这次反共高潮的来龙去脉详细告诉她,并将一组材料委托她带回美国,在适当时期由周恩来通知她在报刊公开发表,预言即将发生更大反共事件和战争。叮嘱她:“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

早地暴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后又对斯诺作了同样部署。

周恩来在11月17日、22日两次向中央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动作未停,且企图由西而东、由北而南造成半包围圈,蒋介石也未约谈,据此建议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

12月25日“圣诞节”,蒋介石忽然约见周恩来,以动感情的神情,大谈四年前患难交情(指西安事变),并说中共领导的部队如撤到老黄河北,可以影响全国,将大有作为,不撤他就要打,断定中共必然失败。他许诺只要新四军肯撤走,他保证通行无阻,只要肯开过河北,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立即警惕蒋“大灌米汤”,“其中必有文章”,在压、吓之外,又加上“哄”的一着了(即动手前麻痹我)。蒋的许诺“靠不住”,周连夜以特电详报中央。

毛泽东12月26日急电叶挺、项英,严厉批评项英一再强调困难,犹豫不决,自己无决心,无办法,在敌顽夹击下,是很危险的。不要对国民党存幻想,不要靠他们帮助任何东西。要估计到移动中可能遇到攻击,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必须把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

一周后,项英等率部仓猝移动,陷入重围。6日顽军猛攻。叶挺血战苦撑,急电中央求救。他得到中央批准,去上官云相处交涉,被上官诱、骗扣押。新四军军部与七八倍于己的顽军激战七昼夜后,伤、亡、被俘七千余人,除傅秋涛部千余人外全军覆没。

在激战最危急时，毛泽东电周恩来、叶剑英火速与蒋介石交涉，令顾祝同撤围放行。13日军令部刘为章答复：已经向顾祝同下达蒋的指示停战放行，并假意说：中共应令新四军渡江后即北上，不得逗留，也不得进攻韩德勤，周恩来用电话质询顾祝同时，他竟推说，三战区与新四军电话联络中断，战斗已停，不知叶挺、项英在何处？他们已歼灭了新四军，却故作不知，来掩盖罪责，阴险诡诈竟到了这地步。

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谋划到消灭新四军军部，蒋、何、顾玩尽了两面手法和压、吓、哄的伎俩，一面下达军令，迫我军限期北撤；另一方面下达密令给顾祝同，要“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他们调兵遣将，大造舆论，撤销桂林办事处，如此等等，都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对我施压威吓。动手前加上哄，保证通行，但顾祝同指定的路线，是诱新四军自投罗网。待我军启行，他们竟公开在报纸上透露消息，使日寇乘机沿江堵截。他们放过先期渡江的辎重家属，拦截后行的军部。临发动攻击前，用“哄”麻痹我们，进攻得手后，又当面撒谎，掩盖罪责。何等狠毒！

毛泽东曾认为蒋日决裂，大局有转机，因此，“从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项、叶）的”，蒋未投降，就不可能大举进攻，两面作战。况且我让一步，深得中间派同情，他们若攻击遵令北移的部队，便暴露了所谓“统一军令”，实际上是消灭异己，政治上于彼大不利。而且八路军决不会坐视，军事上蒋也不能不考虑，蒋是精于计算的。因此，“从大势上判断”，他不会为难北移的军部。同时毛

泽东也提醒仍要警惕。但是蒋介石、何应钦要消灭新四军，蓄谋已久，自恃军力上占优势，决不放过他认为难得的机会，削弱中共的力量。至于是否全面破裂，还要看国际国内的反应和变化，他明知消灭抗日有功部队，必招人民反对，而他的投机性却不惜冒险一赌。蒋也不是全无顾虑，在宣布新四军叛变时，不点中共和八路军，留有回旋余地，把消灭新四军军部只说是局部问题，军事问题。

1月17日蒋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番号。毛泽东随即通知各地，情况变了，“前一段估计不适用了”。

反共高潮的顶峰

周恩来1月11日得知新四军军部惨遭蒋军围歼后，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局势和斗争方针，采取应变的紧急措施。

毛泽东1月15日急告周恩来，政治上要发动猛烈的、坚决的、全面的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蒋的进攻，唯如此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和进攻，“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要准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革命委员会通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通缉项英。这反动命令第二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检查官已坐在新华日报馆监视。

周恩来无比愤恨地在电话中斥责何应钦：“你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镇定地部署政治反击和准备应付国

民党军警突然袭击南方局机关，首先动员和组织机关的全体同志应变。

当晚，在红岩召开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开会，周恩来沉痛地讲了皖南事变经过情况，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他分析时局发展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另一种可能是打退蒋、何的猖狂进攻，争取继续合作抗日。我们虽然损失了一个新四军军部，可我们还有几万新四军，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蒋介石要完全投降必须考虑这点。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亲日派大资产阶级还有矛盾，蒋介石要全面反共就要完全投降，但英美要他牵制日本，不同意他降日，所以蒋既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但不愿破裂，不然我们就要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还是要力争继续合作抗日，但也要充分准备他全面破裂。就是他不敢全面破裂，我们也要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他袭击我们南方局机关，主要是要搞我们党的机密：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因此，必要时我们也要进行适当的抵抗，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我要出面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国民党把我们全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组织的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

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周恩来。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好好保养身体。国民党也有可能不杀我们，但也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要学习先烈，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我们现在的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员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些同志，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是铭心刻骨的一夜！这是毕生难忘的一夜！我们沉痛地哀悼和深切怀念伤、亡、被俘的七千余战友。他们中间有来自八省，曾在丛林岩穴中苦斗三年的老游击战士，有苏皖众多工农，有全国各省救亡学生运动的精英，有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还有大革命时期铁军、“八一”打第一枪的领导者。红岩还留有叶挺将军和新四军一些同志的足迹。而今他们或身陷囹圄，或血染茂林，被俘的遭到惨绝人寰的蹂躏。皖南事变全过程证明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对人民是怎样地仇恨残忍，是怎样地阴险诡诈！这怎不令人怒火冲天！我们要将满腔怒火熔铸出钢铁心志，和他们斗争到底。我是学生出身的青年，虽然见过大刀水龙，但面临这样严酷的阶级斗争大世面还是第一次，这真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教育课！

嘉陵江畔小楼上，窄窄楼道里，聚集着百余共产党员。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坐在我们对面，周恩来站在我们中间。我们屏息静听他讲话，完全明白处境是何等艰险，从

心灵深处感到外面夜黑雾重，春寒彻骨。红岩是被重重包围的孤岛，一旦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军警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我们要准备牺牲，甚至全体牺牲。这悲壮激烈的情景，真仿佛“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但是我们不是悲哀地相互告别，不是为哪个人慷慨赴死，我们是为打退国民党当局的猖狂进攻而临战誓师。不管有多大艰险，我们不放过最后的可能性，一定要打退反共高潮。

这夜使我想起来在延安上党课，教员讲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教员反复叮咛，党员在生死关头，必须坚持立场，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再不能回到党员队伍中来了。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明白：今天已不是当年了，我们党更成熟了，我们有中央的坚强领导，全国有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根据地，有国统区的朋友和群众，有广大人民环卫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孤岛并不孤。此时此刻，我们懂得了、体味到了应该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不但先烈的事迹教育着我们，眼前这些领导同志的经历都是生动的教材。周、叶、董、邓二三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有多少次出生入死？有多少次与亲人生离死别？就说钱瑛同志吧，她为革命不肯生育，丈夫牺牲得早，从此孤身一人，革命工作就是一切。坐牢不屈，党营救出狱，就又投入危险的地下领导工作，谁能想出那瘦小身躯中藏着何等刚强意志！他们个个是千锤百炼、万死千伤幸存的党的精英，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我们这些革命队伍的新兵有何话说？有

什么个人的问题放不下？不可否认，各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有的同志儿女幼小，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也得随父母坐牢吗？有的同志的亲人远在前方或延安，暂别会成为永诀吗？但是，想想党的危急，比比他们，就轮不上想这些、顾不上管这些了。如果全体牺牲，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们，我们只有学着他们的榜样干，听他们的指挥上。周恩来话音刚落，一位同志激动地站起来，恳切请求组织把他留在红岩，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他代表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但是大家明白，有许多紧急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时间不允许一一表态，那就把誓言藏在心中，看以后的行动吧。

会后，南方局领导同志有条不紊地紧急部署工作，主要是发动政治反攻。当务之急是对付坐在新华日报馆里的新闻检查官。同时，要准备办事处被突然袭击，要想一切办法哪怕抵挡几分钟，焚毁机密文件。只要能保住党的机密，要杀要捕就随他们了。

在国民党政府反动命令发布的次日凌晨，在国统区的核心——重庆，爆炸了第一颗重型炸弹——特殊形式的“炸弹宣言”：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向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和怀叶挺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哀婉的诗句表达了严正的质问，沉痛的控诉，愤慨的抗议，严厉的谴责。这是周恩来针对蒋介石发出的惊雷闪电般的第一个反击。国民党当局出乎意外，手忙脚乱地抓报童，没收报纸，向《新华日报》发出“最后警告”。但是消息已传遍山城，震撼中外，赢得了广

泛的同情，激起了巨大的义愤。后来毛泽东听叶剑英汇报这场斗争时，赞叹道：“令人神往”。

17日动员会后，叶剑英指导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由周、叶修改审定。这份文件约七千多字，列举充分事实、文电（包括蒋、顾等的嘉奖），有力地批驳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种种莫须有的借口，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有计划、有步骤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文件不能公开发表，就由办事处工作人员分送各小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这是周恩来题词见报两天后给蒋、何等人的又一次猛击。

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发出反动命令的第三天，1月20日延安上空升起了又一颗导弹似的“炸弹宣言”：我们党公开申明，坚决反对“皓电”和不承认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任命了副军长、政治委员等一批领导要员。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痛斥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尖锐指出：“这是日寇欲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计划。”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而出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为了挽救危局，提出解决办法十二条，包括停止挑衅，取消反动命令，承认错误，惩办祸首等等。国民党当局把皖南事变说成只是军纪，中共说，这是关乎政治的大事。他

们说只是局部，我们说事涉全局。他们说只是内政，我们说涉及外交。这是中共对国民党当局最猛烈的政治反攻。

紧接着，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在美国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发表长文，详细记述了周恩来1940年12月下旬同她的几次谈话，并郑重托她发表的一束材料。尤其重要的是后来托可靠朋友妥交给她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同时期斯诺也发表了周恩来给他的材料和他的评论。毫无疑问，这是全面、系统、绝对权威性的信息。全世界都知道了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国民党当局的剿共阴谋、中共的强硬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国民党当局打内战，势必抗战熄火，日军南下，直接威胁到英美的利益。英美政府原指望蒋介石牵制日军南下才给他贷款和军火，但蒋介石却用来消灭抗日力量，为降日肃清道路。这种情况，英美人民怎能不关切？英美政府怎能不考虑呢？

这里充分显示出周恩来对皖南事变的预见。他灵活运用日、英美、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冲破蒋介石封锁下了两着绝妙好棋。这些外国朋友都为中国人民抗日作出了国际主义的贡献。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新华日报馆所在地）成了政治反攻的基地。有的同志编写传单和小册子。有的同志把中央文件和有关材料翻译成英文。有的同志打印出来。有的同志四出散发，并且用各种方式邮送、传递到外地和国外。统战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党派组、妇女组、青年组、文化组等都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活动。外事组的龚澎不管外国

记者宿舍门禁多么森严，总有办法传递信息。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工作的德籍友好人士安娜，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宣传品送往香港和国外。那时有个严格规定，外出必须把去向和返回时间告诉留守同志，如果逾时不归，以便党组织好有个寻找的线索。必须保留的机密用蝇头小楷写在极薄的纸片上，装在火柴盒里，再放几根火柴，一听到警铃，马上焚毁。曾家岩机关不设警卫人员，晚间干部轮流值班。

南方局领导同志大力开展国际、国内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向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各界代表人士等宣传十二条是挽救时局危机的唯一办法，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元老派，美洲、南洋侨领都打电报谴责蒋介石打内战，败坏抗战大业。民主派、爱国将领也深感忧愤。广大人民反对内战，各根据地群众纷纷严重抗议，汇成了风起云涌的抗议怒潮。

周恩来、叶剑英抓紧做苏、英、美外交官的工作。周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有交往，向他痛陈利害，促卡尔推动英政府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美国总统派特使居里来华调查。国民党当局曾企图阻挠居里同周恩来见面，未能得逞。周恩来向居里表明了中共的坚决态度。美国政府根据居里的报告，明确表态，如果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抗战熄火，美国将暂时停止援助。依赖外援成性的蒋介石最怕这一手。叶剑英向苏联驻华大使通信息，对崔可夫做工作。苏联大使向何应钦提出质问，外交部长也拒绝出席中国驻苏大使的宴会。蒋介石感受到了国际的压力。

在险恶形势下,为减少损失,南方局逐步撤退干部。先由各组提出名单,经过领导审查后决定。包括干部、进步朋友和烈士遗孤等,回延安的居多数,也有去李先念处和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一部分文化、新闻、学术等方面的知名党员干部和进步朋友就撤退到香港、南洋,转换阵地作战,在香港形成据点,写文章,办报纸,出书刊,再反射到内地来。去南洋的干部还积极开展华侨工作。有些同志就近在四川转入地下,以公开职业(如中小学教师等)作掩护,隐蔽起来。

周恩来要求,对每一撤退同志,都要周密考虑怎样使他走得脱,站得住,能发挥作用。撤退途中的合法证件、交通工具、旅费都要有办法解决。转入地下的同志一般暂时与组织割断联系,由叶剑英把他们的名单带回延安,倘若因形势变化,失掉关系,还可以查证。这对党员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还提出了“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使中央的隐蔽方针更具体化,使党员从积极方面领会和贯彻。隐蔽不是蛰伏隐僻处,而是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努力学习,积储力量。这次艰巨的撤退工作真正做到了对每个同志负责到底,也同进步朋友结成了患难知交。

我们一般干部都是按周恩来1月17日夜讲话行事,不知道十天后中央才同意周、董、邓留渝,干部逐步撤退的意见。中央原来的意见是紧急先撤周、叶、董、邓等领导干部,留少数人守机关。中央认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

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1月17日以前争取蒋介石好转还有可能性,……1月17日以后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1月20日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和谈话,用以对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谈话,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只有这种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和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好转(新的时局好转)的目的。”

由于存在着各种反对内战的因素,由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仍采取联合为主的政策,对他们的动摇性则实行善意的批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中央在1月18、20两日电周恩来:“国民党已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的环境日险,应即离渝返延”。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周、叶、董、邓及办事处、报社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将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资料、文件、密码、电稿作积极处理,对留在办事处人员应给以气节教育,作好最坏准备”。显然,中央要考虑张学良、叶挺被扣的教训。

南方局反复研究了撤留问题,仍旧认为时局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

二是国民党当局还不敢全面破裂。由于国内外的责难，他们正由进攻开始转向防御。只要还有打退他们进攻的任何可能性，就不应丢掉。我们要进行政治大反攻，不可轻易放弃这块重要阵地。只要还没有最后破裂，这里是同他们交涉的主渠道，也是联系中间派和广大群众的要地。况且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再说蒋介石也不会放我们全走，因此，以逐步撤退为好，周、董、邓留下。最后周恩来坚决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周恩来反复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建议。

中央1月25日仍电示周：“蒋若不接受十二条，你要求回延。”蒋介石发出反动命令一周后，日寇突然在河南大举进攻。三日后，中央同意叶返延，周、董、邓留渝及干部逐步撤退的建议，并指出：“但须估计到蒋全部逮捕我们的人，须准备应付全部逮捕”，并“明告张冲，除非取消1月17日命令，没有谈判余地，办事处人员要打要杀权在他们，我们是每人都准备杀头的。如他们亦认为两军相交，不斩来使，则放我们回延，否则他们自便。在他们没有宣布全部破裂以前（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我们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以待他们的觉悟。”周恩来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7日夜讲话已庄严表态：“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27日又代表我们——他自己和全体留渝同志向中央保证：“捕、扣、讨、杀，我们都准备着了，毫无畏惧。”让中央放心。

在中央电报前，他已向张冲明确表示，执行十二条是

中共毫不动摇的决心，要捕要杀，我们早准备着了。这就堵塞了他们以周恩来等为人质，要挟中央让步的任何妄想。

今年在征集周、邓遗物时，发现皖南事变时邓颖超曾将母亲遗物和周恩来珍爱的纪念品放在小磁匣内寄存好友家，并说倘她不能来取回，就留作纪念吧。他们真是一一切都准备着了。想起那难忘之夜，周恩来和我们共勉：“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他临难无苟免的气概，和同志共生死的豪情，对我们的理解和信任，深深教育、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懂得了他那“我要坚持到最后”的“最后”是有决心、有信心把反共高潮打退到谷底；是对朋友对同志负责到底；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从1月17日到27日，周恩来始终坚持两种可能性和两手准备，毫无动摇犹豫。当时国际国内的一些因素还不确定，尤其是头两三天毛泽东估计只剩一种可能性了。他的坚持不是出于愤激和侥幸，而是科学的分析、切身的体验，和不怕牺牲的决心。这是何等的预见、信心和勇气！

这短短十天，是关键的十天，对政治大反攻至关重要的十天。在蒋介石1月17日反动命令见报同一天，周恩来就给他迅雷不及掩耳的迎头一击，接着又广泛宣传中央1月20日电文，做了一系列工作，充分发挥了政治进攻的威力。中央1月20日以后指出“同他（蒋）全面破裂，目前不可能”，“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这十天坚持做争取中间派的工作，起了大作用。广大群众和进步朋友得到鼓励。他们说红岩像屹立在国统区的灯塔，只要灯光不熄灭，任凭雨暴风狂，惊涛骇浪，他们就不迷失方向，就有信心和勇气。

有序地撤退党的干部和进步朋友，保存了一部分国家精英，使人人得所，发挥作用。留下的同志革命意志经过一次淬火，也进一步学习到应变的经验。

如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全先撤了（国民党当局也不会全放。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以周、董、邓留下换取了叶剑英和一大批干部的撤退），只留少数中层或一般干部，那是撑持不了那样险恶局面的。历史可能要经历更多曲折，党和人民将付出更大代价。周恩来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打退反共高潮的决胜一仗

蒋介石没料到中共敢于强硬对抗，没料到国内外强烈反对，没料到日本在河南大举进攻。蒋介石由胜利冲昏头脑跌入进退维谷。毛泽东、周恩来一致估计，蒋介石非找个妥协办法不可了，是他让步的时候了。

第二届参政会即将开幕。蒋介石企图利用这次会，装扮成全国团结一致，掩盖他剿共造成的裂痕。因此，他迫切需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为他捧场。

中共决定坚决抵制这次参政会，以揭破蒋的骗局。在开会前半个月周恩来就向小党派说明：蒋介石1月取消新四军的谈话，是表示破裂的开始，我党提出十二条是企

图挽救的行动，以期恢复团结抗战，但蒋对此置之不理，因此，中共参政员不能出席这次会。沈钧儒建议中共可把实行十二条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条件。这一着很高明，中央采纳了。2月15日周恩来将七参政员致参政会的公函送给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此公函抄送各小党派及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余人。国民党当局严禁发表的十二条，从此在参政会部分人员中公开发表了。公函送到参政会，被退回，周叫再送去。

国民党当局见了公函，像着了火一样，立即派张冲来找周恩来，要求将公函收回，缓两天容他从中奔走。周严词批驳1月17日的命令，指出这是国民党表示破裂的开始，中共提十二条是企图挽救的行动，但送蒋后一直不置理，除请参政会实行十二条外，无其他办法，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如国民党愿与中共谈十二条，参政会可缓谈，但没有满意结果前，中共参政员不能出席。

张冲苦苦哀求周收回公函，以便蒋能见周。周回答此时见蒋没意义，也不会有结果。张说十二条有两点当局决不能接受，一是取消1月17日命令，一是取消一党专政，坚持这两点，必致蒋翻脸。周说蒋已经半翻脸，捕、杀、讨、扣，我们都准备着了。周恩来说，自叶剑英2月2日回延安十多天内，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事件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如国民党没破裂决心，应迅速制止这些严重事件，否则一切都是欺骗之词，我们不能置信。

蒋吓、诱不成，又施一计，由张冲提出三点办法：一、

军事上十八集团军开黄河以北，游击队可留华中，还中共一军，补新四军缺；二、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三、关于制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以后总解决。显然这是维护“皓电”和1月17日命令不变，只以缓期调动和补一军编在十八集团军内来诱骗，对进攻、压迫不加制止，推到以后再说，交换条件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只要混过这一关，他的这些许诺不见明文，毫无保证，只是一句空话，随时可以不认账。这本是他的惯伎。

周恩来分析，蒋的“目的在找我们捧场，居里在此（重庆）未走，我早面告居里，我们决不出席。英美派很着急，亲日派仍在压，我以为只有决不撤回公函，坚决拒绝出席，才可揭破流氓骗局（骗内骗外）。”

中央坚持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办法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坚决不出席。

各小党派得知除非国民党当局实行十二条，中共参政员决不出席，也提出两点建议：一、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二、成立党派委员会，讨论党派关系问题。这既配合了中共的斗争，同时也有利于争取自己参政的机会和提高政治地位。

蒋介石为孤立中共、拉拢小党派，假意允许成立党派委员会，以各小党派劝中共出席参政会为交换条件。中间人士有的对蒋的许诺存疑；有的期望用劝中共参政员出席换取成立党派委员会；有的指望能选入参政会主席团。一时说客联袂造访曾家岩。他们不同程度地表示，只要中共出席参政会，蒋介石若再失信哄骗，大家愿与中共共进

退。有人担忧中共若不出席，党派会开不成，分裂必至。周恩来提醒他们，“不要上当，莫被各个击破”。

参政会的文章做绝了。但为了打破僵局，进一步揭破蒋的骗局，争取中间人士，关键时刻中央同意以周恩来或董必武名义向张冲口头表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仍保持原来的十二条。新十二条只是临时变通办法，先解决一部分问题。新十二条保留原十二条的基本内容，只是对蒋介石最忌讳的两点（收回成命和取消一党专政）改变个提法。一、不直接提重建新四军而写成“新集团军”。八路军辖四个军，新集团军辖两个军，共六个军。二、防地不变，维持现状（针对“皓电”）。三、承认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合法，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四、党派委员会应明确是独立组织，不属于政府或参政会，任务是讨论党派之间的问题，当然应包含当前的紧张关系。人数要扩大，由各党派自行选定。委员会以国民党为正，共产党为副。对这十二条确有结果和保证，中共就可出席会议。

新十二条向小党派表明，中共对国民党当局已仁至义尽，提出要明确党派委员会性质任务，逼国民党讲出党派委员会是参政会下属的一个组织，蒋的意见不能改变。小党派的幻想破灭了。

新十二条送出后，中央书记处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力量，逼我屈服，斗争空前尖锐，毛泽东接二连三电周恩来：“请作准备”，坚决顶住，决不能出席。“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蒋）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

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蒋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只要熬过这一关，就有好转可能。”

“我(党)不出席，他也无可奈何。(1)皖南事变他错了，我以不出席示抗议，并未错；(2)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他不答应，其曲在彼；(3)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4)国际形势已到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5)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

由于蒋欺骗拉拢小党派，一些人已转到蒋方面，他们的话不可听信。在参政会内可能造成不利于我的空气。但这是一时的，过一时就会起变化。

参政会通过拥蒋反共提案后，毛泽东指出这是对我抵制参政会的报复，“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但又说决无再剿共。周恩来判断是防御性的，剿共事也不至发展。实为退兵一战。参政会闭幕，《新华日报》对反共提案和蒋演说一字未登，次日报纸副刊登载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文献七种，不送检查，准备他来停刊。前后两个十二条和皖南事变国民党军事进攻、政治压迫事实几十条都公之于众了，真相大白，人心向我。

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半小时，目的是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我们顾全大局暂时休战。

小党派一无所获，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共是正确的，在

国民党一党专政下，不斗争就不能生存、发展。他们酝酿组织起来，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加强联系。

参政会打退反共高潮决胜这一仗，斗争空前激烈，复杂多变。焦点是蒋要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为他捧场，中共拒绝出席。实质是坚持1月17日反动命令与取消反动命令的尖锐对立。从2月15日中共以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名义致函参政会抄录“十二条”，要求参政会讨论，到3月8日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复电参政会，辩明政府对中共几视同仇敌，中共于情、于理、于势都不能出席，二十来天往返公函多达七件，退回再送，说客盈门，应接不暇，驳谬论，揭骗局，舌战笔战，十分紧张。这场严重的政治大较量好似拔河，一端是国民党当局尽所能发动的各方面力量，包括一些受骗上当的中间人士，另一端最前面是周、董、邓，他们像希腊神话里的安泰，把脚牢牢抵在大地上。大地母亲——中央和人民给予了无穷力量，使我们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

第二次反共高潮由酝酿到开端（皓电，齐电），发展到顶峰（1月17日反动命令）到参政会收兵，历时将近半年。我们以“佳电”对“皓电”，以十二条对1月17日反动命令，以新十二条打退他的进攻，挽救了不绝如缕的团结抗战局面。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大最久的一次反共高潮。中共英勇地、胜利地打退这次反共高潮，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次胜利，改变了顽固派与我党的政治关系和地位，由上下关系变成了党派平等关系；改变了国际对中共的看法，推动他们进一步提高认识并组织起来；教

育了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使他们更好地靠拢和团结在党的周围,对1944年以后民主运动来潮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战场都有影响。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党内更加团结,中央的威望也更加提高。这确是一段难得的精彩的历史经验。

对周恩来领导思想和艺术的点滴体会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由于党中央领导正确,其中包括周恩来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他及时向中央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提出了正确的时局分析和对策;他将国统区党组织转入地下,组织了干部和进步朋友的有序撤退;他在重庆指挥了政治大反攻;他争取中间、团结群众,形成国统区反内战的巨大力量。他在毛泽东策略思想发展中作出了贡献。

回顾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段难得的历史,对周恩来的领导思想、领导艺术,有几点粗浅体会。

一、周恩来灵活运用和发展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原则

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二次高潮在酝酿中,党内对时局有种种不正确估计,一是认为四一二事变到了,国共已经完全破裂,或者很快就要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改变了;二是对国民党当局的严重投降倾向和挑起内战的危险缺乏警惕,不懂得斗争的重要性。对这些错误意见如不加以说明和克服,是非常危险的。为此,毛泽东从

1940年春至1941年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中共三个革命时期、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透彻、鲜明地阐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原则，既批评了“左”的，也批评了右的错误观点。

周恩来1939年、1940年曾两次向中央系统汇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和主要论点。他对毛泽东的科学概括是完全同意的，理解是深透的。周恩来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加以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点，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同盟军，是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力争领导权。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因此，我们要集中对付日本侵略者，区别对待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当时便是把日本及其同盟国家德、意，同英、美区别对待。英美要中国牵制日本南下，因此助蒋抗日。周恩来巧妙利用英美同日的矛盾，遏制蒋介石内战降日。他广泛开展包括官方和民间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托左派朋友为中共坚持抗日造舆论，影响和推动英美政府和人民。他自己成功地做英大使和美总统特使的工作，使他们推动政府对蒋介石施压。这是有效的一着。

（二）最大限度地争取抗日同盟军，不放过一个可能

争取的对象,发展进步势力,这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争取中间势力,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尤其有重要意义;孤立反共顽固派,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们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时间越长越好,以免我们两面作战。这三者都是相互联系的,关键是党的独立自主,力争领导权。这是决定抗战成败的。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是怎样灵活运用这些策略原则的呢?

首先,对反共顽固派的革命两面政策。

周恩来有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熟知反共顽固派蒋介石的抗日反共两重性,又打又拉两面政策,压、吓、哄三种伎俩。蒋在抗战前是对共进剿,对日退让的,后来由于国内国外大势所迫才联共抗日,但他灭共之心不死,有机会就要尽可能敲掉中共军力,华北受挫,又搞华中。周恩来为抗日大局,力争推迟国共破裂时间,越晚越好。同时,对蒋抱有高度警惕性,不怕压,不上当。反共高潮开始时,他就估计到蒋进攻计划不会改变,在实力悬殊下,我江南退一步,以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同情,在政治上有理取得主动,周恩来对蒋的缓撤手令、顾祝同设定的北撤路线、蒋决不留难的许诺,一概不信。当12月据确息“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似有转机时,周恩来却看到局部讨伐的战机,立即为下一步反击作准备。他12月下旬三次向中央报警。当蒋介石异乎寻常地“灌米汤”,周立即敏感到其中有诈,立即向中央报警。斗争要知己知彼,周恩来可说是把蒋介石吃透了。

1月17日反动命令下达时,国共关系真是到了破裂

边缘。国内国外将如何反应，尚难预料，周却毅然决然留下来，冒全体牺牲的危险，去争取好转的最后可能。终于在各方配合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退蒋的进攻，使其被迫处于防御地位。在革命两面政策中又添了两手准备（在作最坏准备时，不放弃争取好的可能）这样一条经验，这应说是周恩来大勇大智的结晶。毛泽东把这条写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在参政会的斗争中，中共同顽固派争夺小党派。开始小党派同情中共，后来被蒋拉过去，参政会已经开幕，似乎无可挽回了，但周还是再拉一把，终于使小党派明白过来，参政会后又转向我们。在反复争夺领导权中，周显示了非常的耐心和韧性。

参政会通过了反共决议，蒋介石发表了反共演说，但他还是说了以后决无军事剿共。周恩来判断蒋是防御性的，中央可以不理睬，暂时休战。后来蒋介石找周谈话，形势就缓和下来了。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以佳电对皓电，接着以十二条对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最后打出暂行办法十二条，抵制参政会。正是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斗争胜利。

其次，争取中间势力。

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进行革命斗争，争取中间势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抗日不抗日为准，对各阶级、阶层区别对待，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把完全降日的亲日派（叛国的和潜伏在抗日阵营中的）和尚能抗日的亲英美派加以区别；把其中中央当权的与地方实力派加

以区别；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和投日的大地主加以区别，通过如此具体精密的区分和积极细致的工作，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指明共七种），程度不同地利用这些势力和发挥它们的作用，就能为进步势力的活动和壮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

周恩来对争取中间势力认识较早。抗战初武汉时期着重做国民党工作，迁到重庆就加强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不但包括毛泽东文章中指出的七种人，而且积极开展海外华侨统战工作和国际反法西斯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可忽视，南方局是非常重视的，在新闻、教育、出版、科技、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各界，从知识青年到文化界名流，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他们通过社会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下乡做农民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

争取中间派必须尊重他们的利益。在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各项政策兼顾各方（劳资、地主、农民等）利益。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和中间派都处于无权地位。因此，周恩来除了宣传根据地政策外，还要宣传和带领他们去向国民党要民主，争政治地位；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争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新闻、出版等检查，争取言论、出版、演剧等自由，使知识分子靠拢我们。

周恩来在非党朋友交往中，十分注意态度谦诚，并且把它写入统战工作手册第二条。统战是我党真实的阶级政策，在抗日大目标下，联合各阶级、阶层，使各得其所，

不是为一党私利拉拢利用别人。周恩来说，做非党人士工作，只能以理服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中间派不经过多次反复的经验，不能认识对国民党斗争的必要。“皓电”时，他们劝我们退让。“佳电”后，同情中央。1月17日反动命令后，他们认识了所谓统一军令，实际是消灭异己，必然导致抗战熄火。但参政会时，他们受拉拢欺骗，又来劝我们出席。中间派特点就是不同程度的动摇性、妥协性。周恩来深知这点，总是以极大耐心和韧性反复争取，不断争取。

最重要的是发展进步力量。

毛泽东指出，“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取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

在国统区，国民党一党专政，怎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呢？

周恩来总结过去地下党和抗战初期半公开党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建设坚强、战斗、真正彻底的地下党、群众的党的七个条件。他指出：

——这是真正彻底的地下党。地区划小（一省分几特

委),机关缩小,上下级联系减少,平行支部不打通,党员单线联系或一段时间切断联系。敌人难找到我党,找到也绝少牵连。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这是群众的党。群众聚集的单位或机关都有组织或个人联系。

——这是坚强的党。经过审查,留在组织的党员忠诚精干,通过不断对他们进行党性教育,实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溶于群众而不暴露,又保持先进,能影响和推动群众。

——这是战斗的党。能打入当权的要害部门及合法组织,用“社会的方式进行活动(职业化、公开化、社会化)”。

——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信心,不怕犯错误,知错能改。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善于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党内工作和党外工作配合而不暴露。

周恩来还利用《新华日报》的副刊《团结》、《青年生活》等指导地下党工作,干部能意会又不泄密。

这些使党的精干隐蔽的方针更具体、更丰富。南方局可以说是贯彻“七条”的典范,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全过程中,始终正确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出种种能体现方针的方法,表现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打开新局面的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自信心。如云南省工委认真贯彻这些原则,在险恶环境下,党的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后来推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再次说明它是必

要的、正确的。

党的独立自主即组织上、政策上、思想上独立自主，力争抗日的领导权，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分裂、倒退，这是抗战胜败、国家兴衰的关键。

贯穿周恩来实践的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他1939年提出统一战线的守则，头一条便是坚定的立场，第六条是高度警惕性。他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是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办法切实可行，又有远见卓识，不是短视的实用主义者。他对辩证法运用自如，精密分析各种矛盾，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蒋介石抗日反共的两重性，革命的两面政策和反革命的两面政策，时局好转、坏转的两种可能，应付好转、坏转的两手准备，贯彻隐蔽方针的消极、积极做法，进攻与撤退、公开与秘密，坚持原则与不失原则的妥协的转变，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主次分明，避免片面性、简单化，也不调和折衷。他纯熟地掌握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实际，正是周恩来胆略智慧的源泉。

把周恩来有关统一战线的言论、实践和毛泽东有关文献对照研究，显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策略思想中包含了周恩来的重大贡献，毛泽东的科学概括则使策略理

论更系统、全面、正确，代表了党的领导水平。

二、周恩来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皖南事变前后，时局极其严峻，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相距遥远，但文电往返频繁，多的时候达到一日数电，就像对坐在延安窑洞里讨论、交换情报信息，分析时局，比较各种对策方案的得失利弊，反复磋商、推敲，慎重决策，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周恩来作为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分管国统区工作，一向以大局为重，极端负责。他以高超的情报工作，和通过统战朋友以及党组织特别是他自己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提供大量重要准确的情报，使中央能准确及时掌握国民党军向我进攻的动态，起了顽固派心脏里侦察兵的作用。周恩来向中央提供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建议，坚决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坐镇最前沿指挥政治大反攻，及时有效地弥补了对时局估计的某些难以避免的偏差。他的贡献可以说是大的，他的作用是很难有人能够替代的。

周恩来是尊重集体领导、严守组织纪律的楷模。凡中央的指示，困难再大，他也要创造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执行，而且结合实际，更具体更完善。但又不是机械执行，如1月17日蒋乱命后撤退全部主要领导干部，事关重大，周按组织原则反复陈述自己意见，事后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恩来十分尊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中共党史看，中央领导犯“左”或右的大错误，党的损失是惨痛的。周恩来亲自经历了陈独秀、向忠发、王明等错误领导，对领袖

的重要是深有体会的。他较早地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到陕北以后，全党认识并拥戴毛泽东为党中央的领袖，周恩来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他事事从党的事业的大局考虑，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热忱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地把自已放在助手的地位，不允许宣传自己，一生谦虚谨慎，毫无私心，努力促进中央核心的团结。这对于全党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在毛泽东策略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集思广益，慎重决策。如他对“皓电”对策就听取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的意见，原来想发“炸弹宣言”，行“兵谏出师”，后改为两个比较方案，原方案外加上政治进攻、军事抵抗，后来采取周的建议，江南退一步，争取中间同情，最后毛再概括成缓和以争取同情，抵抗以保存自己，软给蒋以面子，硬给他以畏惧，针锋相对，双管齐下，才能破蒋之诡计，制何之投降，争取中间之向我。单一个软、单一个硬都不行，通过在反复实践中吸收各种意见，就更全面、更正确了。尤其是毛泽东草拟的佳电，完满地、精彩地体现了这个方针，那种高水平、大手笔，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在关键时刻十分坚决果断，如提出十二条办法，要蒋收回成命，承认错误，取消一党专政，表示我们不怕破裂，有信心收拾局面。明知蒋决不会接受，但唯有这样做才能使蒋由冲昏头脑到考虑中共的决心和力量。明知蒋尚未投降，却强调他内战是为了投降，事实上内战必导

致抗战熄火。我们只有抓住民族矛盾，才能发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打破蒋把消灭新四军说成是什么统一军令、局部、内政、只涉及国共两党问题的欺人之谈。在参政会斗争最激烈时，小党派转向，毛泽东再三强调要顶住，坚决不出席，否则立场尽失，前功尽弃，这是绝对必要的。

毛泽东也有过对时局估计的偏差，但能接受同志们意见，较快纠正。领袖也不可能千虑而无一失，重要的是民主集中制要健全，领导班子真正做到集体领导，彼此尊重，长短互补，一切按组织原则办，这是团结斗争的组织保证。反之，民主集中制削弱或遭到破坏，党和人民就会受损失。民主集中制太重要了。

三、周恩来奇才睿智的基础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在复杂尖锐斗争中，在生死关头，最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和才智。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的表现使我想起了他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不是一般题词，是经过调查，反复思考，针对向雷锋学什么而发出的。题词高度评价和概括了雷锋精神。细细体会，这也正是周恩来精神，白求恩精神，一切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这种精神的根基就是彻底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共产主义者总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达到公而忘私的境

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毅勇敢，达到奋不顾身的程度。这种精神不是天生的，是言行一致、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结果，是在群众中、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现在人们赞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说到底，这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的魅力。

高山安可仰，学习周恩来，要达到他的高度、纯度确实难。各人的天赋、才能、际遇、贡献也不可能相同。但无论雷锋、白求恩、周恩来都有一点相通，那便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有了这一条，便可以成为大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认真刻苦地学，学一点便会有一点收获。周恩来号召我们向雷锋学习的，不正是我们应当向周恩来学习的吗？

（文中未注明的引文均出自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

雷 英 夫

日内瓦会议是根据 1954 年 2 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的建议召开的。

这一建议是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和印度支那战争法越双方希望停战的愿望作出的。当时，最紧急的任务是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因为朝鲜问题虽然由于美国的破坏也很需要解决，但毕竟已经停止了战争。

停止印度支那战争是 1953 年 11 月法国首先提出的，接着胡志明在同月接见瑞典斯德哥尔摩报的记者时，正式表示愿意和法国进行和谈。经过有关方面的促进协商，四国外长会议才达成协议：于 1954 年 4 月 26 日在日内瓦召开中、苏、美、英、法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法国之所以首先提出印度支那停战问题，是因为当时法国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国内，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在国外，它的殖民统治受到愈来愈强烈的挑战：一是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陷入了困境，二是由于阿尔及利亚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使它不得安宁。这样，导致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内部派系斗争加剧，相互倾轧；人民对在越南、阿尔及利亚继续进行殖民战争和殖民统

治的不满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它企图以在印度支那停战撤军来解除困境，争得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又可从印支战场抽出兵力去增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以减轻财政负担，缓和政治矛盾。

越南民主共和国之所以响应法国关于和谈的建议，一是因为在军事上印支战争的形势虽然很好，但双方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越南人民军在短时间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政治上可以高举和平的旗帜取得广大的同情，因此想休整一下，喘口气。二是当时美国积极插手印支事务，希望法国打下去。所以，它大力援助法国，提供飞机、大炮、弹药、轻武器，并派出美军顾问团。从1951年到1954年7月，法国用在印支战场中的经费，有五分之四来源于美国，共计26亿美元。美国的世界战略计划就是想独霸世界，在东方要控制东南亚、日本、朝鲜，并取代法国控制印度支那，从而实现对中国的大包围。因此，如何粉碎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阴谋，就成了一项紧迫的任务。

当时，印支战场上的军事形势是：越法双方兵力基本上势均力敌。法伪的兵力为48万人，其中法军14万人，伪军34万人；越军的总数为35—40万人。兵力上法国稍占优势；武器装备上，它有飞机、坦克、大炮，特别是海、空军占绝对优势；民心士气是越南占优势。在南方的红河三角洲地区法军占优势，越军只有游击队和若干小块根据地；在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越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战略形势也比较有利，但法军的工事很坚固，越军啃

不动。双方机动作战的能力，越军略优。总观整个军事形势，双方各有所长，短期内谁也无法彻底战胜谁。因此，双方都想停下来，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军事问题。

既然法国想和，越南想和，苏联等国也赞成和。我们认为，印支和平的实现，不仅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如果法国不停火，美国再插手印支，不仅对越南、对印支人民和世界和平不利，对我们中国也很不利，因为美国会一点点地扩大到我国边境，在越南又会出现一个类似朝鲜的局势。这样我们不出兵援越不行，出兵援助将比援朝的困难更大。一是交通线过长，二是深山密林，地形复杂，因此前方给养、武器弹药的供给，都会比在朝鲜困难得多。在朝鲜拖住我们百把万部队，消耗了我们巨大财力物力，如果越南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太不利了。从军事上说，按照朝鲜战争的经验，我们即使出兵，短期内也只能打个平局。所以，在美国还没有插手以前，就以和平方式把印支问题解决好，以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是我们赞成和谈的主要目的。

为了把日内瓦会议开好，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即在1954年4月上旬，苏联曾就友好国家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问题同周总理和胡志明主席进行磋商。当时，总理率乔冠华、陈家康和我去苏联参加苏、中、越三国会议。会上统一了认识，确定了和谈的方针和策略，这就为中、越、苏在日内瓦会议的互相配合、密切协同奠定了基础。

从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到7月21日

结束,会议可分为两个阶段。从4月26日开幕到6月15日休会,为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交叉进行。有关朝鲜问题的会谈,有18个国家参加,即中、朝、苏和以联合国军为名义侵略朝鲜的15个国家,及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主要议题是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和撤军,朝鲜的局势已不存在停战问题,因为协定在1953年7月就已经签字,这时,朝鲜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和平选举实现南北方统一和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撤离朝鲜。但美国反对和平,竭力阻挠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因此它向15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施加压力,搞了个16国声明,使朝鲜问题在日内瓦会议上无结果而终。6月15日朝鲜问题的讨论结束后,外长级的会谈休会,与下一阶段印支问题会谈无关的各国外长都已离开日内瓦回国。

复会后一直到会议结束,是专门关于印支和平问题的会谈。在这段会谈中,有9个会议也是交叉进行。一是日内瓦会议本身,叫大会,这是政策性、公开性的,有记者列席。二是限制性的小型会议,发言稿不公开,不让记者到会。大会进行政策性问题的辩论,限制性会议则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由于会议的宗旨是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这就存在着一个国际监督与国际保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限制性会议进行了小范围的讨论。三是以印支谈判的主角——法国和越南为对手的双边军事会议(包括南越保大代表)。主要是商谈停战协定、撤军等。越南要求法国撤军,而法国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老挝撤军。这个会议产生了正式的停战协定。各国代表团都承认了这

个协定,这样就有了国际保证。这三个会交叉进行,紧张时几乎是天天开。每个会都有自己的主题,相互关联。

当时中、越、苏三国关系很好,为互相配合,一致行动,三国代表团决定在大会、小会、双边会以外,三家再举行一个协商会,以便研究形势,提出问题,商讨对策。除此以外,为帮助越南与法国谈判,中、越、苏三方还成立了军事参谋会,由三方军事人员参加,每天开会,听取越方代表的汇报,研究情况,提出对策。越方参加人有谢光宝,为越南国防部副部长,是与法国军事谈判的首席代表,也是中、越、苏军事参谋会的越方首席代表,此人曾在法国留学,获物理学博士头衔,在法国有点影响,但对军事不太懂,知道的情况也不全面;第二个是何文楼,为作战局局长,是实际负责者;第三个是邓性,为作战局副局长,主管老挝方面的事务,是何文楼的助手;第四个为阮清山,当时没名气,后任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苏方参加人有首席代表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菲林科中将,还有一名少将,名字我记不清了。中方参加人有我和林枫、郭英会、俄文翻译马列、越文翻译张樾(当时为中联部一科科长)。

在印支问题的会谈初期,法国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和讨价还价,特别是由于越南人民军于日内瓦会议前夜在奠边府打了败仗,所以法气焰增高,根本不承认越南,公开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幽灵”。因此周总理就向我党中央报告并要求转告越苏党中央,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定要按照预定方针,想法打几个漂亮仗,从而取得于越南谈判有利的军事形势,以此逼迫法国低下头来,面对现实,

谈判解决印支问题。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就恰好起了扭转会谈局势的作用。对这一战役，越南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当时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奠边府集结了 22 个营 1.6 万人的精锐部队，准备配合莱州的法军，同红河三角洲的法军主力夹击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府太原。我们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积极建议和协助越南人民军于 1953 年 12 月发起了莱州奠边府战役，当即解放了莱州，接着包围了奠边府，这时越南总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露一手，竟然不和顾问团商量也不告诉顾问团就贸然在 1954 年 3 月中旬发动了总攻。由于指导思想不对，准备工作很差，结果攻击受挫，吃了大亏。这时越南总部就悲观失望，不敢再打，说越军攻打奠边府的主力已被消灭，无法再打。我们顾问团说为了配合日内瓦会议和改善越南战场的形势，奠边府战役必须打，也完全有条件取得胜利，但要接受教训，充分准备，采取稳扎稳打的攻击战术，万一打不死敌人，就困死它，困不死它就淹死它（因雨季快到了），反正，要坚决消灭奠边府的敌人，不能动摇。为此，顾问团帮助他们分析军事形势，修订作战计划，教他们如何挖坑道、放炸药、攻碉堡、打坦克、打飞机，还把在云南帮越南训练的一个炮兵师调回去参战，又援助了一个多管火箭炮团，这种火箭炮是我们刚刚试制成功的新武器，24 个炮营，打出去地动山摇，一片火海，把敌人打得心惊肉跳，我们还派出大量汽车帮助越南运输弹药、器材、粮食，并指导越南部队在奠边府周围修筑了大量工事，现场练兵，完成了总攻的各种准备工作，然后以

排山倒海之势于5月初发起了猛烈的总攻,经过激烈的战斗,5月7日全歼守敌法国精锐部队1.6万人,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法国一看形势不妙,以为中国又出了志愿军,于是马上软了下来,5月8日,法国即主动地正式表示求和,宣布停火。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没有奠边府战役的伟大胜利,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是难以达成的,即使勉强达成了,条件也将是苛刻的。而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没有中国的大力援助,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奠边府战役打了大胜仗,才造成了日内瓦会议迅速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好协议,以致事隔21年后,即1974年越南和美国经过长期战争和谈判,所达成的巴黎停战协议,也基本上还是1954年日内瓦法越停火协议的再版。因此,后来越南政府把1954年日内瓦会议所达成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停战协议说成是中国把越南革命推迟了21年,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的诬蔑攻击。

既然要停火,当然就有个划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谁都知道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这是一条规律。当时,越南提出在北纬13度划线,法国提出在北纬20度划,双方争执不休。我们认为这样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主张双方都做些实事求是的让步,根据双方的实际力量以北纬17度划线较好。我们的这一意见,得到了与会各国(除美国外)包括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的一致称赞(胡主席估计对方最多只能让到17度线),终于使问题得到解决。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穆 欣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从这时起到1967年8月，我在那里住了15个月。1966年8月底因为有人写信向江青告密诬陷我“骂过江青有神经病”，又在一些事情上冒犯了江青，她责令我停止工作1个来月；1967年1月中旬江青又责令我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评”，被批斗了1个月。从此不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文件也停发了。2月底再回到钓鱼台，每天被“发配”到《人民日报》“管版面”（实际没有“管”）。只是这个小组对外的集体活动，每次还都通知我前往参加，直到8月初旬江青再次责令我回报社“参加运动”。其间我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工作的时间，实际上总共不满7个月。而江青一伙给予的“酬报”是近8年的冤狱（1967年9月7日至1975年5月14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它把亿万人民和整个民族拖入空前的浩劫之中。当时曾经掌握了中央很大部分权力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制造这场灾难的指挥部。这个小组到处煽风点火，在全国造成空前的全面内战，在它

内部也是硝烟弥漫，争斗不已。

这里记述的，是我住在钓鱼台期间的见闻和在以后听到的有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些情况。

（一）美丽的钓鱼台成了“全面内战”的指挥台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之初，即住进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这座宾馆是在古钓鱼台以北修建起来的，地处首都名胜玉渊潭东岸，是北京著名的园林之一。玉渊潭古时叫望海楼，也称钓鱼台。早在金代，这里就已成为帝王游乐的场所，后为历代帝王垂钓的地方。清朝乾隆年间曾在这里兴建行宫。

1958年10月建起来的这座国宾馆，专供接待来华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社会名流。这座宾馆包括古台在内，面积42万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5万多平方米。初时沿湖四周建起的别墅楼共计15座，其后又添建了一座贵宾楼和建筑面积共4500平方米的一座现代化的俱乐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的时候，大都住在15号楼。初时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作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连轴转。6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作秘书，仍然忙得难有喘息的功夫。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后来，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号楼难以容纳了，7月初将办公室搬往11号楼。

7月初旬，由康生主持在11号楼开会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决定由穆欣、戚本禹、曹轶欧负责，穆欣为召集人。下设文电组，由穆欣兼管；简报组，由戚本禹兼

管；调查组，由曹轶欧负责。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前，办公室又从11号楼搬到16号楼。7月20日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即住进钓鱼台，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都住在钓鱼台，其后王任重、刘志坚等也住进来，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占用了这座国宾馆的7座楼房。17号楼的小礼堂和大会议室也经常为小组使用。

自从中央文革小组住进来后，钓鱼台成了发号施令、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指挥台”，成为搞乱全国、搞乱全党、制造天下大乱的策源地。

（二）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所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关系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

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她在各种场合声称“我代表毛主席”说东道西），处处挟持陈伯达。每逢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和大家等着。江青到了，陈伯达马上宣布“开会”。如果陈伯达和她有了分歧，江青就叫会议停下来，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会上谈论问题，稍有不如意，就会撒野放刁。江青在小组里俨然就是女皇，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让着她点儿。

在这个小组里头，好多事情都不成体统。例如最得江青宠信的小组成员戚本禹，上窜下跳，全无章法。江青要整什么人，都叫他去打头阵，先放炮。他为江青立了“功”：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中，诬陷邓拓是“叛徒”，第二天晚上邓拓就含恨离开人间；戚本禹夜里去抄田家英的家，第二天上午田家英也含恨离开人间；在一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反映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话还没有说完，坐在旁边的戚本禹竟然粗暴地打断他，拍着桌子谩骂刘志坚“胡说八道”。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反而指责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为什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在陈伯达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过程中，刘志坚和王任重等就提出过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如在《決定》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中说：“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刘志坚在讨论中曾经建议删去“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一段话。他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

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最终，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十六条》草稿原来有二十三条，经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人参与修改为十五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讨论这个草稿时，刘志坚基于“部队无论如何不能乱”的思想，提出要对军队的运动有一条“但书”，作出某些特殊规定和限制，以利于部队保持稳定。这个意见多次遭到江青、陈伯达一伙的反对，刘志坚据理力争，坚持加上这一条，并得到周恩来、陶铸和老师们的支持，后经全会通过，在文件中加上一条（作为这个文件的第十五条）：“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这个文件也由原来的十五条变成十六条。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在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对干部“打倒一切”还是区别对待，以及在工作组存废问题、炮轰刘邓或是保刘邓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概括起来，就是“要乱”和“怕乱”两种意见的斗争。

江青依仗权势，要求周围的人都得唯她的意志是从，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凡是她不喜欢的人，认为可疑的人，或是不驯服的人，都要加以排斥，进行迫害。1966年年底，江青伙同林彪刮起“一月夺权”风暴之前，接连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打倒”，赶出中央文革，唆使造反派对他们揪斗和残酷迫害。

当时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经毛泽东同意，担任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顾问。因为他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经常受到江青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指责。江青指责他：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对他的言行时时找岔儿，对他的工作处处掣肘。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抓住北京市印发西城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会议上连续对王任重进行批判，诬蔑他是什么“背着中央文革搞阴谋活动”。1966年12月16日，江青对王任重突然袭击，当众点了王任重和周荣鑫、雍文涛的名（还逼周、雍二人“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事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并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赶出“中央文革”，同时还布置北京“三司司令”蒯大富派人去湖北揪斗王任重。

陶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又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初来北京工作时，江青曾妄图拉拢他反对邓小平。但是陶铸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没有这么做。八届十一中全会站出来批评邓小平的，只有谢富治一个人。对谢富治的发言，陶铸没让发简报，只搞了个特刊，在小范围里发，江青很不高兴。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中央有两套班子，中央文革一套，周恩来一套。陶铸协助总理工作，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凡通知的都参加。陶铸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及其他场合常和江青发生争吵。1966年11月29

日，江青召开科委系统万人大会，主管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和陶铸事先都不知道。陶铸到会时说了一句“怎么事先也不通告一下？”江青就厉声说：“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会，江青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并且要陶铸照此“原则”去保这个、保那个。陶铸抵制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问政治背景。”当场两人发生争吵。江青发火，拍着沙发扶手嚎叫。陶铸气极伸手拍到茶几上，并且跳起来回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江青撒泼混闹，周恩来只好宣布散会。此后江青即对陶铸处处刁难。陶铸对张春桥处理上海“安亭事件”违背中央原则提出批评，支持上海市委，即遭江青一伙围攻。1966年12月6日，林彪亲自主持常委会批判工交座谈会提出来的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时，江青一伙又对陶铸大张挞伐。12月下旬一次会议上，江青一伙再次围攻陶铸，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驳斥说：“我保党的干部，为什么不应该保？”江青说：“你保的一伙是坏人！”陶铸反问有什么证据？康生竟把一个名叫“任重”的特务硬安到王任重头上，血口喷人：“你保的王任重是一个CC特务。”

1967年1月4日，江青伙同陈伯达，背着周恩来和陶铸本人，当众煽动造反派“打倒”陶铸。这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时候（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治病），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都在会上公开点陶铸的名，硬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

台”。

江青说：“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哪，先不要去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

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例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王任重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又说：“他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跟他吵了多次架，每次我都几乎昏过去！他镇压我，他还镇压中央文革！”

康生诬陷陶铸说：“他是叛徒！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从此陶铸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终被迫害致死。

就在江青一伙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的同一天，他们又当众宣布“打倒”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

刘志坚作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始终坚持“军队

不能乱”的思想，尽力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如1967年10月1日，部队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作法不同，给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令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全军文革小组只得起草一个《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的草稿基本上坚持党的领导，并尽可能在具体做法上作了一些保留。林彪叫把文件草稿送到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看了，对草稿十分不满，立即大删大改。张春桥把改了的稿本交给刘志坚的时候，还说“一个字也不准再改动”。刘志坚为此同张春桥争吵起来。刘志坚说：“取消党的政治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诡辩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当时争论激烈，却毫无结果，这个文件还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发下去了。《紧急指示》下达后，给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等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禁止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行动。林彪把这个通知转送给中央文革小组，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不发。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周恩来和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两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刘志坚奉命领导全军文革小组的同志

组织了这两次大会。会上总理的讲话，几位老师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正义呼声和正确主张，在全军和全国各地群众中获得共鸣。这就引起江青一伙极大不满。事后刘志坚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竟指责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他们煽动极左派学生闹事，张贴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称要对几位老师“批判”。其后，在关锋直接支持、煽动下，40几所军队院校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定于1967年1月5日召开“批资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江青无理取闹、故意整人达到十分无聊的程度。1967年1月3日，当她接到40多所军队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的请帖后，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就诬蔑刘志坚“搞阴谋”。她从手提包中拿出“批资大会”的请帖，胡说什么发给刘志坚和贺龙的请帖颜色特别红，而发给她以及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山的请帖颜色就淡一些，指责说：“这不就是在搞阴谋？”事实上，所发请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周恩来听到有关“批资大会”的消息，1月3日中午亲自到钓鱼台同中央文革小组商定，设法劝说学生不要开这个会。1月3日、4日两个晚上，周恩来和总参、总政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全体、全军文革全体，以及40几所军队院校来京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总理耐心地听取学生们发言，细心地做说服工作，学生们已接受

总理的劝说,表示可以不开“批资大会”。刘志坚遵照总理关于顾全大局的指示精神发言作了自我批评。当他讲到自己有点“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的时候,康生突然站起来打断他的话,蛮横地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原来情绪已经平息下来的造反派,立即又被康生煽动起来,当场马上喊叫“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江青和陈伯达火上加油,诬蔑刘志坚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他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经过他们这一番发作,总理两个通宵所做的工作全部告吹。此后军队院校来京造反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冲击国防部和各军事机关的行动,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1月19日,由关锋指挥造反派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刘志坚从此被关押逼供、无情折磨,遭受了长达7年零9个月的残酷迫害。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不但引起许多小组成员不满,也曾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1967年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建立起来制度,没有民主集中制。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正式会议作过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还批评说,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对上也没有报告。他对中央

文革小组攻击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情况表示不满，特别是对江青、陈伯达擅自打倒陶铸一事非常生气。他要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对江青和陈伯达进行了严厉批评。

1967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陈伯达和江青从来没有劝过我，一个要节制一点，一个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毛泽东还在2月10日的会议上，当面严厉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决定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召回北京，由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中央文革小组乱了阵脚，慌作一团。陈伯达很紧张，曾说他想自杀。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了会，江青躲起来，装病不参加，会上只批评了陈伯达，根本没有批评江青。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只当耳边风，事后仍然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坚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搞乱全国。终于造成全国混乱的局面，无政府主义发展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三）挑动派性混战的“总后台”

中央文革小组开头比较松散。7月中旬办公室成立，江青从上海回京后，小组成员天天在钓鱼台碰头。当时文革小组主要管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发生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起作用，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常委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由刘少奇主持。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不管地方的事，其职权是负责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无权下发指示。小组成员的活动，主要是到各机关、学校看大字报（但不表态），或者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北京什么地方出事，就到那里去。同时接待群众来访。《五·一六通知》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江青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陈伯达管的《红旗》杂志和夺权后的《人民日报》，也只对毛泽东负责，从不请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改组。林彪在政治局常委的地位一下子升到了第二位，并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这个时候的中央文革小组，根据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已成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便于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揽权，到处发号施令。全会以后，毛泽东主持常委会，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和陈伯达、康生有事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但向毛泽东汇报时署名的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周恩来不签字，他有事要报告毛泽东，就单独报告。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常委扩大会，批

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会议由林彪主持，常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林彪、江青都认为刘少奇已经打倒，邓小平最危险，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便将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林彪把邓小平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邓小平已无法工作，把他分管的专案委员会、中央联络部、中央调查部等交给康生去管。这时虽然还有一批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却没有开过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曾经正式提出健全书记处的建议，被江青反对掉了。转过年来，1月11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上，毛泽东打破过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署名的惯例，让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此后同类电报、文件即由四家署名。2月初，毛泽东就在常委扩大会上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表了书记处。”

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各单位、各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以及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办公室的机构也逐渐扩大，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多。在办公室前述的文电、简报、调查三个组以外，又陆续成立了三个不归办公室管的单位：来信组、快报组和记者站。

来信组负责处理各地给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把信中所反映的重要情况及所提出的重要问题，摘要编发在内部刊物上。快报组是为迅速、及时地向党中央反映有关运动情况而建立的机构。这个组所出版的《快报》，特点是篇幅小，速度快，记者写来的报道随到随印随发，有时一个钟头内出版多次。王力主管的记者站

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开始时由部队抽调干部一二百人(大多数都未做过新闻记者),均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往各地(其后又从地方抽调一些人,有的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活动)。这些记者从各地发回情况,及时刊登在记者站编印的《文革简报》、《快报》等内部报刊上,供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考。

这些由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快报》、《文革简报》以及《电讯快报》之类,虽也曾及时地向中央反映过不少重要的真实情况,但也经常受到江青一伙的蒙骗,通过这种渠道“谎报军情”、“制造舆论”以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江青一伙通常采取的手段,就是经由他们中间的一个或两个人,先向自己联系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五大领袖”或者其他造反派头头),暗中“泄露”某些“玄机”、散布某些尚未向毛泽东请示或者明知毛泽东一时还不允许而他们又急于动作的“意图”,让这些头头以发表个人意见的方式,到群众中去传播这些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蛊惑人心,造成议论纷纷,沸沸扬扬的气氛。“记者”听到这些议论加以报道,通过《快报》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党内问题处理。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时候,曾当面对刘少奇说:“有错误就改。谁要打倒你?我才不要打倒你哩!”江青一伙当时不敢公开违抗。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

红卫兵“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江青、张春桥等都出席了。当时，“一司”有人递条子给江青说：“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江青看过这张条，当场回答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纠正。……”

江青当众讲的这些话，当然是“表面文章”。就在当天下午2时，张春桥又在中南海西门约见蒯大富，鬼鬼祟祟地对他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听了，心领神会。他心里明白，张春桥所指的“那一两个”，明白无误地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搞臭”，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把他们打倒。但当蒯大富向张春桥保证“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以后，张春桥却又狡诈地眨眨眼睛，把嘴一抿轻声说：“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你尽可能去行动，但不准对任何人说；你说，我也不承认。”蒯大富回到清华大学，当天下午4时就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会议，决定要“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一周以后，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五千余众冲向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沿途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第一次公开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反动口号推向社会。张春桥的“授意”，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对于这次“行动”的幕后活

动,《快报》和记者站的“记者”、编辑都被蒙在鼓里,自然会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当作运动的“新动向”在《快报》上反映。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在人民大会堂一次接见造反派组织的会议结束后,也曾乘着会完人散的时机,偷偷地把一包供作打倒刘少奇的“材料”交给蒯大富,叮嘱他“好好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派出的“解放军报记者”,出版的《快报》,实际上成了江青一伙煽风点火、制造动乱的舆论工具。这些穿军装的“解放军报记者”很多不是现役军人,更不是什么军报记者。他们同江青一伙挂钩,有的踢开各地党委,到处“造反”,煽风点火,通风报信,直接指挥各地的运动。

这些记者中的一些人,为了迎合林彪、江青一伙的胃口,不惜胡编乱造,制造事端,陷害地方领导同志。如在1967年4月19日,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奉命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4月21日接见。江青还说,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分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

汇报会结束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目的是为了及时指导军区的“支

左”工作。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他还特地作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是，这事被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插手一搅和，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位记者探得此事，就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 19 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并兴师问罪，江青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陈再道、钟汉华看了这个盛气凌人的指示，感到震惊。他们知道江青难惹，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有关同志查问真相。原来是一位负责“支左”的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被“记者”知道后立即密报的。陈、钟二人当即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他们及时把书面报告送给江青，按说这件事可以结束了。可是江青不依不饶，仍然揪住不放。4 月 21 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 4 月 19 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

不予答复。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这时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接到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的通知，唯独给陈再道、钟汉华下达了离开北京的“逐客令”。陈、钟二人只好离开北京，打道回府。在武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两个多月后，爆发了林彪、江青策划挑起的震撼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当着各地群众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双方尖锐对立，彼此火并不已的时候，江青一伙常将“分裂群众”的罪名强加在他们急欲打倒的某些“走资派”、“黑帮”身上，诬陷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指责他们是某一派群众组织的“黑后台”，以此煽动、唆使另一派群众揪斗这些革命老干部，乘机混水摸鱼。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就分裂为两大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韩爱晶，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聂元梓结成“天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王大宾和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谭厚兰、从蒯大富“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井冈山414总部”结成“地派”。从表面看，两派你死我活，互相对立，一直发生武斗；但是从幕后看，他们的“黑后台”都在钓鱼台，分别由中央文革小组所操纵。有人说，这两大派“就像一根线上牵着的两个木偶”，是很恰当的比喻。例如，1967年1月中旬，在“夺权”风暴中，他们暗中叫“天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此事被毛泽东制止，萧华未曾到会，筹办这场大会的“天派”头头们很着急，江青一伙就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调遣“地派”纠集人马冲进会场，大闹一通，把“天派”组织的这场大会冲散。当时相互厮杀、斗得头破血流的各派头头，大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江青操纵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第三司令部司令蒯大富，1970年11月间被拘留押解回清华大学受审查时，觉得冤枉，以为自己的行动都是“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行动，到头来怎么不见江青一伙替他开脱呢？蒯大富满腹委屈，给江青写信求救，申诉他在江青一伙指挥下建立的那些“汗马功劳”，为当前的遭遇“鸣冤”。可是这时江青已经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大权在握，哪里还会再理睬他们这辈走卒？蒯大富所写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其后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蒯大富于1987年10月31日刑满获释后，回顾当年往事，“坦诚而又痛心”地说：“22年前，我们那一代热血青年，天真而狂热，幼稚而残忍，昏然盲从而怀疑一切，激昂慷慨而又随波逐流，极端的行动变为人性的扭曲。于是，起初成为混战的工具，之后沦为浩劫的牺牲品。似乎也是在劫难逃。”

“五大领袖”中的女将谭厚兰，则于1970年6月被调回北京师范大学隔离审查，以后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她在狱里写的检查中忏悔说：“我是一个在‘文

化大革命’中一度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党、对人民犯了罪的人。”“回想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所作所为，目无法纪，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可以随便剥夺别人的人身自由，随便把人打倒。我在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就是这样对待谭震林副委员长和余秋里副总理的。我还对另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人身迫害。……我是罪人，也是见证人。”

（四）七任“办事组长”的不同下场

江青是一个权力迷，又是迫害狂。凡是她认为可疑或者不驯服的人，就会受到她的打击、迫害、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关进牢房。因此，在江青的“后院”，经常笼罩着恐怖的阴影，那里的气氛让人感到心悸。在江青手下工作，谁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这个小组一成立，组长陈伯达事事都得让她三分。自从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江青代理，她就将“代理”变作“取代”，实际上夺了陈伯达的权。尽管陈伯达很快“康复出院”，并不曾“外出”过，她却一直把这个小组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颐指气使，“指挥一切”，什么事儿她都插上一手，对谁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让人们有片刻安宁。

对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江青着眼挑剔、着力打击的是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从成立到消亡的三年间，这个办公室负责人被撤换过六次。前后任职的七届负责人，除肖力（即李纳）外，我和宋琼、王

广宇、阎长贵、矫玉山以及王力，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厄运。

我这个办公室召集人，江青一直看着不顺眼，在小组成员中也经常指责我“跟不上”。1966年8月下旬，就被她“找茬儿”令我停止工作并撤销了这个“召集人”的职务。

我被撤销了办公室“召集人”的“差事”，改由王力管理办公室的工作。1966年12月初，江青决定改变办公室的名称，成立“办事组”。办事组由宋琼、陈满池、杨子才、张文荣、王广宇五人负责，宋琼、陈满池分任正副组长。宋琼、杨子才、张文荣是从《解放军报》快报组调来的，陈满池本是记者站的副组长，他继续留在花园村记者站，始终没有到钓鱼台办事组来就职。没有多久，江青派到解放军报社的肖力，于1967年1月13日率领军报造反派夺权。宋琼及从军报一同到办事组的工作人员被江青打成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解放军报社造反派把宋琼等人揪回报社批斗。此后，办事组改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同年9月1日，王广宇又被江青强令“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回到马列研究院接受批斗，改由原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矫玉山分任正副组长。1968年1月13日，矫玉山又被江青诬为“特务”，下令逮捕，改派肖力为组长。

从1967年1月到8月31日，王广宇是任职最长的办事组负责人。1月初，王力、戚本禹都告诉他：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王广宇任办事组组长，矫玉山任副组长。办事组虽然实际上由王广宇管，却没正式宣布。王广宇任劳任怨

怨，不计较名义，始终刻苦勤奋地工作。江青仍常对他挑剔，对他找茬，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斥责。江青曾经骂他：“我看你总像还没睡醒似的，一见你就想批评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样没有精神？”一次陈伯达指着王广宇问江青：“他是办事组长么？”江青竟然摇了摇头。弄得王广宇十分尴尬。

钓鱼台 16 楼会议室隔壁是办公室接长途电话的房间，江青常拉陈伯达到这里个别长谈，“打通思想”。1966 年 8 月初，为了便于记录各地打来的电话，文电组特请中央办公厅三十九局电话总机技术人员来，在电话机上安装一个扩音机。这本是出于工作需要，极为平常的事，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它的用途。扩音机刚安上不几天，被拉着陈伯达过来“打通思想”的江青看到了，立刻“没事找事”，大发脾气，硬说是王广宇他们安装的什么“窃听器”。她把经办此事的王广宇找来严厉训斥，强令把电话机拆掉。

开会作记录本是一般惯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却不准作记录，常常因此找茬儿。她在口头上强调什么“机密性”，实际上是心怀鬼胎，一切言行害怕“记录在案”，留下痕迹。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头他曾吩咐：每次开会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总理办公室派人作记录。头一次，矫玉山、周家鼎来作记录，“平安无事”，江青没有反应；第二次改换王广宇来记录，周恩来刚开始讲话，江青一见王广宇在作记录，立刻问：“我们开会还要作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会议室顿然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叶群马上惊慌地说：“不是我叫来的！”这时

周恩来说道：“是我叫来的！”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周恩来是代表中央常委来钓鱼台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他的决定，就这样被江青粗暴地推翻了。这也表明江青对周恩来不尊重和对他的敌视情绪。

1967年8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后，第二天晚上，江青就叫张春桥、姚文元找王广宇谈话。张春桥说：“决定你马上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以后需要你的时候再叫你来。”王广宇回到马列研究院，就遭到造反派软禁，不让回家，逼他“揭发王力、关锋的罪行”。马列研究院造反派也不断地点他的名，对他施加压力。1968年3月4日晚上，陈伯达等3人突然来到马列研究院“造反总部”，逼王广宇“交待问题”——早先戚本禹曾让王广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取过一份鲁迅的手稿（《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原稿），取回后当即交给戚本禹。这时陈伯达突然前来讨要，并诬陷王广宇“卖掉了、私分了、销毁了”。他们不听王广宇申说，不容许他分辩，当即把他关进功德林监狱，后又关押在南苑的一个监狱，1972年1月又转押到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16日才被释放出狱。实际上，他们诬陷王广宇“卖掉了、私分了、销毁了”的这份鲁迅的手稿，早由戚本禹交给江青，当时仍收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里。他们拿这个来逼王广宇，只不过要捏造一个逮捕他的“由头”。

在王广宇之后担任办事组负责人的阎长贵、矫玉山也都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矫玉山是最早调到办公室来

的，一直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1967年1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总理联络员办公室、联合接待室工作人员时，矫玉山还带领办事组的同志参加了这次接见、合影。不料到1967年12月底，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从香港国际书店寄来的一个邮包。办事组保密室的人打开来一看，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作演员时的有关报刊和照片。他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江青的最大忌讳（当时称作必须“防扩散”的“核心机密”），唯恐遭江青怪罪，马上送交矫玉山。矫玉山看都没有看，立即送交担任江青秘书的姚文元。江青怀疑矫玉山看过这些材料，第二天就叫姚文元到办公室找他查问：邮件是怎样收到的？有哪些人看过这些材料？逼令矫玉山迅速写个报告。两天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会议室密谈，见矫玉山进来，江青竟然指着矫玉山说：“他们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人，要进行审查！”“他们是特务，是监视我们的，安了窃听器。”张春桥接着说：“是的，现在我连给上海打电话都不敢打了，就是安了窃听器！”1968年1月13日凌晨，矫玉山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江青下令以“特务”罪名拘捕，直接送进秦城监狱，被“审查”了七年半之久，1975年5月16日方获释出狱。

原任江青机要秘书并在王广宇被江青撤掉职务后一度担任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在办事组担任总支部书记的王道明，工作人员中两个最得力、最积极的张根成（来自解放军沈阳

部队)、周占凯(来自解放军济南空军部队),也被江青妄加罪名关进监牢。甚至担任江青警卫的孙立志,也被江青诬陷“偷”了她的钥匙,被抓进监狱关了七八年。

办公室和办事组前后七任负责人中,只有最后一位肖力“稳坐钓鱼台”,没有任何风险。1968年初,矫玉山被江青关进秦城监狱后,肖力即继任办事组组长。其时江青一伙抢班夺权闹得正凶,周恩来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交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都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切重大问题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处。这个“碰头会”,是党的体制被“文化大革命”冲垮后冒出来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权力机构。周恩来一直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每次会前,都由周恩来吩咐秘书赵茂峰拟定议程和通知,交由中央办公厅发送。有一次开会时,江青说,文革碰头会通知不发给文革办事组,给她的工作造成被动,今后应由文革办事组发通知。周恩来听了后,顾全大局,不愿让江青为这些事吵吵闹闹,回去就对秘书说,以后通知就由中央文革办事组办。但考虑到肖力初管办事组,周恩来怕她对这个工作不熟悉,就让秘书代肖力草拟一个会议通知的样子,好心好意地送去供她参考。不料江青却对周恩来说:“你看,连你的秘书都不放手,通知还得代拟。”周恩来回去把这事告诉了赵茂峰,说:“你给肖力写个检查吧。”秘书理解总理的处境,就照总理的意思办。赵茂峰说:“我就只好给肖力写了个检查,检查只写了一页纸,经总理看后发出。总理反倒有点过意不去了,因为是他交代的事,到头来又让我去检讨。我倒

没有什么,这是对‘四人帮’嘛。从这以后,发通知的权就在文革办公室了,但主持会议仍是总理。……”^①

在这样情况下,自然没人敢碰肖力一下。肖力担任组长直到党的九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陈伯达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获得了他们追逐的权力,“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工具的“历史使命”已告终结而“自行消亡”。

(五)她在“后院”也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除办事组的历届头头遭到江青的迫害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属的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部分成员,在江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也先后遭到江青一伙的诬陷和迫害。

1967年1、2月间,在江青伙同林彪煽动全国夺权风暴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钓鱼台相继成立了取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组、取代国务院文化部及全国文联的文艺组。前者的成员有王力、唐平铸、胡痴,由王力任组长;后者的成员有戚本禹、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由戚本禹任组长。其后又成立了理论组,也由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成员除唐平铸、胡痴相继遭到江青一伙迫害外,当时调到宣传组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李广文也遭到迫害。李广文原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部主任兼校委委员。他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63年进中央高级党校研究

^① 赵茂峰:《平凡中见精神》,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328页。

班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康生先前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分局书记时，李广文曾在其领导下工作过。李广文看穿了康生的真面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康生的罪恶，并于1968年10月8日在中央高级党校内贴出揭露康生的大字报。康生利用权势，唆使党校造反派对李广文批斗，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加以拘留。1969年11月被逮捕，冤狱历时将近10年。1979年8月13日，经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文艺组在沙滩《红旗》杂志社办公。被调到文艺组任副组长的青年作家金敬迈，以及文艺组成员李英儒、刘巨成等都受到江青的迫害，冤狱多年。金敬迈写的《〈欧阳海之歌〉创作前后》一文，详细记述了这一段不幸遭遇。

金敬迈原是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编剧。他因1965年10月出版所写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成名。这本小说的发行数量迅速达到二千万册，金敬迈一时成了广大青年读者崇拜的作家。江青得知这种情况，就以她将别人创作的“样板戏”攫为己有的类似手段，妄图把这本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打上“江记”的印记。江青采取惯用的手法，先对这本小说发出“指示”——提了三条“修改意见”，经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镗忠传达给作者：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一定要改掉。并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

作者听了陶铸的意见：“不要改，不要一听什么意见就改。”顶住没有改。金敬迈说：“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

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1967年4月初，江青将金敬迈从广州召来北京。4月11日，江青在京西宾馆当着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叶群等许多人的面，向金敬迈发难。江青一见金敬迈进门就劈头训斥说：“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架子！”接着又是一阵恫吓：“我告诉你，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①！我是为了保护你，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按：江青认为，“最后四秒钟”的描写，是写了欧阳海“对死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留恋”，是污蔑了英雄，是大毒草。）江青还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怎么来的？……我看你就是中‘黑修养’的毒太深，你还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嘛！你这是搞‘两个司令部’嘛！你到底是哪个‘司令部’的！”还说把引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两段话，“光删去不行，要消毒，要批判！”江青不给金敬迈喘息的机会，一口气骂得他无法下台。亏得周恩来出面解围，才使江青缓和下来。……

金敬迈被迫对《欧阳海之歌》作了修改。“不仅删去了《修养》中的两段引文，而且进行了批判。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这样一来，在江青看来，好像小说就变成了“她的”了。她对金敬迈的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江

^① 《雁南飞》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当时报刊上批判它“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国庆节后，戚本禹秉承江青旨意，就在文艺组召开会议批斗金敬迈。当时并未宣布他的“罪名”，戚本禹说：“金敬迈不能继续在北京工作！”

青让他参与领导“五一”节文化活动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纪念活动。“五一”节，金敬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的身分上了天安门；当天晚上，江青亲自带领他去见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毛泽东。江青肉麻地介绍说：“主席！这就是‘我们的作家’金敬迈同志。”5 月 23 日，又让金敬迈在首都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江青指派金敬迈任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副组长。……

金敬迈以后回忆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无限感慨地说：“一切都像演戏一样。不久，我成为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纪念文章的定稿人；又不久，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分上了天安门；再不久，我成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

但是事隔不久，江青的残酷迫害却又降临到金敬迈头上。这年国庆节前，谢富治、戚本禹等叫金敬迈去北京图书馆清理 30 年代涉及江青的书报刊物，送往沙滩中央宣传部办公室，锁进保险柜里封存。此事刚一办完，参与其事的文艺组成员刘巨成就被江青下令抓起来。关于金敬迈，江青说：“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国庆节后，戚本禹秉承江青旨意，就在文艺组召开会议批斗金敬迈。当时并未宣布他的“罪名”，戚本禹说：“金敬迈不能继续在北京工作！”

接着到来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金敬迈说：“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令。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阴

谋反对毛主席’和‘趁毛主席南巡时，阴谋绑架毛主席’的罪名，将我反铐双手，投入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里，七年零四个多月，2678天。然后，释放出狱，送河南许昌某农场劳改，485天。……两项相加，3163天。三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四人帮’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欧阳海之歌〉创作前后》

金敬迈在狱中饱受折磨和迫害，1975年5月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虽然年方45岁，却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了。

理论组由戚本禹负责，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内。调来主持全组工作的杨永志，原是《红旗》杂志哲学史组的编辑。以后又陆续从部队调来廖初江等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戚本禹交待给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刘少奇的全部著作，整理、编印出来“供批判用”，先后印出过十几本。1968年1月13日戚本禹被捕后，杨永志就被揪回《红旗》杂志社批斗，造反派竟诬陷他“包庇刘少奇”，说他对刘少奇“假批判，真包庇”。因他不堪忍受长期的残酷批斗，一度精神失常。他把白布单撕开，缠到头上“戴孝”，手里打个白幡，自言自语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光景凄惨，以后他又被谢富治抓到公安部关起来，直到1975年夏天才获得释放。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干部，都是由党组织从各地区各单位抽调到这里来的。这些同志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信不疑，怀着对毛泽东真诚的崇拜，以“反修防修”为出发点参加这场运动。尽管对这场突然

到来的政治风暴缺乏精神准备,还“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是基于对党的忠诚,对毛主席的热爱,无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力图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其时这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工作节奏十分紧张,特别是在办公室(办事组)工作的同志,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相当辛苦。当然,因为受到个人崇拜、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人虽然在有些事情上有怀疑和抵触,却不可能不执行照办,这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的说错话、做错事,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受到江青迫害的大多数同志,尽管艰难,还是顽强地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在那乌云滚滚、黑夜茫茫的日子里,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景,始终怀有希望,充满信心,坚信寒冰终将溶化,春天即将到来。大家的心愿没有落空,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高兴地看到了林彪的死亡和“四人帮”的毁灭,幸运地盼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为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日子。

历史是最无情的,对任何人都是最公正的。林彪、江青一伙已被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康生、谢富治死后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党已平反了林彪、江青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广大受迫害者得到了平反。正如金敬迈在自己的冤案平反以后所发出的无限感慨:“本来世事自有公论。谁优谁劣,谁个流芳百世,谁个已被或是将被钉在耻辱柱上,不在乎传媒如何说法,老百姓心头,早就刻着呢。不是有句词叫‘铭刻在心’吗?”他的这些话,正道出了千百万被害者的心声。

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

李 良 志

王辅一同志所著《项英传》出版后，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肯定、赞扬的同时，对书中的某些史实和观点，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和质疑，我对有的学者提出的批评是同意的，但对另一些学者提出的问题，如皖南事变前党中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估计是否有失误？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否应该肯定等，我认为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我认为，皖南事变前，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确有不准确和失误之处，这主要表现为从1940年秋到1940年冬，中央在分析蒋介石对日政策和对中共政策时，开始是对其黑暗面、危急性估计过头；旋即又来了一个大转弯，对形势过于乐观，对蒋介石暗中搞反共摩擦的决心估计过低，造成方针政策上的失误。

关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并立即对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苏关系、中德关系以及国内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

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仗着三国军事同盟的强大军事实力，加紧了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政策。在中德关系方面，德国再次扮演劝降角色。在中英、中美关系方面，英美担心日本南进，极大地改变了对华政策；英国放弃对日本妥协政策，重新开放被关闭3个月之久的滇缅路；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中立主义”，表示不承认刚成立的汪伪南京政府，并宣布对中国新的借款与贷款。当时的苏联，深知

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只是时间早晚，他们最担心的是德国从西攻苏，日本从东攻苏，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从而深知必须进一步增加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捆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手脚。1940年11月斯大林决定派崔可夫将军来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接着大批军火源源不断运抵中国。

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面前，蒋介石怀有自己的图谋和计划。他对日本的诱降和德国的劝降，其态度是明确的，即他不能搞什么蒋、汪合作，作新的卖国贼，但认为保持与日本的接触，对争得英、美、苏的援助，是非常有用的；他稍稍往日本方面靠一下，英、美、苏都会立即感到不安，他若再往英、美、苏这边靠近，日本也会很着急。这时，蒋介石俨然成了一个左右时局的大筹码。当然，蒋介石最为高兴的，是他可以利用新的国际形势，为他在国内搞反共摩擦服务。日本要拉他，他可以在反共内战方面同日寇达成某种默契；英、美、苏要靠他拖住日本，对他加剧国内国共摩擦或者会无可奈何，或者亦不至横加干涉。他欣喜地说：“局势急转直下，使人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抗战以来国际情势之好转，未有如今日”^①。

蒋介石决心在此种形势下加剧国共摩擦了，并很快将其摩擦重心由华北移到华中。

1940年10月上旬，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韩德勤统帅3万余兵力，在苏北发动了抢占黄桥的战役。10月19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给我军发出《皓电》，命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11月初，政府军李品仙、张义纯在皖中、鄂东“围剿”新四军。11月中旬，政府军第一三八师拟定作战计划，要对皖南新四军进行“扫荡”。接着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

^① 转引自陈枫：《皖南事变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下
子
多
事
不
可
少
也

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之后，蒋介石在江北集结了汤恩伯、李仙洲、张淦、覃连芳、孙桐轩、马彪、何柱国、霍守义等部共 29 个师约 30 万大军，准备进攻华中的新四军。蒋介石对孤悬在长江南岸的皖南新四军尤为重视，他一方面指定他们的北渡路线，限期北渡；另一方面又部署兵力，要趁他们北渡时予以消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种新的国际国内局势，是如何分析和估计的呢？毛泽东认为，目前国民党掀起的反苏反共“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加入德意日同盟的准备”，“蒋介石为要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均将给我党以大的打击，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① 认为“时局将急转直下”^②，国共有“永久决裂之可能”^③。“整个南方有变黑暗世界之可能。”^④ 为了取得苏联的大力援助，他致电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依斯基，告知国内危局：“蒋介石准备投降，近日发动大规模反共运动，企图为直接投降肃清道路。”请求苏联对蒋施加压力，以延缓“两三个月。”^⑤

在这种形势之下，毛泽东对全党的应变方针、策略、部署也作了周密的考虑，他拟定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其具体内容是：政治上坚决地、大胆地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投降面目；军事上则是当顽军发动军事进攻时，我仅在根据地附近进行自卫反击，不攻入顽军后方。为此，八路军须调 5 万人南下支援新四军。毛泽东认为，采取此方案，政治上有利，因可剥夺蒋之借口，但军事上不利，因“不能以实力制止投降”^⑥，我可能遭日蒋之

① 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1940年10月29日。

②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940年10月31日致彭德怀电。

③ 中央书记处1940年11月1日致周秦何叶电。

④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940年10月12日致叶项胡服陈毅黄克诚电。

⑤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依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⑥ 毛泽东、王稼祥：《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策略考虑》，1940年11月3日。

夹击。

第二方案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进攻。”采取此种方案“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出至少十万至十五万（以后改为20万人——作者注）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在原地抗日。”^①毛泽东认为，采取此方案，政治上有利之处是“可能制止投降”，不利之处是“给蒋以政治资本”，而军事上的好处是“可制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②

毛泽东认为：“不论目前采取何方案，如投降实现，最后也是严重内战，故整个军事部署，目前即须考虑。拟将华北的兵力组成三个纵队，以老黄河以南各军为左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鄂豫陕边；以汾离路、正太路、仓石路以北各军为右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陕甘川边；以两地之间各军为中央纵队，其精锐约五万，或出左纵队方向，或出右纵队方向，依将来情况决定。”^③以后毛泽东又提出“组织一支2万左右的挺进军，乘反共军封锁未成，从其间隙打到他后方去”，“纵横驰骋于皖西、豫南、鄂北、陕南广大地区，每次袭击一师一团之反共军而各个消灭之。”^④他还指示在华中的黄克诚、罗炳辉，须在半月或一月筹集50万元以上“贮积备用”^⑤。在此期间，党中央决定对皖南新四军驻防采取让步，多次催促叶挺、项英尽快北移。

历史证明，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央认定蒋介石将立即投降日寇、全面反共、国共将“永久决裂”的分析和估计，确有过头之处。因蒋介石究竟不同于汪精卫，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是决定一切的，只要这个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蒋介石就不可能真正投降，因而他也不可能真正与中共全面决裂，发动全国内战。但我们又应该说，中央对

①②③ 毛泽东、王稼祥：《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策略考虑》，1940年11月3日

④⑤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1940年11月3日。

当时形势的上述分析和估计、以及有关我党应变的准备和部署，是无可非议的，不应责难的。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谁也不能像小说中描写的诸葛亮，料事如神，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总能作出精确无误的预测；此外，对于党的领导者，把时局的黑暗面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困难设想的多一点，对武装全党思想，提高警觉性，也总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不应对此作过多的计较，作事后诸葛亮。

问题是：在国际国内大局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对蒋介石动向的分析，旋即又突然转到另一极端。由强调蒋将立即投降、全面反共，转为强调他对日投降远未讲好条件，强调他反共摩擦的困难性和欺骗性，而对我之政治优势、军事实力又作出过高估计，在党的行动方针上淡化了皖南新四军的北移的紧迫性。

1940年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仍怕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①

15日，他致电周恩来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认为蒋介石对我发动军事进攻，存在五大困难：一、我取缓和态度，何应钦缺少挑拨的借口；二、蒋很怕八路军南下，尤怕我从西北突出；三、蒋怕我在皖南不动，扰乱其后方；四、蒋与顾祝同怕我消灭韩德勤；五、蒋还未同日寇讲好投降的条件，其剿共战场多有不便，难以形成。故“这次反共高潮是可以打退的。”^②

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等：“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指何应钦，作者注）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桂林办

① 毛泽东：《利用蒋怕乱子闹大之顾虑进行政治宣传》，1940年11月12日。

② 毛泽东：《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1940年11月15日。

事处,作者注)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无其他可靠办法。”毛泽东说,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上(即佳电,作者注)表示缓和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在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①同日,毛泽东还怕项英不明白他“拖”的新战术,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专电叶挺、项英:北移“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需认真准备北移。”^②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准备北移,而不是迅速北移。

29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等:“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目前蒋介石向我军进攻都是不可能的。佳电在各方面起了很好的影响,使得国民党不好回答,借此下场呢?不甘心;不下场呢?又怕将来不好下场。”^③

第二天,毛泽东又电示周恩来等,再次阐述蒋的吓人战术:“此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李任潮(即李济深,作者注)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在他统治下,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固,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其内部不稳固。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外部不稳固。”毛泽东断定,蒋现在奉行的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一般战略攻势”,“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毛泽东嘲笑冯玉祥对蒋的估计“所谓惹急了他会撕

① 毛泽东:《软硬兼施打破蒋介石的反共诡计》,1940年11月21日。

② 中央书记处:《以皖南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1940年11月21日。

③ 毛泽东:致董必武、并告恩来、胡服、项英、德怀、克农电,1940年11月29日。

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我，并不用以决定政策。”^①

11月30日，日本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华基本条约》，正式承认汪精卫伪南京国民政府，毛泽东速电周恩来等：“据同盟社悉，汪精卫任正式主席，不要林森了。……日本从二十四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打重庆危机可能到来……他们似已开始发慌，不久还要发大慌的，吓人政策已经破产，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我们要准备新的攻势了。”^② 所谓新的攻势，就是我军在苏北举行的曹甸战役。

曹甸战役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曹甸位于江苏淮安东南，兴化以北，其所在一带为韩德勤部盘踞，隔断了我军苏北与皖东间的联系，实为一大障碍。11月1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开始作战准备，29日开始发动攻击，目的是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打通苏皖通道。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出动10个团的兵力，分三路进攻韩部。战斗开始后进展很顺利，很快占领了许多县和村镇，12月1日韩德勤向蒋介石发出特急电文，告知保六旅两个营长伤亡，“官兵伤亡过半，弹药消耗殆尽，完全被匪包围”，盐城方面“匪军以全力猛攻”，拟令八十九军主力等“作死中求生之计。务恳钧座顾念苏北大局，速调大军驰援，并即日派飞机送款接济，以挽危局。”^③ 12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告知连日我各部向西攻击，已突破三道防线，韩部被我军截断，缴枪千余。12月9日，毛泽东电示刘少奇等：“如确知韩德勤、顾锡九在安丰、曹甸、企图北窜，则我进击时，宜放一路，让韩顾能活命为好。”^④ 可见此役不

① 毛泽东致周叶并告德怀、胡服、项英。1940年11月30日。

② 毛泽东致周叶、董老、克农，并告叶项、胡陈、德怀。1940年11月30日。

③ 《新四军参考资料》(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342页。

④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940年12月9日致胡服、陈毅、克诚电。

仅出动兵力多,攻势猛,而且曾危及韩德勤的存亡。但是,由于韩德勤拼死守卫,曹甸经多次强攻未下,战役不得不于12月17日结束。此次战役,韩德勤部被歼8000人,我亦伤亡2000人。

曹甸战役是在轻敌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它暴露出我华中兵力不足。对蒋介石来说,这既使他感觉他在苏北仍有余勇可贾,同时更刺激他要尽速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决心,而无须顾虑投鼠忌器。12月10日,蒋致顾祝同“特急”电:“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进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指示顾祝同“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① 蒋介石在曹甸战役进行中,就对消灭我皖南新四军下了这样的死命令,这是当时我党中央未曾料到的。中央对形势仍是一片乐观情绪。毛泽东在12月16日、19日和23日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仍重复地说:“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②、“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③,蒋“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④

蒋介石到底是一个“精于计算”,又善于逢场作戏的政治家。韩德勤抢占黄桥战役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极为恼怒,但周恩来说,他虽决心“复仇”,但“捏住鼻子没有说话”^⑤;这次曹甸战役,韩又遭沉重打击,蒋下令对皖南新四军要“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

^① 《蒋介石关于新四军若不如期北移立即将其解决致顾祝同电》,1940年12月10日。《新四军参考资料》(二),第377页。

^②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940年12月16日致胡陈,并告叶项电。

^③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940年12月19日致彭左、叶项、贺关、聂彭、刘邓、吕程、宋肖、朱陈罗、胡陈电。

^④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940年12月23日致胡服、陈毅、克诚、雪枫、云逸电。

^⑤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

容”，可是他不仅未大肆嚷嚷，而且选择西安事变中他回南京的12月25日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在重庆召见周恩来，作了一番“极感情的神情”^①的长篇谈话。周恩来于翌日将蒋的谈话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得以见面为好。

“你们一定要按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你要我发饷我发了，军政部也要发的。我弄得没有办法，天天向他们解释。

“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你说河北太小，其实我为你们着想，在现土瘠地争夺，实在是太小了。要开到河北，在照划定的区域，多么大，多待你们发展，可实施你们的抱负。现在你们分兵四出，指挥训练不好，河北也没弄好，如果集中起来，对内对外都可以做得好。现在你们这种做法，简直连军阀也不如了。

“我是发展，你低落了，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

“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

^① 《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年12月26日。

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注:靠不注)。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你说封锁西北,完全是防守,华北绝不会封锁,我可负责担保。

“政治问题,都好解决。特种委员会,没有这种组织。文件你们也发了不少。你说的各种训令,我可再查。只要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军纪,一切都好讲。一切待遇如有丝毫不公,你可找我。

“你说下级调不动,可不是事实。你们中央的决定,一定生效,目前你们中央没有决心。你应该将我的话全部告诉你们中央,不可(然)你们不失败,(也)会弄得大家反对你们,你们自己队伍里也会有不同意见。

“我现在处的环境如你一样,困难是一定有的,不过你一定应该将我的话转告你们中央,否则我们见面也说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对皖南事变前夕蒋介石这一席重要谈话作出准确判断,是极为重要的,只可惜党中央未能作到这一点。周恩来认为,蒋是“大灌米汤”^①,是“恐吓之余,又加上哄的一着”,认为时局的发展不过是“半拖半打,半打半拖”^②。毛泽东在12月30日、31日致周恩来,致几个中央局等的电报中,则说现在是蒋介石“着急”,我们并不着急,“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让他们去剿,反得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③ 此电对蒋介石进攻山东的决心有了新的认识,但对顾祝同火速从浙赣闽三省调兵遣将,在皖南新四军周围共集结7个多师、8万余兵力,设置袋形包围网;

①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1页。

② 《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年12月26日。

③ 毛泽东1940年12月31日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

对第三十二集团军具体拟定了《围歼皖南新四军计划》，则十分隔膜，毫无察觉。甚至还说：“蒋介石及国民党虽然气势汹汹的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①

以上我们引证了党中央从1940年10月到12月底的大量电报。从这些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1月12日以前，中央对当时形势的黑暗面、危急面、不利面估计过重；11月12日以后，对形势中的光明面、缓和面、有利面估计过头，轻率得出蒋搞的不过是“流氓”、“吓人”战术，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因而这次反共摩擦“只会比上次小，不会比上次大”，北移可“再拖一两个月”等错误结论，并在这种乐观、轻敌思想指导下，进行了很不合时宜的曹甸战役。我们知道，项英对离开皖南一直思想不通，迟迟下不了北移的决心，他对中央的许多好意见、批评，可说一句也听不进去，但是他对中央指示“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可谓全部接受，彻底地听进去了。以至当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出征北移时，为时已晚，全军覆没。皖南新四军的悲惨结局，项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但难道中央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说中央对当时的形势及蒋政策上有失误，难道不是客观的事实吗！

^① 毛泽东1940年12月30日致周恩来电。

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团和美军 观察组访问延安始末

袁 武 振

1944年夏，由国内外各大报刊著名记者组成的大型新闻团体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和晋绥抗日前线采访。接着，由驻华美军司令部派遣的美军观察组，也分批抵达延安。他们的访问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封锁，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闻和外交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地位。

—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包围和封锁，“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随即于第二天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并向党内下发《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与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多方接触，“向英美人士特别是其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同时向他们暴露中国统治者之黑暗，以争取英美政府人士对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之同情，以争取他们对中国政府施行某些压力，以改进中国对

日反攻之准备”^①。此后，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与美国官员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解放区。1942年8月6日，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兼驻华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向正在重庆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柯里转达了周恩来的这一要求。1943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与戴维斯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视察员去陕西、山西等地考察。他还指出，应当一开始就告诉国民党，这个组织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常驻性的。

美国在参战后不久，其驻华外交官员和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就对消极抗日、腐败无能的国民党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去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人那里得知了解放区的一些真实情况，从而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从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维护美国的利益出发，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可行的，建议美国政府实行富有弹性的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改变其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建立联系。特别是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对美国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一事更为积极热心。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乘回国述职之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派代表团访问中共根据地的建议。戴维斯在6月24日的报告中，进一步建议美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派一个军事观察团进驻那里”。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在给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的报告中，再次提请白宫加快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步伐，认为此事应由总统直接出面提出请求。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政府决定接受外交官的建议，实行对国共两党都支持的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直接派观察团去延安，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2月9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

^①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88页。

询问是否可派美军观察团去“山西”和“陕西”考察军事。

与此同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也多次要求去延安参观访问。据时任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介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包括外交人员）与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之间发生了经常的、良好的接触。通过接触，大多数记者，不论其个人政治观点如何，都一致认为他们能够从八路军办事处获得最可靠的事实和有说服力的分析：中国在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日胜利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和应当做些什么。”1944年2月，他们联名上书蒋介石，再次提出访延要求，并说明“这是由驻居当地的几乎是全世界的通讯记者签名的”。对外国记者的访延要求，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多次表示欢迎。3月9日，周恩来副主席代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中共中央致电外国记者再表欢迎之忱。周恩来还通知驻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

国民党深怕外国记者的访问冲破他们对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造谣诬蔑，因而设置重重障碍，进行刁难。在外国记者的一再要求下，蒋介石只得表示同意，谎称“邀请外国记者赴延安与陕北参观一事，亦为本人早已计划”。但他私下又发布侍秘第17158号代电，责令有关部门加以抵制。军令部、中宣部、外交部、军委办公厅遂拟定《外籍记者请发采访证审核办法》，严格规定审核手续。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也拟定《招待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在估计外国记者赴延安采访的重点问题之后，制定了对外国记者进行控制、施加影响的措施。此外，国民党中宣部对赴延的外国记者也作了精心选择，以控制外国记者中政治倾向的平衡，并规定了记者团统一行动、不准个别活动的纪律。为装潢民主门面，国民党除指派中央社和官方报纸的记者参加记者团外，也让个别民间报纸的记者参加。结果在重庆组成了共计21

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包括：

国民党官方领队 2 人：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保樵、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

外国记者 6 人：冈瑟·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哈里逊·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莫里斯·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科马克·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N·普金科（塔斯社）；

中国记者 9 人：孙昭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烺（《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镛（中央社）、杨嘉勇（中央社）；

国民党中宣部陪同人员 4 人：魏素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

在记者团组建之际，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了大溃败，这使美国政府十分震惊。而外国记者进入延安后对解放区真实情况的报道，更增强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为双方建立直接联系奠定了基础。6 月 21 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当面要求蒋介石允许美国派遣军事观察团进驻延安。6 月 23 日，蒋介石被迫同意美方要求，但坚持把名称改为“美军观察组”以降低规格。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成员于 7 月 22 日和 8 月 7 日分两批乘飞机抵达延安。观察组组长是包瑞德上校。成员中有步兵、信号兵、航空兵、军医等，分属于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时情报局各系统，多数人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观察组人数先为 18 人，连同以后陆续补充、接替的人员，前后共约 30 余人。驻华美军司令部给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华北日军

和中共方面的情报,分析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及其能力的潜在贡献,提供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其战斗力价值的最有效办法和为海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①。其中军事方面由包瑞德等人负责,政治方面由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和雷蒙德·卢登负责。1944年10月,谢伟思奉召回国期间,由戴维斯到延安顶替。

二

中共中央对记者团的接待工作十分重视,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持这一工作,并责成中央军委兼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外事组组长叶剑英具体承办。记者团到来之前,周恩来召集了多次会议,向延安各有接待任务的单位介绍了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目的,制定了接待工作的方针政策,要求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接待,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工作情况,准备解答记者临时提出的问题;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既要向记者团介绍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也要向他们说明存在的困难和错误及我们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办法;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中外记者交朋友,以利于我们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记者者在参观访问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要做解释工作,以揭穿国民党的造谣诬蔑,提高记者团对我们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对国民党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提出的故意刁难或挑衅性问题,要予以解答或回击;至于记者中有人要求个别谈话,应当欢迎,以便我们打破国民党的控制,达到区别对象、区别对待、深入宣传争取的目的;生活方面的接

^①〔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译本,第31—32页。

待要热情周到，在物质上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可铺张浪费^①。周恩来和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还从各机关借调了陈家康、徐克立、柯柏年、浦化人、区棠亮等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参加接待工作，并由浦化人按战时各国惯例审阅签发外国记者的新闻稿，柯柏年负责检查中国记者的稿件。

1944年5月17日记者团从重庆出发后，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安排，先后访问了西安及阎锡山总部所在地克难坡。5月31日，自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次日清晨，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亲率周恩来的政治秘书陈家康和《新华日报》记者徐克立夫妇及警卫人员前往记者团住宿的村庄凉水崖迎接，并陪同他们参观固临、延安及南泥湾。在南泥湾，记者团参观了三五九旅的步兵团、炮兵团、伤兵医院、干休所和八路军开垦南泥湾的实景，这些参观使记者们震动很大，他们亲眼看到人民军队有着与国民党军队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武器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吃的穿的是自己生产的成果。而在伤兵医院的见闻，更使记者们震惊：药房架子上是空的，仅有的几个瓶子里装的全是自己配制的中草药丸子；医生手中仅有的几副听诊器都残缺不全，用橡皮膏补了又补；病房里则传出一片痛苦的呻吟。医护人员诉说了胸中的愤慨，揭露了国民党对边区惨无人道的封锁，王震旅长呼吁记者们公开事实真相，给八路军以人道主义的声援。外籍记者爱泼斯坦和普金科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重庆政府运送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国记者也表示一定将此情况反映出去，而那些一路上兴风作浪的国民党记者则无颜再挑衅闹事。

6月9日，记者团进入延安，下榻南门外的边区政府交际处。作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客人，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记者团抵延的

^①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201页。

当天晚上，叶剑英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名义设宴为其洗尘，杨尚昆秘书长和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等参加。第二天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军委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贺龙、徐向前等出席作陪。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德致欢迎词，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讲话之后举行的音乐晚会，以《同盟国进行曲》开始，然后演奏了各种民歌及《黄河大合唱》，会场洋溢着反法西斯的战斗友谊。

12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客厅接见并宴请了记者团全体成员。接见长达3小时，席间，毛泽东首先致辞，对记者团来延表示欢迎，对第二战场的开辟表示祝贺，随后逐一回答记者们的提问。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同记者团一起观看评剧《古城会》等节目。周恩来从接见、宴会到晚会一直陪同，秦邦宪参加翻译工作。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向中外记者作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报告，着重介绍了敌后战场至1944年3月抗战7年来敌、伪、友、我4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业绩，指出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光明前景，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对边区搞摩擦以致攻击、包围、封锁等种种破坏抗战的行径，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来。”^①6月25日，朱德和叶剑英还应斯坦因和福尔曼的要求，分别与他们各进行了4个小时的谈话，向他们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1）从军事观点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2）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及与国民党、美国、英国各武装力量

^① 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

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3)战后共产党军队为保持远东和平，在军事方面能够担负的任务等。

6月24日，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吴玉章、周扬、范文澜、丁玲、艾青、柯仲平、周立波、吴伯箫、陈家康等数十人出席。诗人柯仲平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般情况后，丁玲、吴伯箫等几位作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在会上作了关于晋察冀文化工作情况的报告。

6月27日至7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待了记者团。时值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李维汉秘书长主持了接待工作。为了使中外记者能够更自由地提出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也为了语言上的方便，接待是分别进行的，首先由记者书面提出问题，然后由有关部门按问题作情况介绍，并发给书面材料，同时回答记者的提问。

第一次接谈是综合介绍。首先由李维汉秘书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并当场发给记者书面材料《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回答了记者临时提出的问题。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作《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指出：我们的总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面，边区作了4件事：抗战、团结、民主、生产^①。外国记者对李鼎铭的讲话很感兴趣，并提出要同他就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是否有权的问题进行座谈。通过与李鼎铭自由座谈，他们说李鼎铭是“有职有权的”，“他对我们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以后的接谈，是由有关主管部门分别向中外记者介绍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主要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介绍边区的民主政治，即边区的选举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回答外国记者书面问题的谈话》，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藏。

制度和选举方式；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介绍边区的行政机构；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介绍边区的财政收支、税收、人民负担和工作人员的供给制度等问题；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介绍边区的劳动政策和合作政策；建设厅副厅长霍自乐介绍边区的工业、农业和私营工业的政策；教育厅厅长柳湜介绍边区的教育制度和施教方针；边区贸易局经理叶季壮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分别介绍边区的贸易活动和边币的发行、银行的金融等问题。他们的情况介绍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满足了记者们的要求。

与听取情况介绍交替进行，记者团参观了延安市容及附近地区的工厂、机关、学校，如《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被服厂、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工厂、光华农场、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洛杉矶托儿所、医科大学、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多次观看了文艺演出，并参加为庆祝联合国国旗日在文化沟举行的4万人群众大会，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了解。

7月12日，记者团全体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夏南汉神甫离开延安返回重庆。8月中旬，外籍记者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普金科和国民党中宣部的张湖生离开延安，赴边区的绥德等地参观访问。8月22日，由袁任远专员、杨和亭副专员主持，绥德绅士安文钦、刘绍庭、刘述三、张喆卿、王德安、丁子长、张敬斋、王文卿以及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霍自乐等和他们进行座谈。

8月30日，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3人，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根据地。通过日军马坊据点时，适值八路军攻克该地，遂参观了作战现场，并采访日伪俘虏。8月中旬，爱泼斯坦等进入晋西北军区第八分区，参观分区医院和兵工厂等，实地观察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夜袭敌战略据点汾阳的战斗。10月下旬，外国记者由晋西北回到延安后不久就相继离延返渝。中国记者和外籍记者夏南汉在

延停留1个月零2天,在边区42天,其余外籍记者在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则逗留了近5个月。

三

对美国政府第一个官方代表团——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到来,中共中央予以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在观察组到来之前,中央制定了接待方针:第一,要积极主动地帮助观察组做好工作。对观察组提出的问题,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但我们又要坚持我们自己的外交原则,坚持自己的立场,决不能无原则地让步。第二,在生活上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使观察组成员能够适应延安的环境,但也要量力而行,不能铺张浪费。第三,观察组在延安要长期住下去,必然会同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广泛接触,广交朋友,建立友谊,因此我们必须时时提醒他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气节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任何外国人都必须尊重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风俗习惯,不得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中国来,更不能搬到延安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教育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要维护国格、人格,既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的分寸。^①

观察组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社论,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加上了“战友们”3个字。在这篇社论里,毛泽东指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社论预祝观察

^①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192—193页。

组的工作成功,并且“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①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向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② 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主席、杨尚昆秘书长、陈毅军长、聂荣臻司令员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李维汉秘书长等中央和边区党政军负责人先后多次会见和宴请了观察组成员,积极对他们开展工作,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及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观察组先下榻交际处,后移驻延安北门外联防司令部的几孔石窑洞正式办公。中央军委派黄华、陈家康管理他们的驻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对观察组的活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作了公开报道。

8月3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叶剑英参谋长从总体上向观察组介绍了共产党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等15块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叶剑英归纳说:“从整个敌后战场的形势,可以看出以下三点:一、山区包围平原;二、广大乡村包围城市,使城市孤立;三、主要交通线插在我区之间,造成许多走廊,很多铁路、公路夹在这些走廊之内,使我军有随时截断这些走廊的可能。”叶剑英介绍以后,观察组全体起立,包瑞德上校致词说:“今天,叶将军所作的报告是很有趣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叶将

^①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73页。

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作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此后，叶剑英派情报处副处长丁甘如等同美军观察组保持经常联系。

继叶剑英之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在8月6日、8日、9日连续3次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华北战场的情况。8月10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向观察组作了关于新四军情况的介绍。12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向观察组介绍了他所负责的军队和地区情况。此后，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贺龙和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介绍了晋绥边区，晋冀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介绍了晋冀豫和冀鲁豫边区，前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介绍了山东军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分别介绍了八路军的训练和政治工作情况。仅在头两个月中，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就向观察组全体人员作了10个报告。

除举行大型的报告会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经常不拘形式地同观察组成员会见、交谈。在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间，毛泽东和谢伟思作了多次长谈，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战时战后的方针政策^①。毛泽东谈话的基本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坚定的，现在为中国的抗日民主事业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不管外国人对此赞成还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都要坚持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挑动内战，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避免内战，同时也希望美国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旦内战爆发，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不要支持国民党这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只能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比的政府。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扩大政府的基础，如果不能立即成立联合政府，也应就此问题

^①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详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进行谈判,召开党派会议来制定建立联合政府的详细步骤。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不论美国在战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我们是否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枪一弹,中国共产党都将继续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同美国合作,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协助美国空军人员、在美军于华东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等等。战后,中国共产党也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理解,因为美国对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能够发挥作用。中国必须实行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提高。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中国革命需要国际的援助,但我们决不躺在苏联身上,苏联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它自己的困难。

在听取情况介绍的同时,为了能直接了解八路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观察组还到延安附近的八路军驻地实地考察,交流经验。8月17日和10月9日,科林上尉和包瑞德上校等先后在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作了两次美国陆军训练方法的讲演,并作了爆破表演及爆破材料使用方法的介绍。8月24日至26日,包瑞德上校和观察组其他成员在叶剑英的陪同下,乘卡车前往距延安45公里的南泥湾,考察三五九旅的战术训练方法。10月17日至21日,观察组成员乘吉普车到距延安130公里的绥德,参观已迁到此地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与同学们亲切交谈。为加深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了解,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大体按八路军官兵的生活方式,住简单的窑洞,吃简单的饭菜,并参加修筑机场等劳动及一般军民联欢活动和军民集会。

除在陕甘宁边区活动外,观察组还派出人员分赴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考察,分发气象设备和药品。被派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是科林上尉、约翰中尉和希契上尉。他们于9月4日出发,11月5日返回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的是卢登、彼得金中校、多姆克上尉、

惠特尔赛中尉及格雷斯等5人。这个小组于10月6日从延安出发,5天后抵达绥德,然后东渡黄河,穿过同蒲铁路,直抵晋察冀边区的阜平,途中主要靠步行,有时骑骡子。时值日寇向西推进,八路军专门派出一支队伍作前导,保证他们顺利到达目的地。观察组成员在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历时4个半月、行程3000余公里的访问调查,亲眼看到侵略者滥肆烧杀等暴行,更看到八路军英勇顽强打击敌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1945年春,惠特尔赛奉命到太行山根据地,和一名中国摄影记者一起访问一个靠近敌占区的村镇,不幸与敌遭遇,当场壮烈牺牲。延安军民闻讯深表哀悼,朱德总司令特将观察组在延安使用的食堂命名为“惠特尔赛纪念堂”,并为纪念堂匾额题字。观察组医生卡斯伯格少校与外国记者爱泼斯坦等前往晋西北及汾阳抗日前线。他们有时昼夜随部队行军,有时同中国医护人员一起守护伤病员。9月下旬,卡斯伯格等参观了晋绥军区第八分区军民袭击敌人汾阳据点附近的飞机场、火车站、发电厂和火柴公司的战斗。汾阳之战我军告捷,群众热烈慰问部队和这些美国朋友。这次访问以后,卡斯伯格少校写下了根据地医疗情况的报告。

四

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对延安和敌后解放区的访问,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延安和各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及广大敌后军民的英雄业绩,传播到了大后方和全世界,使国内外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英美等盟国也开始关注和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敌后战场。

在参观延安和晋西北时，许多外国记者就已表明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电影，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与此同时，解放区的情况也被如实地报道出去。1944年7月1日，在毛泽东接见记者团后不到20天，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即刊载了毛泽东对记者团的谈话；是日，美国《纽约时报》也发表根据驻延记者报道写成的《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8月3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国之呼声》的广播中，广播了《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刊登的由驻延记者发出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并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生产自给；八路军办的医院效率最高，能克服各种困难，但是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八路军很难从外面得到药品；在共产党领导地区，已经广泛地实行了民主等。

记者们返回重庆后，写下了更多介绍解放区的文章和书籍。许多中国记者在报上或私下如实介绍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的《延安一月》一书，较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见闻和感受。

美国记者福尔曼所写的《中国边区的报告》（一译《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把他在边区数月的见闻和八路军对日抗战的事迹写成生动的故事，并从他所拍的1000张照片中，选出最好的65张作插图，又有15个敌后根据地的珍贵地图和速写。该书大部分描写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的状况。

斯坦因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著文说：“在封锁线后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5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他在《英国新闻时事报》上发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民主，

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的。1946年，斯坦因又在美国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武道是国民党中宣部的顾问，回到重庆后，他在新闻界联席会议的讲话中说，他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是反对的，可是这次到了延安和晋西北，证明他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八路军真是能打仗，他亲眼看见了日本俘虏，吃过日本的纸烟和罐头。在其为重庆《大美晚报》（英文）撰写的《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从8个方面介绍了他在边区的所见所闻：1、老百姓生活进步；2、土地革命已停止；3、医药设备不够用；4、人民都有选举权；5、适应抗战的学校；6、强烈的抗战意志；7、言论出版自由；8、我看见了战斗^①。他的讲话和报道引起重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爱泼斯坦在印度《政治家》日报上发表《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一文，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此后，他又为《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大型报刊写了20多篇出色的报道。1945年他到美国之后，经过两年的奋斗，又出版了一本反映中国革命的巨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读了这本书后，曾写信给爱泼斯坦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成果，既是明快、流畅的散文，又是十分精彩的报道，而且也是聪明、才智的结晶。”1951年，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离开美国来到中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于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先后担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执行编辑、总编辑，并任全国政协常委。延安之行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回忆访延情景时说，一到延安他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而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会在中国

^① 1944年11月13日《解放日报》。

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①。

观察组成员大都是年轻的中下级军官和外交官，他们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来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耳目为之一新。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思考分析，从延安向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批军事、政治报告，仅谢伟思一人从1944年7月到10月的4个月时间里，就写了51份政治报告，1945年2月到4月又写了26份。在这些报告里观察组描绘了一个光明的中国，走向胜利的中国，与国民党统治区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新天地^②。1944年7月28日，谢伟思在他发出的第一篇报道中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9月4日，谢伟思在报告中综合在延安6个星期的观察，认为共产党的积极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练精良，信仰坚定，自信、坚韧、实际、自我检讨、态度科学、有适应力、有制度、有条理、有诚笃与团结之精神，民主态度、廉洁。”据此，他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

观察组在报告中还真实地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确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是坚强有力的，共产党已控制了敌后广大农村并深得人民拥护。1944年9月30日，包瑞德在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受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和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本质较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

^① 1985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② 美军观察组的报告详见(美)约瑟夫·伊谢瑞克编：《在中国失落的机会》，1974年纽约版。

旺盛。”11月7日，戴维斯报告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观察组在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发展与中共的友好关系，与中共合作抗日。谢伟思认为美国“不能无期限地担包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片面地支持蒋介石只能加速中国内战的爆发，而这对中国、对远东、对美国在华利益都是灾难性的。他建议美国政府实行不偏袒地支持国共双方的政策，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包瑞德也主张通过美援来加强美国与中共的关系，首先提供中共所需的武器，如自动火炮、迫击炮和通讯器材，来帮助中共部队对日作战，并说明这是观察组成员们的“强烈愿望”。

观察组在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活动，以及他们自延安向美国政府发回的大量报告，给美国政府和舆论界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加深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了解，使中共获得了国内外人民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促使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坚持留在抗日阵营内。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发展，1944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以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其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做出了扶蒋反共的错误抉择，观察组的骨干成员因此先后被调离。观察组的地位开始下降。1946年4月20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结束工作，组长耶顿和部分成员离开延安。其他人员转归北平军调部领导，并于6月24日被正式命名为延安联络组，1947年3月11日全部撤离延安^①。

^① 关于原美军观察组最后撤离延安的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周恩来年谱》及李银桥回忆为1947年3月11日即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前夕（《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页），金城回忆为1946年冬（《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197页），本文暂从前说。

建国初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演变 及中央人民政府调整的原因

李 格

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其机构组成与多数外国政府的一个显著不同是，政府机构中不仅有行政系统，而且有党的系统。即中央人民政府实际由党、政两套机构组成。这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不能不注意的重要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党在政府中的领导系统主要分为“党委”和“党组”。

当时，中共中央规定，凡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共党员，除中央允许外，须一律参加党的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各支部由政府各部门党委领导，各部门党委则直接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党委的基本工作为：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决议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正确地团结党外人士；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及业务，成为执行任务、奉公守法、遵守纪律的模范；统一领导吸收党员、征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及执行党的纪律等。共同纲领时期，中央人民政府中党委系统的变化不大。

“党组”，是政府内党的系统中最重要领导机构，在政治上领导党委。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党中央对于中央政府的领导及中央方针政策的执行。党组由中央人民政府内担任负责工作的中共党员组成。共同纲领时期，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组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10月—1952年8月，为“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时期；1952年8月—1954年9月，为政府党组系统进行重大调整时期。

一、“政务院党组干事会”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的党组系统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党组小组”、“分党组干事会”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其中，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等机关分别组成的党组，称“党组小组”；各指导委员会及其所属的部、会、院、署、行等机关联合组成的党组，为分党组，称“分党组干事会”；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等机关联合组成的党组，为总党组，称“政务院党组干事会”^①。

人们通常以为，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这一机构，只是当时政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党的最高领导组织。实际上，在1952年8月以前，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是中央人民政府党内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主要通过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这一层组织进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共由11人组成，成员是：周恩来、董必武、陈云、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刘景范、李克农、李维汉、齐燕铭。周恩来任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董必武、陈云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因此，在中央人民政府刚建立的近3年时间内，周恩来既是政务院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中党的系统最高领导人。

这个时期，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负责人，主要由政务院及各委、部、会、院、署、行等机构中作行政领导的中共党员担任。但另有15个机构，因主要行政领导是党外人士（或公开身份是党外人士），党组负责人则由这些机构中任副职的中共党员担任。当时，中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习惯上也称“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

央人民政府主要部门行政与党组负责人的情况如下：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党组书记：周恩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党组书记：董必武；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党组书记：陈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党组书记：陆定一；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党组书记：刘景范；内务部长：谢觉哉，党组书记：谢觉哉；外交部长：周恩来，党组书记：周恩来；公安部长：罗瑞卿，党组书记：罗瑞卿；财政部长：薄一波，党组书记：薄一波；贸易部长：叶季壮，党组书记：叶季壮；重工业部长：陈云，党组书记：陈云；燃料工业部长：陈郁，党组书记：陈郁；纺织工业部长：曾山，党组书记：曾山；食品工业部长：杨立三，党组书记：杨立三；轻工业部长：黄炎培，党组书记：龚饮冰；铁道部长：滕代远，党组书记：滕代远；邮电部长：朱学范，党组书记：王诤；交通部长：章伯钧，党组书记：李运昌；农业部长：李书城，党组书记：罗玉川；林垦部长：梁希，党组书记：李范五；水利部长：傅作义，党组书记：李葆华；劳动部长：李立三，党组书记：李立三；文化部长：沈雁冰，党组书记：周扬；教育部长：马叙伦，党组书记：钱俊瑞；卫生部长：李德全，党组书记：贺诚；司法部长：史良，党组书记：李木庵；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党组书记：陈绍禹；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党组书记：李维汉；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党组书记：廖承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党组书记：陈伯达；情报署长：邹大鹏，党组书记：邹大鹏；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党组书记：孔原；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党组书记：胡乔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党组书记：胡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党组书记：南汉宸。

1950年1月8日，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主任董必武致函齐燕铭：“政法委分党组干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所提之内务部、司法部、公安部、法制委员会及民族事务委员会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

部会之党组小组及组员名单；并通过建立政法委员会机关党组，……请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审查批准。”^①可知，当时政府各部门党组成员及领导人，均须由“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提名并审查批准。

共同纲领时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政府各部门都有许多党外人士，并有15个部门由党外人士担任主要行政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坚持政府中党的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分开，使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的会议上，周恩来就指出，党组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也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的指导原则：政务院机构中的党组会议不要代替行政会议；要健全政务院各部门行政会议的制度、办公制度和汇报制度，要确保有一定的必要的形式，不可党内外不分，要使党外负责人加强责任感，在其职权范围内敢于做主，等等^②。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又就政府中党政关系问题指出：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家政权，而我们党在政权中又居于领导地位。所以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这点中央已经注意到，各地也应该注意。由于过去长期战争条件，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尤其在军队中更是这样。现在进入和平时期，又建立了全国政权，就应当改变这种习惯。他说：党政有联系也有区别。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③。1951年10月18日，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第一副书记董必武在写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

①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8页。

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信中,更明确提出“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①。11月,董又在政法委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党是领导政府机关的,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但并不是直接指挥国家政权。”^②

周恩来等人倡导的这一重要原则,当时曾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在董必武致信饶漱石后,同年12月4日,毛泽东复信董必武:“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并在信中注明:“可以连同你此信和我答复你的几句话,一起抄发。”

应当指出,共同纲领时期,因中央政府草创,机构设置中不免存在某些党政不分的情况。有些机构既属于政府行政系统,同时又属于党的系统,即所谓“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以“中财委”为例。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前,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党对经济工作统一的领导机构,并于同年7月组建完成,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简称“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这个党内领导机构同时又是政务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可见,中财委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机构,又是政务院的指导委员会。这就决定了这个机构不仅向政务院负责和报告工作,更须向中共中央主席负责和报告工作。

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机构的变化

1952年8月以后,至1954年9月,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作了两次重大调整。

① 《董必武年谱》,第398页。

② 同上,第399页。

（一）1952年8月：“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

1952年8月，随着中央人民政府行政机构调整扩大，各大区领导人先后上调北京，担任中央政府各部门领导，根据周恩来提议，“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进行了改组和扩大，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的成员，除原有“政务院党组干事会”11人外，又增加邓小平、林伯渠、彭真、李富春、曾山、贾拓夫、习仲勋、钱俊瑞、王稼祥、安子文、吴溉之、李六如、廖鲁言、刘澜涛等14人，由25人组成。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李维汉任党组秘书长；齐燕铭、廖鲁言分任第一、第二副秘书长^①。

“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时期，中央人民政府中的党组系统同样分为三个层次，即各部门的“党组小组”、各指导委员会的“分党组干事会”与“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一时期，政府各党组小组领导人的主要变化是：中财委直属小组党组书记：薛暮桥；交通部党组书记：王首道；对外贸易部党组书记：雷任民；商业部党组书记：姚依林；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程子华；中财委党组书记：宋劭文；财政部党组书记：戎子和；重工业部党组书记：李富春；农业部党组书记：张林池；科学院党组书记：恽子强；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叶蠖生。

“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改组，是中央人民政府党组系统进行调整的第一步。毛泽东进行调整的目的，是加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政府各部门的直接领导。过去他在两次重要批示中，已对政务院所属各部门没有及时直接地向他请示汇报，深表不满。1950年8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54页。

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一个批示中说：“政务院所属各部门每次召开会议决定政策方针，都应如中财委所属某些部门一样，做出总结性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经同意后，除用政务院、各委或各部自己名义公告执行外，有些须用内部电报通知各地。”并指出：“过去有些部门这样做了，有些部门尚未这样做，请周通知所属一律照办。军委所属各部亦然。”9月13日，他又批示周恩来：“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管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央有接触外，其余各部门，一年之久，干了些什么事，推行的是些什么方针政策，谁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查询。中财委所属各部门，经过中财委向中央反映，有些是慢一些，但大体是好的；也有若干部门，例如重工业部、燃料、农、林、水利等还没有反映。文教委系统状况，略同于中财委。以上情况，请作一总检查，并加督促。”“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后，虽人员改组，规模扩大，体制上却并未根本改变。党组干事会这一级组织，仍是中央人民政府中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主席对政府的领导，仍要通过这一级组织进行。体制上既无法保证中共中央主席对中央人民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因此在“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期间，又出现所谓“新税制”事件。1953年1月，政务会议批准并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毛泽东批示周恩来等政务院领导：“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看了亦不大懂。”时任政务院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就此事回忆道：“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在起草《通告》时，有关同志向我报告时，我没有进一步研究，也没有再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就仓促把方案报送周总理和政务院了。新税制方案公布前，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没有向毛泽东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以至他‘看报始

知’，这更是不应有的疏失和错误。”^① 可见，如何在体制上保证中共中央主席对政府各部门进行直接领导，在“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时期，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遂对中央人民政府党的领导系统进行了第二次重大调整。

（二）1953年3月：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决定指出，为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严格规定：

一、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二、今后政府各部门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应即撤销。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组织，暂时仍应存在，直接受中央领导，并分管其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的党组。凡不属于各委而直属于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如外交、民族、华侨、人事等部门的党组，则直接受中央领导；

三、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②。

至此，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组织系统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以“党组干事会”作为政府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这一组织形式，已完全撤销。党组系统变为两个层次：“分党组干事会”和“党组小组”。中共中央主席则直接对各党组小组和分党组干事会进行直接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院、署、行的工作，由各党组小组和分党组干事会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则亲自给予批示。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与政府经济工作确立由五方面领导人分工负责即所谓“五口通商”体制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在政府中确立了 14 位领导人分别向中共中央主席直接负责的制度。具体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上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①。

这次调整后，周恩来由过去中央人民政府中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变为政府 14 位分别向毛泽东直接负责的领导人之一。1953 年 3 月 3 日，毛泽东又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情，请小平同志多管一些。”进一步加强了中共中央主席对于中央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三、中央人民政府全面调整的原因

1952 年 8 月至 1954 年 9 月，与中央人民政府中的党组系统调整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在行政系统方面也作了两次重大调整。

第一次是在 1952 年 11 月，中央政府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并增设“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第 67 页。

会”。前者取代了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的职权,后者指导中央与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的长期和年度计划,时称“经济内阁”。

第二次是在1953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对各部门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主要依靠政务院通过中财委进行统一领导,改为分隶政府五方面领导人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陈云及薄一波负责,即所谓“五口通商”^①。

从体制上看,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全面调整的原因是:

1949—1954年,正是开国奠基,经济恢复,百废待举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开国时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适应形势需要,在领导和执行国家政务的各个方面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1952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国民经济恢复胜利完成,以及国家准备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求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而中央人民政府初建的这套组织系统,在体制上已不能继续适应新形势发展。

中央人民政府的总体规划,是极复杂的开创性工作,无前例可援。特别是中央人民政府筹建时因形势需要,不得不在原华北人民政府基础上仓促建立,并照搬了其“议行合一”体制^②。华北人民政府作为原地方性政权,机构中不设“政务院”一类内阁组织,因此,无法对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的府、院关系提供经验。这些客观原因,就使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如何在体制上保证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政府各部门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完善之处。

中央人民政府建立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在这一总原则下,建国之初采取的“议行合一”制,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建

^① 见拙文:《关于1949—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的若干问题》,《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②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筹备情况,参见拙文《建国前中央人民政府筹备述略》,《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立的政府体制仍存在重要区别：

一、在议行合一的政府体制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为实权实责，权力集中，不是虚位制的国家元首。《共同纲领》中毛泽东所加的一条明确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① 中央人民政府既然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则无疑是国家最高行政领导人，得对政府各部门进行直接和经常领导。周恩来明确指出：“根据我们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经民主方式产生的，而对工作的经常领导，又是集中在由民主方式产生出来的主席身上。主席下面的组织，首先是政务院，其他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② 因此，在共同纲领时期“议行合一”的体制下，国家最高行政领导是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国家最高行政领导是国务院及国务院总理完全不同^③。

二、议行合一的政府体制不是内阁制。这一体制中，内阁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直接领导，而内阁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又并非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又是政务院与后来国务院的重要区别之一，却往往被人忽略。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因此，宪法规定国务院的职权是：“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④ 政务院则不同。如前所述，共同纲领时期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整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42页。

③ 在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董必武在谈政务院时，曾用过“最高行政机关”一词，其本意是指政务院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属的最高行政机关，而非指“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见《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页。

个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性质是“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①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有关规定中,对政务院与所属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并未提“领导”,而只是确定为:“联系、统一并指导各委、部、会、院、署、行及所属其他机关的相互关系、内部组织和一般工作。”^②

可见,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在“议行合一”体制下加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责权,保证其对政府各部门的直接和经常领导。但是,政府草创时期因体制不完善,在实际运作中却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当时,政务院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颇值得注意:

一、政务院在领导国家政务及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等方面事权专一,无其他机构可以代替;

二、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最高层领导机构是“政务院党组干事会”,领导成员也基本上都由政务院及所属主要部门的中央负责人组成;

三、不仅如此,当时,政务院所属的“政法委”,还得以指导和联系本应与政务院平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③。

可见,调整前中央政府的运作实际依靠两大机构进行: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军事;以政务院领导除军事以外的一切国家政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政府的直接和经常领导,未能在实际运作中得到保证。随着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国时的政府组织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集中统一的需要,机构调整势在必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71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717页。又,董必武在解释政府组织时说,各部的工作是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政务院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其所隶属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见《董必武选集》,第248页。这里所说的领导,应主要是指业务方面而言。

③ 《董必武年谱》,第348页。

1952年6月，毛泽东等人决定参考苏联党和政府机构设置的经验，以完善中共中央对中央政府与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6月20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同日，中共中央给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发出电报：“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不久，刘少奇转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计划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毛泽东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按以上计划，同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17次会议，任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任命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为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以后数月内，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等也相继调京，为中央人民政府即将进行的机构调整作出人事准备。

50 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发展变化

郁曼飞 林晓光

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共产党 50 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50 年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此付出了无数心血,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 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退往沿海岛屿,制定了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前沿,以台湾本岛为中心,争取美国的援助与支持,与中共政权长期对抗的军事部署和政策方针。

中国共产党为彻底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民主革命,宣布“绝不容许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9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的文章。9 月 30 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致解放军的通电,号召“彻底消灭一切不投降的敌人,解放台湾、西藏和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最后完成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武装斗争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坚定意志。

按毛泽东当时的设想,解放台湾分成三个阶段:1、组建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掌握东南沿海地区和台湾海域的制海权、制空权;2、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台湾外围,建立进攻台湾的前进基地;3、在 1950—1951 年,发起解放台湾的渡海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军事计划,于 1950 年 4—6 月

先后解放了海南岛和万山群岛，驻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迫于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望风而逃，扫清外围的战斗取得巨大进展，进攻台湾于是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上半年一直全力以赴地加紧进行攻台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因此，直到1950年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武装解放台湾”的既定方针，军事斗争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当时中共对台政策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主旋律。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国际局势，也使中共领导层不得不放弃立即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7月31日，远东地区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军事代表团访台，与蒋介石达成“共同防卫协定”。8月1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在台湾建立前进指挥所^①。事态的发展变化表明，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已从杜鲁门当年1月5日宣布的“不介入、不干涉”方针转为“援蒋反共”的政策，使美国成为妨碍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最大的外部障碍。

远东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美军对朝鲜和台湾的侵略在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上构成了对新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鉴于我军尚不具备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反击外来干涉和军事威胁的物质力量，鉴于美军的介入使台湾蒋军的海、空力量强于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增大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难度，我们只能暂时改变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将主要的军事力量转向东北方向，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援朝，这也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① 《中美关系》(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4页。

朝鲜战争以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的签定为标志而告结束。一年后,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也达成了协议。这样一来,美国在东北、西南两个方向上对我国安全的威胁相对减轻,而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问题再次突出,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的重心又回到武装解放台湾的主要任务上来。

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作为对台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1954年7月,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认为“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错误”^①,从而指出了我党我军军事斗争的主要任务和战略重点。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向全世界宣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解放军建军27周年纪念会上号召全国军民“为解放台湾,使台湾人民重归祖国怀抱而坚决奋斗,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坚决奋斗。”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再次宣布:“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容许交给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美国政府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无论订立什么条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如果外国侵略者敢于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敢于侵犯我国主权和破坏我国领土完整,敢于干涉我国内政,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这一侵略行为的一切严重后果。”指出“只有把台湾从蒋介石卖国贼的

^①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

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才能实现我们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获得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完全胜利，才能进一步保障远东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就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反对外来干涉的决心和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为攻打台湾做好了思想宣传和舆论上的准备。

1954年8月11日，华东军区向参战部队下达准备作战的命令。27日，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9月3日和22日，福建前线我军炮兵炮击金门，击沉、击伤蒋军舰艇7艘，摧毁其炮兵阵地9处。11月1—20日，我空军连续轰炸大陈岛的蒋军。11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命令华东军区：为打击蒋介石的卖国行径，为迫使《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我国沿海岛屿，必须更加积极地打击敌人。14日，我海军鱼雷艇队在浙东沿海一举击沉蒋军护航驱逐舰1430吨的“太平号”和“洞庭号”炮舰。12月21日，我空军再次轰炸大陈岛，击沉蒋军大型军舰“中权号”登陆舰。在给予蒋军一系列沉重打击之后，中央军委认为渡海作战，解放沿海岛屿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下令：1955年1月进攻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1955年年初，华东军区我陆、海、空三军开始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行动。到2月25日，全部解放了浙江沿海的各个岛屿，“为解放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造成了有利的条件”，胜利大军随即挥师入闽，兵锋直指金门、台湾。

中国共产党坚持“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方针，是对国内外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台湾海峡两岸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目的在于：1、完成统一祖国的任务，取得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2、反击美国政府使中国与台湾分离、使台湾海峡两岸现状固定化的阴谋，打破美国对我国的包围和封锁。

对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美国政府逆流而动，不断扩大对台湾的侵略。1954年8月19日，太平洋地区美军司令斯图普

率美国海军军舰 6 艘侵入距我浙江省海岸仅 15 英里的大陈岛,美国海军飞机约 160 架次在该岛海域上空活动,斯图普声称“在台湾地区有充分的美国海军部队可以打退共产党的任何威胁”,“如果共产党进攻台湾,美国海军可能不完全限于采取防御行动”。24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然说“对美国海军的基本指示是保卫台湾本岛。国民党控制的附近岛屿是跟台湾防务有关系的”^①。12 月 2 日,美蒋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之权利”,如台湾遭到“武装进攻”,美蒋将共同“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之危险”,该约将“无限期有效”^②。1955 年 1 月 25 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予他在台湾地区不经国会批准即可使用美军的权利,美国国会两院分别以 410 : 3 和 83 : 3 的票数通过《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艾氏于 4 天后签署该决议,使之生效。美国第七舰队随即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集结,形成包括 5 艘航空母舰、3 艘巡洋舰、40 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的海上力量,对我国实行“炮舰政策”,进行露骨的军事威胁,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中共中央认真地研究了台湾地区的形势之后,认为浙东沿海作战已经达到了全部战役目的和部分战略目的,如继续进攻金、马、台、澎,很可能引起中美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这将产生三种情况:1、使蒋介石完全投靠美国,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这只能有利于美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2、使蒋介石把美国拉入中国国内战争的阴谋得逞;3、使美国得以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内政问题上寻找机会,制造借口,挑动新的国际战争,破坏世界和平。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将不利于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为了中

① 1954 年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

② [美]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 年),第 1 卷,第 2287 页。

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在对蒋、对美斗争中保持弯弓待发的有利态势,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停止进攻台湾的军事行动。

三

由于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军事干涉,我们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一时难以达到目的,但致力于祖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因此而放弃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努力,而是寻求新的途径,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当时的国际环境对和平解放台湾也是有利的:朝鲜停战可望长期维持下去,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美国的扩张主义受到打击而有所收敛,远东地区的冷战对抗虽然依旧,但国际形势已有所缓和,这些都为和平解放台湾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一定程度的可能性。

但台湾问题由于美国的介入已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无论以何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都无法回避美国的存在。为了使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出军事力量,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除了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也需要有理、有利、有节地与之对话。

1955年4月23日,出席万隆会议的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形成要求美国政府响应中国政府建议的强大压力。4月26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与中国举行对话,并减少了驻台湾的美军兵力,通过英国提出在日内瓦举行中美会谈。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

美国政府愿意坐下来谈判表明其对台政策的两面性:既要“援

蒋反共”，又不想卷入中国的内战；既要在战略和地缘两个方面遏制、封锁中国，又不想因为中国沿海岛屿问题而冒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政策核心是保持台湾与大陆分离的现状，以台湾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网络的战略基点，而不是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桥头堡。因此，美国一直不肯公开承诺帮助蒋介石“协防”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的沿海岛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六条明确规定：“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是指台湾、澎湖”，并未包括金门、马祖^①。

蒋介石强烈地反对美国的这一政策，坚持台、澎、金、马不可分割的立场，不仅反对放弃金、马，坚持要保卫金、马到底，也反对以联合国决议的形式实现台湾海峡的停火，竭力要把海峡两岸的斗争扩大为“国际战争”。美蒋对于金、马等沿海岛屿的看法认识和政策立场不同，反映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利益，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利用美、蒋的矛盾，探索解放台湾的新办法、新途径。特别是随着美国加紧对台湾的干涉，使台海两岸关系、国共两党关系和国内阶级矛盾中交织着外国干涉与中华民族反对干涉的矛盾，民族矛盾的相对上升和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需要，促使中国共产党从祖国统一和民族大义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则是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台政策的内在动因。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点从“抗美援朝”转为国内经济建设，国内主要矛盾从对抗性向非对抗性的转化，也为解放台湾提供了新思路。既然掌握中央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与其他政党合作，那么与有过两次合作历史、现在作为台湾地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可以改变敌对关系，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通过第三次

^① 《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第2辑下册，第2053页。

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因此，随着美蒋矛盾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1955—1956年间谨慎而乐观地认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①，并依据这一战略性的认识转变，制订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谈到：“凡是愿意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15日，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指出：“跑到台湾的人是愿意回来的”，“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中共中央关于对台宣传方针也提出：允许任何人弃暗投明，回到大陆来与家人团聚。但此时的政策重心还在于分化瓦解蒋介石集团，以亲情感召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尚未达到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高度。

1955年4月，毛泽东指示即将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恩来：“可以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②周恩来在访问缅甸与吴努总理会谈时，指出：台湾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这是内战的继续，是国内问题，不容外来干涉；二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问题，如美军撤离台湾，我们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两者不能混淆。我们欢迎蒋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和统一祖国，并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是蒋本人，中国人民也会宽恕他。但蒋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③。这表明了中共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7月30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② 纪明：《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见《人物》1996年第4期。

^③ 廖心文：《为两岸和平统一开路的周恩来》，见《百年潮》1997年第2期。

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在中国人民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他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再次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朱德也在中共“八大”上讲话：“我们将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尽可能地争取不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人民日报》也于1956年2月4日发表社论，号召全体中国人“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为台湾的和平解放，为完成祖国的统一事业而奋斗！”3月16日，周恩来又请人捎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关死和谈的门，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不排除任何一个赞成和谈的人。蒋还在台湾，枪还在他的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回归祖国，成为祖国的一部分。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①。这实际上是将蒋介石集团也纳入团结、争取、合作的对象范围内，承认蒋氏集团在解决台湾问题中还有不可否认的作用。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理是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于1956年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是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团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4月，他又提出：“爱国一

^① 廖心文：《为两岸和平统一开路的周恩来》，见《百年潮》1997年第2期。

家,爱国不分先后”,“和为贵”,“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构想^①。

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曹聚仁时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从而提出了把第三次国共合作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的设想。10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只要台湾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蒋介石总是要在中央安排;陈诚如果愿意到中央来,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如到中央来,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台湾还是国民党管,可以陈诚为正、蒋经国为副。如果台湾当局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②。这不仅再一次表示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而且说明中共在构想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时,还是寄希望于国民党实权派,并为他们的职务安排作出了考虑。1957年7月,毛泽东对来访的伏罗希洛夫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制订为对台政策,并向有关国家通报信息。

当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有条件的:1、美军撤出台湾地区,两岸对话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2、两岸对话是“中央政府

^① 纪明:《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

^② 廖心文:《为两岸和平统一开路的周恩来》。

与地方当局的协商,任何‘两个中国’的想法和作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①。为了依据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开展对台工作,中共中央成立由罗瑞卿、李克农负责,徐冰、凌云、罗青长、董小鹏参加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对台办公室,负责对台工作的日常事务以及综合汇集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协助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决定对台的大政方针。

同时,为了表示和平谈判的诚意,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两岸紧张局势的措施:从1955年夏开始,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停止了对蒋军所占岛屿的主动攻击,只是在受到蒋军炮击之后才给予惩罚性的回击;1956年,命令空军作战部队暂缓入闽;1957年,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军队员额、节约经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到1958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240万人,兵员人数和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比重都是建国以来最低的。这些措施无疑大大缓和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

蒋介石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转换后,于1957年年初召见国民党文宣工作负责人许孝炎“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要求许提出人选。许推荐了三人,蒋选中现任“立法委员”宋宜山^②。宋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是蒋的学生,为蒋所信任;又是当时正在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原国民党将军宋希濂之兄弟,以探亲名义北上,不引人注目。

^① 《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第2辑下册,第2287页。

^② 《香港》《百姓》半月刊,1987年12月1日。

宋宜山到北京后,受到周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接见。在会谈中,中共方面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1、两党对等谈判,和平统一祖国;2、台湾作为中央直辖区,实行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政府不派人前往干预;4、美军必须撤离台湾,中国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①,首次明确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方法、原则条件以及祖国统一后台湾的法律地位和管理权限。此后,毛泽东提出关于“高度自治”的一些具体内容: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其余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均由台湾当局掌握,所有军政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国共双方都不再派人做破坏对方之事^②。这虽未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但允许台湾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利架构、管理权限,实际上已包含有“一国两制”的必要内涵和基本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但蒋介石派人北上,只是为了试探、了解中共和平谈判建议的虚实,既未接受建议,也不是派宋宜山为谈判作先遣接触。所以当在大陆各地参观完了的宋于报告中盛赞大陆与旧中国相比日新月异的变化时,蒋大为恼怒,既不满意自己从“国家领袖”降为“地方长官”,也不满意门下弟子去一趟大陆即被“赤化”,于是命许孝炎转告在香港待命的宋“不必来台”,^③与大陆和谈一事遂不再提起。

为了打击蒋的反动政策,反对美国对台湾的侵略,支持国际反帝斗争,中共中央决定炮击金门。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向金门展开了猛烈的炮击,蒋介石一面对金门紧急运补,一面向美国求救。8月25日,美国政府决定:为蒋军的

① 王幼安、毛磊:《国共关系通史》,第977页。

② 纪明:《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

③ 王幼安、毛磊:《国共关系通史》,第977页。

运补行动提供护航；向台湾提供导弹；承担台湾的防空任务；在台湾地区集结 6 艘航空母舰和 130 余艘各类军舰。美国最高决策层甚至还讨论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问题。9 月，杜勒斯和艾氏又发表了强硬讲话，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但同时又命令护航的美国军舰不得进入金门周边 3 海里以内，空军的作战飞机也不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冲突^①。

为解决台海危机，周总理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表示同意。9 月 15 日，这一中美之间唯一的官方对话渠道在华沙恢复。随着形势大发展，美国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既无法确保对蒋军的运补，又受到国内外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压力，于是美国要求蒋介石从金、马撤军，放弃沿海岛屿。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意图在于分裂我国领土，一旦蒋放弃金、马，台湾将与大陆相隔更远，两岸在地理上分离状态的扩大，将不利于祖国的统一。为了打破美国政府分裂中国的阴谋，在暂时还无法解放台湾的情况下，与其把蒋打得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增加解放台湾的困难，不如让坚持“一个中国”的蒋看管台湾，暂不收复金、马。毛泽东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就从“打击美蒋”改为“联蒋抗美”。

10 月初，中央军委作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定，减轻对金、马的压力，促使蒋军守而不撤，但又处于紧张状态，拖住美国，让其不得脱身^②。10 月 6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

^① [台湾]林正义：《1958 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第 141—142 页。

^② 李可：《毛泽东与金门炮战》，见 1995 年 9 月 27 日《中国市场经济报》。

判,实行和平解决”。此后,就台湾问题,我外交部发言人于7日、9日发表2次谈话,《人民日报》于10日、11日发表2篇社论,国防部于13日、20日下达2个命令,一方面宣布“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暂停炮击,“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任何外国无权过问”,“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处理”,而美国侵略台湾则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中国是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的”,强调“中国人的事绝不允许美国人插手,这是民族大义”。25日,再次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等岛屿,以使“岛屿上的军民同胞得到充分的供应”,以利“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划敌为友,此其时矣”。这一系列文件的发表,标志金门炮战从对蒋为主改为对美为主,从军事打击为主进入政治、外交斗争为主的新阶段。打打停停、打打谈谈、边打边谈、半打半谈,成为金门炮战后期斗争的主要特征。

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逐渐固定化,即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基本方针,把单纯的军事斗争转化为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心理的综合性斗争,方式上从武装斗争为主改为多种形式并举;步骤上从“逐岛解决”改为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策略上从首先解放金、马改为把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里,作为海峡两岸在地理联系上的纽带,以打破美国政府“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开展对台信息交流,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寻找机会、创造条件。

1958年年末,章士钊到香港向台湾当局转达中共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两项建议:1、双方暂不正式谈判,只作有限接触,先实现互访、通邮、通电、通航;2、台湾当局可以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和党组织,经费由大陆负担,但必须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当局对此未作出积极反应。1959年12月14日,

周恩来会见首批特赦的战犯时，请杜聿明等原国民党将军给台湾当局传话：“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1960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周认为：对蒋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待下一代人去做。现在就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于是周恩来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把中共的和谈诚意传递给台湾当局，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沟通。7月，章士钊再赴香港替中共传递信息。周恩来请他转达台湾当局：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仅在台湾，而是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是可以解决的。既有台湾的权 and 利之实，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的一个小头目而且迟早会被美国换掉更好吗？^①

到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已形成较为明确的政策框架，周恩来把它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即：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政府之外，其他军政、人事大权均由蒋介石掌握；2、台湾军政开支、经济建设等一切费用不足之数，均由中央政府拨给；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并与蒋协商之后再行；4、双方不互派特务做破坏对方之事。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反复强调：只要蒋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与祖国分离，中共就不会改变目前与台湾当局的关系^②。

大陆“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利令智昏地想

① 纪明，《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

② 纪明，《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

“反攻大陆”，下令部队登船待命，又派遣大批武装特务窜扰大陆沿海地区。中共多管齐下，制止了蒋挑起新战火，破坏和平解放台湾的图谋。军事上，解放军总参谋部制定了作战方案，调兵入闽，做好了充分的备战工作。外交上利用美蒋矛盾，利用美国政府不卷入中国内战，不支持蒋“反攻大陆”的政策，“以美制蒋”，使蒋无法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给台湾当局传话，周恩来在一次请原国民党重要人物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吃饭时请他们给台湾当局写信，告诫台湾当局不要轻举妄动。张给陈诚、屈给于右任、傅给张群分别写信，转达了中共方面的意思^①。中共灵活多样的对台政策和措施，不仅制止了蒋的玩火，也缓和了两岸紧张局势，而且使中美双方对对方的台湾政策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福建前线我军对金门炮击的密度、目标和力度也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从逢双不打，增加为每逢节日都不打；从回击蒋军炮兵阵地到炮击无人地带。到1961年12月，又停止实炮射击，改为只在单口打宣传弹，减少了军事动作，加强了政治宣传工作，为缓和海峡两岸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派人北上，与中共方面接触。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会见过其中的一些人。周分析认为：这是蒋派来刺探我们的情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不过毛、周都认为：这些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时也判断不清真假。但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我们都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1961年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提出台湾回归祖国，社会制度可以考虑不变，留待以后再谈。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在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在中共政策

^① 纪明：《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

的感召下,不少去台或流亡海外的原国民党要人,或毅然返回大陆,或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和平统一的向往。国民党副总裁、台湾“副总统”陈诚 1961 年 8 月访美,在看过美国国务院提供的 1955 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记录以后,表示“中共拒绝美国的一切建议,坚持美国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他还传话给张治中,请中共相信他的人格,相信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1965 年,陈诚逝世,遗嘱一不提“反共”,二不提“反攻”,且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周恩来认为:这说明党的对台工作有效果、有影响,是积极对台通气、传话的结果^①。1965 年,李宗仁从美国回归祖国,对蒋更是极大的震动,他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这一点上比他高了一筹^②。

尽管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但已达到了“联蒋抗美”,反对“划峡而治”的目的,对台湾当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是切实有效、积极稳妥的。周恩来指出: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一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就行^③。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左”的思想也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对台工作,“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也难以继续实施下去。

1972 年 2 月,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就使解放台湾的最大外部障碍相对减小,使台湾问题朝着消除外来干涉的方向发展,解决台湾问题从国际斗争为主转变为中国内部问题为主。毛泽东因此及时地发出指示,要“促蒋和谈”,打击“台独”,争取第三次

① 廖心文:《为两岸和平统一开路的周恩来》。

② 纪明:《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

③ 廖心文:《为两岸和平统一开路的周恩来》。

国共合作。关于中美关系的进展也都事先通过各种渠道告知台湾当局^①，以便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争取台湾当局的合作。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逝世，但他们提出的“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构想，不仅符合两岸人民的愿望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大义和宽大大胸怀，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五

70年代末，海峡两岸和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历史性课题再一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政策和包括“统一祖国”的三大任务。在台湾，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国民党实行“经济保台”，在与各国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的同时，从“一个中国”的立场后退，同意在“一中一台”的框架内与各国保持实质性关系。台湾当局“开放党禁”、“言论自由”之后，台独势力膨胀，对祖国统一的不利因素上升。国际上，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各国纷纷与我建交。美国对台“撤军、废约、断交”，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但美国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对台提供军事装备，维系与台湾的准官方关系，这对解决台湾问题又是不利的。

在有利、不利条件并存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采取积极的对台

^① 纪明：《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

政策,打击分裂祖国的活动,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

在1979年全国政协的新年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当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强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1月30日,正在访美的邓小平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0年1月16日,邓又强调“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勾勒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框架: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这一从台湾现状和台湾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的政策,尊重历史,正视现实,是合情合理的。

1982年后,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多次阐述了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使这一政策构想日益成熟和完善。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指出“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

民族作出贡献”。他强调“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区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①,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内容。198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美国乔治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进一步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丰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新方针。

在这一政策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推进祖国统一。1981年成立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对台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日常办事机构,调汪锋任专职副组长。后来又经邓小平批准,成立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邓小平认为:对台工作是大事,需要专职的人专门做^②。这说明邓小平不仅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不仅主持制定了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而且注意到对台事务的机构专门化、人员专业化、决策科学化、工作程序化和日常管理制度化,从而为解决台湾问题做了组织和认识上的准备工作。

1982年底,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改宪法,增设“特别行政区”条款,为“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和实践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

^① 198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② 汪锋:《回忆邓小平领导和关心对台工作》,见《中华英才》1997年第12期。

保障。制订的《关于鼓励台胞投资的规定》等法规，保障台胞在大陆从事经济活动的合法权益；同时开放台胞来大陆观光“探亲”访友。1981年9月28日和11月26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和《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要求各地、各级政府落实对台胞、台属的政策。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完全停止炮击金门，1987年又撤销了主要针对台湾的福建军区。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决定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下党政军特人员4237人；公安部对全国6万多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下的人员，分别给予减刑、假释、释放、转业安置、留场就业、平反冤假错案等处理，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发表给蒋经国的公开信，呼吁蒋经国从台湾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与共产党携手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信的主旨是邓小平与廖承志仔细讨论商定的，由邓小平亲自批示发表，连以何种形式发表效果最好，都是邓小平指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召集广播电影电视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协调之后进行的^①。

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发展和深化对台湾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岛内外要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台独”势力的膨胀更从反面使台湾当局认识到，过去那种不切实际、逆潮流而动的大陆政策已经失去民心，必须改弦更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94年举行了“汪辜会谈”，使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台湾当局近年来不断从“一个中国”的立场后退，提出“一国两府”、“一国两

^① 汪锋：《回忆邓小平领导和关心对台工作》。

制”、“一国两地区”、“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等名为一国、重在分治的政治构想，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要求独立的主权地位”，假统真独、名统实独的倾向在发展。同时大力开展“务实外交”、“度假外交”、“私人外交”、“金元外交”、“过境外交”，要求“重返联合国”，推行“双重承认”政策，以扩大“生存空间”，提升“国际地位”。这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不利于祖国统一。

同时台湾岛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国民党虽然仍保持执政地位，但“暗独”的势力已占据上风；民进党势力不断上升，1997年在台湾省地方选举中夺得大多数县市行政长官的职位；形成国民党控制“中央”，民进党控制地方的局面。民进党又于1998年3月召开会议讨论“大陆政策”，决定了“全方位”和“强本西进”的方针，进一步打破了国民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政策主导地位，使解放台湾问题可能出现新的复杂因素。

对此，中国共产党适当调整对台政策，在“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大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改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了关于对台政策的讲话，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提出关于对台政策的8项主张，认为：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饱经磨难，现在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时候了，呼吁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全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求同存异的真诚态度。

在中共“十五”上，江泽民又一次郑重呼吁：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以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

^① 1995年1月30日《人民日报》。

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希望台湾当局认真回应我们的建议和主张,及早同我们进行政治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①。这个建议言真意切,合情合理,充分考虑到两岸关系的现实状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祖国统一而努力的一片赤诚和博大胸怀。

总之,5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经过了从武装解放台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从“一纲四目”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从“叶九条”到“江八点”的发展变化,为使台湾回归祖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付出了无数的心血,表现出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大义。

^① 1997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桂北四清时期的陶铸

张 汉 青

弹指一挥,陶铸在广西桂林农村开展“四清”,已相隔 35 个年头了。

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这是当时党中央的总部署。1962 年 8 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和 9 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时刻不忘反修防修,成了政治生活中的基调。在国际形势上,当时出现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越北部的岘港登陆,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中苏两党的争论自 1963 年秋季以后也日趋激烈。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同时又指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中南地区农村的“四清”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气候和复杂情况下陆续开展起来的。

作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陶铸,亲自对中南地区的农村“四清”运动作了部署,并先后于 1963 年在广东花县炭步公社鸭湖二大队、1964 年在花县花山公社新和大队蹲点,前者是小“四清”的试点,内容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者则叫大“四清”,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陶铸 1965 年到广西桂林农村抓“四清”工作,可以说是他在主持中南局工作期间就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的第三次蹲点了(城市的社教运动陶铸到广州重型机器厂蹲过点)。

三年三次蹲点：真心实意建设农村

我是1963年5月从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调到陶铸办公室当秘书的。当时陶铸在武汉召开中南局全委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部署社会主义教育。会上揭露了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但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陶铸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通过分析形势和回忆对比，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采取批判、斗争、戴帽子的办法。有一些特别突出的典型，可以在县的范围选择一个、两个进行公开批评。”会议期间，陶铸接到紧急通知，到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几天后他带回一份《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并立即向武汉会议传达。这个决定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农村的“四清”和城市的“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同时也把它视为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中南局全委会按照“前十条”的精神重新作了部署。

从武汉回到广东后，陶铸就带着中南局副秘书长薛光军和我们几位新老秘书，到花县炭步公社蹲点。当时陶铸和薛光军住在公社，丁励松、马恩成和我分头下到隔河对岸鸭湖二大队的3个生产队实行“三同”。陶铸经常到鸭湖二大队来，听我们的汇报，找干部和农民谈话。时值夏天，陶铸就在鱼塘边一棵老榕树底下找人了解情况，开座谈会，有时中午就在那里歇息。这次小“四清”，工作队宣

传要注意阶级斗争，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队、生产队都查了帐目、工分和财物。对一些“自发行为”，也进行了批判。这些都是团结、依靠基层干部来进行的。陶铸鼓励基层干部要关心生产，发展生产。这次蹲点3个月，结束后陶铸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生产密切结合问题》的专题报告，提出“每段运动的部署，都必须同时研究与部署生产，每段运动的小结，也必须同时总结抓好生产的经验”；“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生产增加，分配收入增加，社员生活改善，否则就是运动没有搞好，或者叫失败。”陶铸这样强调在运动中要抓生产，把它当作运动成败的一个标志，这同当时上面的要求，并不完全符合。

这年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同时也规定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具体政策。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特别是1964年中央连续转发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报告以及河北“桃园经验”等文件后，“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干部“和平演变”，“要采取土改时期秘密的扎根串连的做法”，“要集中上千人上万人到一个县搞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新提法，使“四清”、“五反”不断升温。这时还传来了这样的估计：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中央对后十条作了修改，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也就是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都撤到一边。在这种形势下，陶铸决心全力以赴，对中南地区的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各省的第一把手都亲自下去，隐姓埋名，秘密扎根。

1964年9月底，陶铸带领中南局机关和广州市、花县的干部，农业科技人员，加上一批大学生（“政治学徒”），到花县花山公社新和大队蹲点，公开身份是省军区后勤部的“金科长”。新和大队面上的工作由薛光军、李普、黄康云掌握，除有几个人住在大队部外，都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去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队伍。我随陶铸住在向东生产队利金良家。当时广州市四清工作总团设在花县县委，新和大队离县城不太远，陶铸有时到总团去参加会议。那时陶铸还办了个《中南社教运动简报》，编辑小组就在离新和大队不远的地方，是借用广播电台的几间房子，王天铎、马恩成等在那里选稿、发稿。他们把重要的稿件送给陶铸审阅定稿。这一次运动，对干部的批斗比鸭湖二大队要多些，但生产还是依靠他们来组织，解放干部工作也抓得较早。进村前，总团开会时，陶铸就明确宣布生产搞得好不好是四清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就这样，陶铸集中力量坚持了3个月，直到12月底才离开，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我则继续留在向东生产队，直到1965年的初夏。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各地“四清”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做法。但是，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

1965年秋，中南地区新的一批“四清”运动铺开了，陶铸决定到广西桂林地区蹲点。广西是陶铸解放初期领导剿匪和代理省委书记的地方，桂林地区后来他也多次去过。这年夏天，陶铸在广州

亲自主持了中南各省区的文艺汇演。在文艺汇演期间，中南局领导商量了继续分头进行“四清”蹲点的事。后来陶铸在桂林社教总团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讲到：这次到桂林搞“四清”，是我自己报名来的。中南局召开各省省委书记开会，大家提意见，说你总在广东蹲点，所以我就来了。我在广西当过一年省委书记，有点老交情，桂林这个地方又是三线，想先把这个地方搞起来，搞个示范区，这是我个人的愿望。他建议总团除原来的临桂、灵川、兴安三县外，把桂林郊区也包进去，通过“四清”把桂林周围都搞成先进地区，这样对广西、对中南影响就大了。在陶铸尚未到灵川蹲点之前，中南局机关和珠江电影制片厂、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抽调了100多人，连同灵川县党政军机关、桂林曲艺团的同志，组成工作队，下到该县同化公社和五福公社。按当时中南局的部署，农村“四清”铺开时均采取“一带一”的办法，确定同化为重点，五福为附点。工作队总队的队长是中南局计委副主任申修，副队长是办公厅副主任关相生，还有赵志光、郝忠、乔屹、李汝芬、孙长城、秦金桥等队委。

这年的8月下旬，陶铸到了广西。先是到南宁，与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开会，然后到桂林。这时已是8月底9月初，他在桂林同地区负责同志见了面，没有多作停留，就到了位于桂林北面的灵川县同化公社下驿田生产队，住了3天。同行的有警卫员曾云和我。我们的行李很简单，汽车停在公路边，就手提肩扛着行李步行进村。下驿田过去很穷，全村几十户人家，是个小山村。我们的住处是在村头靠水田边的一所砖瓦平房，中间一个厅堂，还有两个房间。这房子过去是属于一户小地主的，土改时分给农民秦润七家，但长时间空着，给生产队用，存放家具等杂物，还养过牛。我们来到后，生产队的干部帮我们一起打扫房屋，把农具、稻草等放进一个房间，腾出一间房子给陶铸住，我和曾云住在厅里。这里久未住人，地势又低，墙角长了青苔。有人弄来一些石灰，撒在墙角周围和潮

湿的地板上。在那个年代,我们经常随陶铸下乡蹲点,住处虽然简陋,只要打扫干净,他也就感到满不错的,正所谓“随遇而安”。他所关心的是工作,是一大群工作队员。陶铸这次到灵川,是赶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先到点上看看的,只停留几天。他进村后,就找先已下来的驻同化、五福的工作队员开会,强调要把生产搞好,发展集体经济;同时鼓励工作队要搞好“三同”,发动群众,每个人交两三个贫下中农做知心朋友,一年时间,好好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几天陶铸的工作时间表排得密密的。9月3日下午,找同化公社干部座谈。4日晚上,与同化、五福的贫下中农代表座谈。5日,在灵川参加桂林社会主义教育总团党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桂林是个好地方,“桂林山水甲天下”,风景很好,就是不长粮食。桂林是三线,是后方,要迅速搞上去。去年我来讲过一次,提出3年内粮食达到20亿斤。你们有300万亩水田,3年达到年总产20亿斤,亩产还不到700斤。当时大家认为把握不那么大,现在看来把握比较大。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好,可以实现飞跃,可以变成先进地区,变成巩固的后方。他接着分析了桂林的增产潜力,既讲了人的积极性问题,干部精神状态问题,巩固集体经济问题,又讲了土质、肥料、种子、水利、管理以至改革耕作制度、改善道路交通等。他强调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运动一起抓,工作队要切实为群众解决问题,要学习怎样做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阶级分析,为贫下中农办事。陶铸这次到灵川蹲点,不像在花县那样,进村后隐姓埋名。开始时机关下去的干部特别是搞保卫工作的同志,还是叫他“老科长”,慢慢也就不叫了。

在这几天当中,陶铸还去看了就在当地的一处部队仓库。他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和国务院副总理,除了解部队的情况外,也讲“四清”问题。他的到来,部队的同志很高兴。

陶铸接着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时间比较长,国庆

节也是在北京过的。但他一直惦记着灵川的“四清”。10月初，他要我先回灵川看看。我回到工作队后，传达了陶铸对工作的指示特别是解放干部问题，并抓紧时间到同化、五福了解运动开展的情况。10月19日，我准备了一份向陶铸的详细汇报提纲。陶铸大约在这年的10月下旬回到灵川，找工作队的领导开会，也听了我的汇报。此后的整整1个半月时间，他都在灵川、临桂、兴安，特别是在同化、五福深入蹲点。他参加了各种大小会议，接见许多人，讲了许多话，真心实意地要把农村建设好，要使工作队得到锻炼，使基层干部能够成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同时他在桂林市和桂林总团作过多次报告，反复阐述农村“四清”的重要意义和他对搞好桂林农村的热切希望。其间，大约在11月底和12月初，陶铸到五福公社住了几天，我们也就离开了下驿田村。五福的环境很美，山青水秀，记得我们的住所门前，有一条水沟，清清的山水缓缓流淌。

在这段时间陶铸的工作日程是：11月1日，在桂林师范学院作报告；当天下午又在体育馆讲话。2日，在桂林与驻同化、五福的工作队领导研究工作，着重研究集训干部问题。4日下午，在同化棒家与工作队研究工作；接着又到雍田与工作人员谈话。14日，参加同化工作队的支委会研究工作。17日晚上，在同化公社集训会上听秦七九、韦耀光、秦友兴的发言后，讲了话；接着又亲自安排此后10天同化的干部集训工作，揭盖子、查危害、丢包袱、退赔和解放一批干部等。18日上午，了解大面区四清分团的集训情况；当天下午对大面区各片的工作组长讲话。19日，在灵川区委了解全区干部集训情况。19日晚上，对解放干部问题提出意见。20日，与同化工作队谈话，讲解放干部问题。21日，与五福工作队支委研究工作。22日，对同化工作队讲今后几天的工作安排。23日，到庙头区，对工作队的片长讲话。24日，到大溶江，听取溶江区的汇报，讲了

话；又到兴安，听取县委领导汇报生产和社教情况。27日，同化干部集训结束，听汇报后讲了话，强调“会议开了13天，会不开了，要搞生产了”，“四清，要使同化由落后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公社”。28日，对同化工作队讲话。30日，在五福，与工作队领导谈话。12月1日，对五福工作队员讲话。2日，听取五福干部集训情况汇报后讲了话。3日，在五福找一些基层干部谈话。6日，参加桂林四清总团会议，听取灵川、兴安、临桂分团关于干部集训的汇报，陶铸最后作了讲话。当时邓子恢、邓力群也在桂林，参加了此次会议。从以上所列的清单可以看出，在这段时间里，陶铸是如何夜以继日地在桂林农村为“四清”奔走，费尽苦心。他要通过“四清”把桂林农村建设好。

就在12月6日的四清总团会议开完后，陶铸接到中央的通知，要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是离开了灵川。当时时间比较紧，我和曾云跟着他从桂林赶到柳州，坐上空军安排的飞机，经广州到上海。

始终操心三件事：教育好干部， 搞好生产，锻炼好工作队

灵川“四清”是二十三条下发半年多之后才铺开的，并且有了前一次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次一是对基层干部的思想教育比过去做得深透，解决干部问题比较好；二是一进村就抓生产，三大革命一齐抓。陶铸还几次谈到中南局对全中南地区“四清”运动的安排，他把1964年至1965年那次称为试点，从1965年秋天起，再搞3批，每批为期1年，到1968年国庆节前搞完。他在桂林开会时说：“如果真想搞好生产，改变落后，搞好备战，就要认真搞这3年。以搞好为原则，不要赶时间。这个问题要天天讲，到1968年得胜回

朝为止。”他“对四清寄以莫大的希望”，强调“四清又是备战，准备战场。”

在灵川蹲点和到桂林地区各县抓“四清”期间，陶铸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如何把运动搞好上面。他亲自参加同化的各种会议，与工作队一起研究工作，作指示。除了灵川外，他又到兴安、临桂去检查了解运动情况。桂林四清总团的会议，也是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召开的。

（一）教育好干部

陶铸对解决农村干部问题十分重视，他强调要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提高干部的觉悟，学毛主席著作，自觉改正错误。这次进村后他要求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同时，也联系干部；去年解放干部迟了些，今年分批解放，逐步“三结合”；干部的集训也要发展，工作队和干部一起学毛主席著作，一起谈心，对坏的干部要斗争，但不要多。集训前先解放一、二类，去前搞欢送，会上搞欢迎，学毛主席著作，看文艺节目、电影，还搞好伙食、吃猪肉。他反复讲一个人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犯了要改；就是犯了大错误，肯改，也比犯小错误不肯改要好。他说：“讲不追不逼，实际是有的，文明一些而已。”他对工作队讲，农村的事情最后还是要靠基层干部来搞，干部问题解决不好，工作队想离开，也出不了村。干部四不清，主要他自己负责，但我们教育不够也有责任。要从教育入手，重新教育人。干部多数本质是好的，可以改的。这批注意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学毛著，学雷锋、王杰等先进人物，比去年顺，解决问题比较痛快，高屋建瓴。也减少后遗症，多数不伤感情。工作队也搞个好作风，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农村干部也要学这种作风，否则，媳妇学婆婆，作风改不了。当时工作队中有人对这种做法有怀疑，说是“和平四清”，陶铸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反复讲，对农村干部还是要帮助，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有些同志所以想不通，一是过去习

惯老的一套办法，追、压、挤，程咬金三板斧；二是新办法很复杂细致，确实不容易，缺少经验。他反复强调对干部要有平等态度，要交流思想，推心置腹地恳谈，不要高人一等，以裁判者的身分出现。并且明确宣布对干部的错误要批判，但绝不允许非法斗争，绝对禁止打人骂人。

陶铸的一席话，给了犯错误的干部以很大的温暖。尽管当时是采取政治运动的办法，把有缺点错误的农村干部摆在被批判斗争的位置上，但陶铸在灵川的做法，表明他操心的是要把干部教育好，把农村的干部队伍建设好，他由衷地关心和爱护这支队伍。陶铸是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来解决“四清”中的干部问题的。12月1日他在对五福工作队讲话时讲了以下一段话：“理论上讲，四不清，是阶级斗争，是剥削性质，两条道路斗争；但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应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办。这公式提了很久了，但如何具体化，过去具体化得不好；团结愿望不够；批评斗争没有做好教育提高，引导自我批评；因此后一个团结就不能完全达到。”陶铸强调的是要真心实意地帮助和教育干部，及时解放干部，而对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持慎重态度，严格控制。

（二）搞好生产

陶铸到农村，不论是检查工作还是蹲点，都非常关注生产和花力气抓好生产。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对“四清”一定要搞好生产，他反复强调，到哪里都讲。就连每一批“四清”为什么要搞一年时间，其中的理由之一也是为了搞好生产。他说：“一年，生产可得到全部经验，三大革命一齐抓。”“要有一年时间，看两季生产，才准走。”当然，他规定一批搞一年还有更全面的考虑，包括干部问题，他认为干部思想是有反复的，时间长才看得出，贫下中农也是如此。农村存在问题很多，没有一定时间清理不了。有一年时间，

可以比较系统彻底解决问题,比如整团、整党、民兵工作等。

1965年11月1日,陶铸在桂林作报告动员搞好“四清”。同化、五福的工作队负责人都去听了。2日,他在桂林找两个队的负责人研究工作,集中讨论了要为明年大搞生产做些什么准备。他强调生产要大抓,要由工作队、解放了的干部、贫下中农三结合抓生产,并一口气讲了种绿肥,积肥沤肥,口粮带肥,修公共厕所,打扫村子搞砖头泥、塘泥、河泥做肥料,积牛栏肥,集体养猪,种子和秧地,修水利,修仓库、晒谷坪,烧石灰等11项。他还要求在干部集训后把生产规划搞一搞,引导干部把力量用到生产上去。他像老农一样,讲得头头是道。又像一个精明的生产队长,方方面面都安排好。为了抓好生产,在领导分工上,陶铸明确同化的工作队长申修侧重管生产,各片各队也要有人专抓。这次会上还明确了除总队委外,同化、五福都分开成立支委,按“一带一”的精神,政策、部署统一,但两个公社独立作战,抓好运动和生产。

1965年12月6日,也就是在他离开桂林之前的总团会议上,他又专门讲了生产问题。他说,事实证明,运动和生产可以结合,三大革命一起抓。开始时要大抓生产也困难,但可以结合抓。一是思想要重视,二是要会安排。现在生产要突出起来,但不提以生产为中心。要过渡一下。运动还有大量的工作。白天抓生产,晚上搞工作。春节后提以生产为中心。注意抓生产,对运动有好处;运动的最终目标要归结为生产。搞出多少果实,是一个标志;但最主要的要看增产不增产。为了做好第二年的生产准备工作,陶铸在这次会上又一次具体讲了水利、种子、肥料,要搞积肥运动,搞粪坑,修厕所,建立收肥的奖惩制度,烧石灰。要搞良种,改种双季稻。单造改双造的,早造就要安排好,立秋前要将晚稻插下去,以避过寒露风。种双季稻,劳动力会紧张,要组织好,要分等级。田间管理要搞定额,凡能搞定额的,按劳力等级计分。要搞作业组。干部搞试验

田,田间管理以干部的试验田为标准。干部的试验田不奖励,但如果带动得好,面上的产量达到试验田的水平,可以奖。每个生产队要有一个技术组,要有种子田。大队设技术组,公社(区)设农科站;县、专署设农科所。他还讲到要用好生产队的积累,退赔款要留一部分搞生产,等等。陶铸对农业生产的熟悉程度,使许多自称“老农村”的地县委书记都自愧不如。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陶铸对农业生产上的许多主意,都是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之内来考虑的。但他多年来深感农村工作上存在不少弊端,并且在政策思想和工作实践上不断探索改革之路。比如1962年6月,他和王任重广西龙胜县作关于如何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调查,当时两人在座谈会上对农村工作所作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于这年7月对座谈会的记录作了批示,指出“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并将座谈会记录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这次座谈会分析了当时龙胜农村存在的几种生产管理形式和性质,提出“集体经济只要坚持几条必要的原则,形式是可以千差万别的”。座谈记录表达了“‘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观点,又讲了“今后一定的时期内,残存着一定数量的单干户,比如说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十,是并不可怕的”。座谈会认为集体和单干是在进行着竞赛,强调生产队一定要改善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同时强调在判断一个生产队到底是变相单干还是改进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要十分慎重。继龙胜调查之后,陶铸又在广东清远的洲心公社搞了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的试点。1965年9月3日他跟同化公社干部谈话时,针对出工一窝蜂,劳动报酬搞平均主义,提出要搞定额管理。比如割禾,应该搞定额包工,包到组,也可包到户,规定时间、质量、工分,这样就可调动积极性。当时他强调

发展集体经济,对农民的自留田、私人养猪、家庭副业等,是从限制的角度来处理的,但他在政策指导上很讲究分寸。比如他在11月2日就明确地说:“现在不讲收自留田,叫调整自留田,统一名称叫自留地,可多分一点,总的10%。讲清道理,吃饭可以靠集体,水稻集体种,个人不种水稻。”11月21日与五福支委研究工作时,他说:“自留地按8%留,自留田收回。”12月6日在总团开会时讲到退赔政策,他又说:“自留田要收。还要做思想工作。如因收了,将来减少,可补。给自留地5—7%。其中搭配能养一头猪的芋头田。公有私养猪另给饲料地。”他强调要发展集体养猪,9月5日与同化、五福工作队员谈话时说,“这个地方社会主义经济很薄弱,集体什么也没有。同化公社集体养猪才二十头,平均一队一头,就是拉的屎是金子银子也有限。而私人养猪一户一头多,还养很多狗。”但对公有私养、私有私养他并不反对。11月2日在谈到干部退赔时说,如果有人用猪来退赔,可作为公有私养,并说不要因此削弱了私有私养。记得这年12月在桂林四清总团开会见到邓子恢时,他们交谈中讲到龙胜调查问题,感到农村的政策总得解决好,那时邓子恢讲,“你的报告毛主席批示了,两个马克思主义嘛!”从这些情况和陶铸的多次谈话来看,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尽管当时无法冲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与“私”的紧箍咒,但陶铸是极为注重实际、讲求实际的领导人,他始终关注的是搞好生产,发展生产力。

陶铸在灵川蹲点,只要他认为对发展经济有利的事,都给予支持,并运用他的地位和权力,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如帮助下驿田村前小河上的小水轮泵站的建设和安装小发电机、碾米机;从湖南引进无核蜜桔;从广东调来良种,请来潮汕老农,从新会运来手扶拖拉机作示范;在灵川督促修公路等等,切切实实,雷厉风行,无一不是出于责任感和爱民之心。为了同化的多种经营得到发展,他提

出要引进湖南的无核蜜桔。他分析了桂林地区的气候和水土情况，认为与湖南差不多，种植蜜桔有可能成功。他叫我用他的名义写信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湖南给予支持。后来张平化派来了技术员并运来 1500 株果苗，给同化公社栽种。1995 年 8 月，我在李汝芬、秦金桥等陪同下，回到同化公社，旧地重游，随处都可看到郁郁葱葱的柑桔园。他们告诉我，如今整个灵川县种下的柑桔已达 9 万多亩，成为柑桔生产基地县。我特地来到一片 30 年前种下的至今仍年年结果的老柑桔树丛中，抚摸着那老干新枝，心情很不平静。陶铸那朴实而又可敬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

正因为陶铸热切希望“四清”中能搞好生产，他的心情是很急的，有时碰到不如意的事，他也就不客气，当面批评，甚至发脾气。为了修好有一段坑坑洼洼的公路，他找来管公路的有关同志谈修路的事，但那位负责人并不重视，老是讲他已做了好多工作，那段路平整修理得满好了。对此，陶铸火了，提高嗓门说：“别说了，你的公路修得好不好，我不用眼睛看，凭我的屁股就知道了！”发过脾气后，他见对方很难为情，也就缓和下来，问他到底有什么困难，为他设法解决。

离开灵川以后，陶铸仍很关心同化、五福的运动和生产。根据他的吩咐，我与蹲点的同志保持着联系，随时向他反映点上的情况。1966 年 1 月 26 日，春节期间，他专门约从同化、五福的点上回到广州的工作队负责人谈话，说点上的工作要安排到 8 月底，进村一周年时才能结束。并特别强调说：“工作搞好，最后表现为生产，要把生产搞好。现在生产是大问题。生产搞不好，运动就不算搞好。春节后以生产为中心，结合搞运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风声越来越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即将降临，而陶铸坚持在灵川蹲点时作出的决策，毅然要“四清”的点转上以生产为中心，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强烈的革命胆识啊！

（三）锻炼好队伍

陶铸在这几年花那么大的力气抓“四清”，下决心组织那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蹲点，是有他的长远考虑的。他认定“四清”的群众运动是锻炼干部的极好机会，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极好机会。还在到广东花县新和大队蹲点之前，陶铸在为《中南社教运动简报》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引用了清代诗人赵翼的名句：“李杜诗篇万口传，如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用这诗来勉励大家，特别是鼓励青年同志积极投身到农村的实际斗争中去。这次来到灵川，他同样是怀着火样的热情，鼓励所有工作队员要珍惜到农村的锻炼机会。同化、五福的工作队，来自四面八方，除机关干部外，还有不少文化人、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像珠影的著名电影艺术家陶金、影片《逆风千里》的导演方徨等，都是工作队员。1965年9月初陶铸与同化、五福的工作队员见面时，看见陶金等同志，就从艺术创作谈起，要大家认真参加“四清”。他说：“同志们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伟大的创作。人生一世，能搞几个创作啊！曹禺也不过是创作了《雷雨》、《日出》几个戏嘛。我们把一个生产落后、人们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薄弱的公社变成一个先进单位，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创作？那可要学好多本事啊！我们既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又懂得社会主义建设，对人对己好处极大。既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11月4日，他到了雍田，语重心长地同工作队交谈。他说，土改，很多人未参加，引以为憾。这次大家来参加“四清”，也是千载难逢。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学到很大的本事。它可以让你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生产，懂得走群众路线，懂得农民。懂得农民是最基本的懂得人民。看看农民，他们祖祖辈辈都在农村，城市生活未尝过，现代文明未享受过，难道他们就不是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何况我们还是毛主席派来的搞革命的工作队，应当有责任把“四清”搞好，为农民群众办事。他又说：你们知道

医学院毕业生争着要病床做实习的心情吗？知道学医的人希望能得到一副骷髅骨的心情吗？现在参加“四清”，提供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给你做实验，学会三大革命一齐抓，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机会。11月5日，在工作队的支委会上，他又讲：搞四清，可以终生受用，一辈子受用。他还说：“不想个人利益的，品德就是高尚的；光想个人，不管人民，就是卑下的。”陶铸当时对工作队员的这种循循善诱，加上他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我是终生难忘的。

中南地区农村“四清”除试点外要再花3年时间搞三批，从培养锻炼干部来说，陶铸也是有他的一本帐的。这就是，中南各省每批铺开时，工作队共有五六十万人。搞完一批后，多次轮换，留一些继续作为骨干，这样3年下来，累计总数就大约有100万的干部接受过“四清”的锻炼。1965年11月1日下午，陶铸在桂林体育馆作报告时是这样说的：“3年，可以锻炼100万工作队。将来要全面调整干部。”这些工作队员，除从领导机关抽调外，基层也抽调了大量干部。陶铸说过，从实践看，这并不影响工作，相反，人员减少了，还可减少官僚主义。很明显，作为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是遵循我党的老传统，从实际斗争的风雨中来培养、选拔干部的。他的眼光是看得很远、很宽的。

水乳交融：生活在群众中

1965年11月1日陶铸在总团开会谈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讲到学毛著要解决人生观问题，把思想上的杂质搞少一些，才能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也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说：“水油不能交混，水乳却可交融。”陶铸与群众的关系就是一种水乳交融。

9月3日陶铸第一次来到同化公社，找公社的干部座谈。他说，同化的生产搞不好，不是因为田不好，而是人的积极性没有发

浑出来。你们同化是好地方，名字很好，所谓同化是要同化到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社会主义化。不是同化，而是半化。公社成立3年了，时间不短了，但变化不大。接着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应当诚心实意地拥护社会主义教育，不要抵触。我们都是干部，干部不能包庇干部，不能官官相卫。你们自己检查一下，看有什么缺点错误，好好检查、改正。你们带头把作风搞好，生产队干部和群众就跟着来了。这次工作队来，不是来打倒你们的，我们不抢你们的饭碗。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放一把火，揭露干部的缺点错误，使你们改正错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帮助这个公社建设好。最后他还开玩笑地对大家说，光是国家帮助，你们不搞好作风，扶也扶不起来。像稀牛屎糊墙一样，糊上去又溜下来了。陶铸就这样把严肃的内容同轻松的形式结合起来，使四清工作队与基层干部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被拉近了。

第二天，陶铸又找同化、五福的贫下中农座谈，问他们欢不欢迎工作队来？贫下中农当家作主没有？我们工作队来帮助搞社会主义教育不搞好不走，你们信不信？接着他把前一天跟同化公社谈话的主要内容讲给大家听。陶铸善于运用群众的生动语言，善于用当地群众熟悉的人和事来讲清问题，他知道兴安人喜欢打鸟，灵川人喜欢吃狗肉，一句当地流行的“好鸟不过兴安，好狗不过灵川”，就把全场逗笑了。当有的农民说我们不会讲话，当不了家作不了主时，陶铸说：“要会讲话，李宗仁、白崇禧会讲，让他们来当家作主行不行啊？”在广西谈起李宗仁、白崇禧，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群众立即回答：“当然不行！”

同样，陶铸对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队中来自各方的人员，不管是对大名鼎鼎的《一江春光向东流》男主角的扮演者陶金，还是对桂林市曲艺队的青年演员，他都热情客气，主动交谈。他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他看作一个普通人。他到了灵川，与同化、五福的工作

队员见面时，队长申修称他为“陶老”，他马上说：“不要这样叫我，把我叫老了，就叫老陶好了。老张、老王、老李，这样叫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传统。”说实在的，当时陶铸的年纪只有 57 岁，也真不该称他为“陶老”。

以上的回忆，是根据我随陶铸参加桂北“四清”时记的两本日记整理的。我由衷地感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蒙受的冤屈平反，审查和纠正了过去所作的错误结论，这样我才能重新得到了我在 1965、1966 年担任陶铸秘书期间的工作记录本。这 2 本记录本，是中南局机关统一印制的，纸质并不好，装订也很土气，但它密密麻麻地记下了 35 年前我跟随陶铸在广西灵川蹲点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当年陶铸参加各种会议所作的讲话，只要我在场的，我都尽量记下来了。这可以说是出于当秘书的一种工作责任和敬业精神，更重要的是我感到其中有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真知灼见。没有想到，在那场史无前例的 10 年浩劫中，我放在广州陶铸家里我们秘书办公室保险柜里的所有笔记本，都被那些抄家者席卷而去。而后来它们被收缴到北京，集中到陶铸专案组。陶铸平反后，中央有关部门将这些材料退给曾志大姐。曾大姐辨认出我的笔迹，才将这 2 本记录本交还给我。我的这 2 个记录本在中国的大地上转了一圈，历时 10 多载，又回来了。我双手捧着它们，看到本子封面上留下的专案组用粗大的红墨水笔编下的顺序号，看到本子中所有记录了陶铸讲话的地方，都有一张写有“陶讲话”字样的小纸条置于夹缝中，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集中营里那些惨遭折磨的革命战士身上伤痕累累、血渍斑斑的画面。我眼眶里噙着泪花，像重新获得宝贝一样的激动和喜悦。要是没有这 2 个本子，事隔 30 多年了，我已由一个 30 多岁的青壮年变为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脑子再好，也无法回忆起往日那么多的人物、事件和他们的谈话来啊！

这些天来，我一边撰写这篇文章，一边在思考着。1965年秋至1966年春，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左倾路线正在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引向灾难。陶铸作为党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一位对毛主席、党中央忠心耿耿的老共产党员，要他拒不执行中央的路线是不可能的，这样来提问题也是荒唐的。中央的许多会议，陶铸也是参加了的，他是有原则的人，会议上决定的事，他是要贯彻的。但是陶铸毕竟是伟大的，他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实际，他能摸到群众脉搏的跳动，因此他在执行中央的决策中，能够从实际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有些不该做的事、对人民不利的事，他减减速，起到缓冲的作用；有些该做的事、对人民有利的事，他则暗暗使劲，大胆去做。这种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实践家的实事求是态度，才是最最难能可贵的啊！正因为当时有像陶铸这样的一大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在农村蹲点，各地的“四清”又采取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二十三条出来后还纠正过去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运动的消极方面，生产未受大的影响，许多地方还丰收了，社会也没有出现大的混乱。相反，陶铸当年在蹲点中留下的好作风、好思想和好举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当年在桂北、在灵川播下的种子，绽开了许多璀璨之花，结下了累累丰硕之果。

秦邦宪青年时代的一首诗作

周 国 昌

秦邦宪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勤于笔耕，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诗篇、论著，是我党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在青少年时代，写下了一些珍贵的诗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状况。

20世纪20年代，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特别在文化知识界广泛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政治空气十分活跃。苏州、无锡两地临近上海，受其影响，革命气氛浓厚，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新青年》、《向导》、《觉悟》等进步刊物在两地青年学生中广泛流传，秦邦宪就是在这种土壤环境下步入他青少年学生时代，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他积极参加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萧楚女的宣传演讲活动和社会活动；与进步同学结为挚友，一起关心探讨国家大事；利用课外时间阅读各种进步书刊，接受新事物、新观点，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他常常为中华民族的兴亡担忧，一腔爱国热情时时在他胸中涌动，在时代进步潮流熏陶和革命思想推动下，1924年10月至1925年1月，当时在苏州省立工业学校读书，年仅18岁的秦邦宪，就在《锡报》副刊《锡声》和《无锡评论》上，以则民署名连续发表了《夜醒》、《前尘》、《秋意》、《亲爱的战士们啊》等诗歌和《随感》等散文，热情宣传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秦邦宪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文，集中反映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思想状况，在内容和形式上颇有文学价值。《亲爱的兵士们啊》这首诗是其中的代表作。

1924年9月，江浙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为争夺地盘而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齐卢之战”。这场军阀的混战及两个月后齐军兵败无锡，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时，我国著名诗人郭沫若为调查战乱情况到宜兴等地后，于同年12月写出悲愤的诗句：“少壮流亡四方，老弱死于沟壑，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无锡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的地方小调更是唱得入木三分：“前门送走老虎，后门来了狼，齐燮元赶走卢永祥呀，又来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接着又是孙传芳，走马换将，鸡鸭鱼羊一抢光！”

秦邦宪亲身感受，耳闻目睹军阀士兵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掠夺一空的惨景，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在《绅阀与军阀》等多篇文章中，揭露军阀的罪行：“费二三十年心血造成了的地方文明，给齐军二三小时的蹂躏以后，现在又成一副怎样的状态？”“军阀杀人放火，穷兵黩武，损伤国家，糜烂地方，罪固可杀……。”他在《奇哉，投行从戎之怪剧！》一文中指出根治中国今日纷扰局面的必由之路，“要改造中国政治，打倒军阀为第一着。要打倒军阀，必须投身革命群众之内，靠群众的力量去铲除，打倒它；决不是再去为他们的爪牙……”秦邦宪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社会给予他的感悟，写下了《亲爱的兵士们啊》这首自由体新诗。

花儿正美丽地开着迎接你，
月儿正明亮地照着守候你，
星儿也微动地安慰你，
鸟儿也清唱地祝福你，
——然而你并不流连观听。
你到底看些什么？

美丽的安琪儿？
忠厚的黄白物？
不是——也许是。
你只知瞄准你亲爱的兄弟，
你只顾听着那杀人的军号，
你不想也不思，
只把子弹乱放，
只看得自己是子弹，
只看得自己是尘埃，
只在尘埃中看自己。

诗言志，诗咏怀，诗是情感的产物。在这短短的16行诗句中，流露着秦邦宪深切的阶级感情，洋溢着他的爱国思想和情感。这首诗里“亲爱的”、“啊”、“迎接你”、“祝福你”等富有情感色彩的语言，是他从心头喷出的火花，是呼唤士兵良知的召唤。

秦邦宪在诗的开头接连使用四个排比诗句，用花、月、星、鸟自然之美、生灵之美层层递进，勾画出一幅祥和安宁美好的大千世界。大自然对人类来讲是最公正、最无私的，宇宙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欢迎祝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花儿正美丽地开放，月光正明亮地照耀，星星在微微闪动，鸟儿在清脆歌唱。亲爱的兵士们啊，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感觉到呢？一点不流连欣赏这美好的一切呢？这么美丽的世界你都不在乎，那么，“你到底看见些什么？”是美丽的天使，还是闪闪发光的“黄金白银”，“不是——也许是”，既然你不求这美女和金钱，那么为什么“只知瞄准你亲爱的兄弟，你只顾听着那杀人的军号”，你把自己当作子弹，面对错误的命令，你不做思索而去盲目服从执行，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成为军阀杀人的工具和牺牲品呢？“你不想也不思，只把子弹乱放”，这是秦邦宪规劝兵士们尽快摆脱愚昧，表达了他十分同情、惋惜处在屈

辱地位的兵士们。读完这首诗，一个心底坦然，心灵纯洁、善良的青年学生形象跃然纸上，那种忧国忧民爱国主义思想呈现在读者面前。

18岁的青年学生，一般来讲并没完全摆脱天真无邪的童心世界，青少年时期所具有的青春萌动色彩斑斓，往往离不开恋情。秦邦宪所写的这首新诗远离了这一题材和领域，他把自己的视线和笔端涉及社会现实中，他把对现状的看法、思想、观点写进了诗，这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揭示了他的政治志向、抱负和人生观。

在《亲爱的兵士们啊》这首代表作中，秦邦宪表述的是一种纯朴观点的自然流露，闪耀出他青少年时代朦胧的政治观，初露出其政治上的早熟和天赋。他明确提出“亲爱的兵士们啊”，你们的枪口对准什么人，是瞄准亲爱的兄弟，还是瞄准社会黑暗势力。这里他向士兵们、向社会提出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站在正义的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凶残的敌人一边，从而进一步揭示出一个政治性观点的问题。

“你只顾听着那杀人的军号，你不想也不思，只把子弹乱放……”这些从心底流溢出的诗句，是秦邦宪充满爱和恨的呐喊。这对于那些为着家境、子女和自己生计被迫当兵的苦命人讲，最能触动心弦。读着，读着，很快领悟到秦邦宪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触摸到从他心底迸发出来的神圣呐喊、特有的阶级情感、朦胧的政治意向和观点。这同一年以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光辉论述恰有不谋而合处，当然这不是一般对某一事物看法的巧合，这是一代伟人皆具备的政治目光、天赋和才能的交融。

“五四”时期，中国掀起了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以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生力

军,开始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指导和宣传新文化。中国的新诗,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1920年郭沫若在《学灯》上发表了我国最早的一首自由体诗《炉中煤》,成为新诗的代表作。

秦邦宪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在古书斋里长大的,对古文也颇有兴趣和爱好。新文化运动这场深刻社会变革,影响和考验着秦邦宪。他勇于接受新事物,从古书斋中解放出来,这是他自身努力并受新文化运动和社会进步潮流影响的结果。在苏州读书期间,他如饥似渴阅读《新青年》、《马克思主义》、《创造周报》、《向导》、《学灯》、《觉悟》等大批进步的白话文书刊,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养。

据秦邦宪入团介绍人、苏州同窗好友周学熙回忆:“秦邦宪在校时热情奔放,爱好吟咏革命新诗歌。有一次他带回一首刊登在《孤星》杂志上的新诗,邀我吟诵,我们俩人情真意切高声朗诵,沉浸在浪漫的革命情景中。”这说明秦邦宪喜爱新诗,在革命浪漫的诗意中寄托自己思想情感和意愿。

秦邦宪儿时同学、无锡著名画家王汝霖说:“秦邦宪给我的最深印象,他在小学时就有政治家口才和天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邦宪从小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早熟的特点。经过五卅运动的战斗洗礼,秦邦宪政治上更加成熟,走上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道路。

秦邦宪的《亲爱的战士们啊》一诗,折射出中国社会一个时代的侧面,是探索他青少年时期思想发展的一份珍贵史料。浅析他早年的这首诗作,对于了解秦邦宪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及其成长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扭转东北战局的“七道江会议”

洪英莲 白玉武 于晓航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在北满兄弟部队“三下江南”及东、西满部队密切配合下,打退了国民党军对南满根据地临江地区的四次大规模进攻,粉碎了蒋介石在东北制定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从此,我军在东北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这一局面的出现,与1946年12月中旬在七道江村(今吉林省白山市)召开的辽东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即七道江会议作出的决策息息相关。

—

七道江会议是在东北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妄图消灭南满我军,南满根据地出现危急,需要做出决策的情况下召开的。

1946年7月,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已增加到7个军,25万人,加上特种兵和地方杂牌军,总兵力达40万人。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感到东北的战场战线长,兵力不足。因此,决定改变战略,于9月间,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为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将东北国民党军迅速组成“突击兵团”、“闪击兵团”、“清剿兵团”、“守备兵团”,编为左、中、右三路兵团。在一切部署就绪,于10月19日,调动8个师的主力约10万余人,分三路向南满进攻。其部署是:左路兵团,以新一军三十师,六十军一八二师、九十五师,沿沈吉路向通化、桓仁方向

进攻。右路兵团，以新六军十四师，六十军一八四师（重建）及保安第十支队，向岫岩、庄河、大孤山、普兰店一线进攻。中路兵团，以五十二军二师、二十五师（欠七十五团），沿安沈路向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方向进攻。企图将我军压缩于长白山地带进行决战，先吃掉南满我军，或将我军驱逐出南满，以便解除后顾之忧，稳定后方，再全力进攻北满，达到占领整个东北的目的。

当时，在南满地区，我军主力只有三、四 2 个纵队，4 万余人。南满根据地尚未巩固，群众尚未发动，部队经过长期作战，需要休整。敌我力量对比，敌占绝对优势。中共中央东北局为加强对南满地区的领导，成立了南满分局，派陈云、萧劲光到南满，领导南满根据地军民，同国民党进行斗争。辽东军区基于敌强我弱之势，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敌人要攻占什么地方就让他攻占，我只根据‘能歼灭敌人的仗就打，不能歼灭敌人的仗就不打’作为行动最高原则”，主动放弃南满一些地方，实行战略退却。我四纵队，在完成掩护机关和后方撤退的任务之后，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在辽南宽甸新开岭地区，将进攻的中路兵团中国国民党军号称“千里驹”师五十二军之二十五师一举歼灭 8900 余人。国民党军受到沉重打击之后，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集结 10 万人，向临江地区实行重点进攻。

10 月 25 日，国民党军五十二军二师抢占了安东，11 月 2 日，五十二军一九五师攻占了通化。至 11 月上旬，南满地区大部分被国民党军占领。敌人为了消灭我军，摧毁我南满根据地，在其所到之处，收罗土匪、特务，扶植地主、伪满残余，建立伪政权，成立保安团队和地方武装，组建保甲制度和情报网，进行抽抓壮丁，派款要粮，破坏我根据地的地方组织，对我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实行白色恐怖，企图把广大群众同共产党和民主联军隔绝起来。

辽东军区、辽宁省委、安东省委和政府机关、工厂、医院、学校及三、四 2 个纵队被迫聚集在方圆 700 里、仅有 23 万人口的临江、蒙江、抚松、长白 4 个小县境内。这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粮食供应困难，装备不足，弹药缺乏，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给我党我军带来极大的困难。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大块根据地丧失，广大群众着急、害怕，担心我军在南满站不住脚。党内、军内也是议论纷纷。是撤往北满还是在南满坚持斗争，成为当时党政军民最关心的问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辽东军区党委贯彻东北局的指示，召开了这次会议。

二

1946 年 12 月 11 日至 14 日，辽东军区党委在七道江村召开了军事干部扩大会议，即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七道江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满分局、辽东军区的领导同志，三、四纵队师以上的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南满形势、研究今后作战方针和军政教育训练等问题。萧华、萧劲光、陈云先后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第一，在讨论是否坚持南满斗争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

12 月 11 日，会议正式开始，萧华主持会议。萧劲光首先在会上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东北、南满形势。指出东北是国际、国内反动势力与我争夺的焦点，现在敌进攻东北的锋芒首先放在南满；二是目前行动方向问题。指出我军的行动方针，要以敌人的变动而改变；三是反清剿问题——游击兵团到敌后的活动方针问题。指出我军反清剿胜利的关键在于控制农村，争取农民。

随后，与会同志对萧劲光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坚持南满斗争问题时，出现了几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把三、四两个

纵队拉到临江正面战场与敌作战；一种意见是把三纵队放在临江正面打，四纵队分散到敌后打，在南满坚持斗争；第三种意见是三、四两个纵队留在南满力量小、不好打，撤到北满去，而后再出击消灭敌人。也有的主张先在南满打一仗看看，打不赢就北上，打好了就坚持下来不走了，等等。争论的焦点，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撤离南满的问题。总的来说，不管哪一种意见，都是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都是对革命战争高度负责的表现，只不过是各人看法不同罢了。

第二，从意见分歧，最后统一到坚持南满斗争上来。

12日，萧劲光主持会议，继续讨论是否坚持南满斗争问题。当晚，获悉敌五十二军二师集结于沙尖子（宽甸东）准备进攻辑（集）安。七十一军九十一师集结于桓仁，三十二军主力集结于通化，新六军二十二师进占梅河口。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前线指挥部已抵通化，准备向我临江根据地进攻。辽东军区立即进行了部署：令三纵队和四纵队十师在蒙江以西地区集结，消灭可能迂回八道江之敌二十二师。四纵队十一师在鸭园（通化东）钳制正面敌人。十二师及独立师在通（化）桓（仁）以西活动。当即责令部分纵队、师的军事指挥员赶回部队驻地，组织部队作战，其余人员继续开会。

在13日的会上，去留两种意见仍没有统一起来。而敌人开始进攻，萧劲光立即用电话向在临江的陈云通报了会议进行情况，并请他前来参加会议，做出最后决断。当晚10点，陈云冒着风雪赶到了七道江。

14日，陈云主持会议，继续讨论南满的军事方针。萧劲光将两天会议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陈云听了会议汇报后，问与会同志：“你们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让同志们谈谈看法。这样，对是否坚持南满斗争问题，几乎争论了一整天，晚上开会时，陈云又问：“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与会同志发表了各自的意见。陈云见同志

们的意见仍不统一，开始讲话了，他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接着，陈云就留在南满坚持斗争问题，分析了全国目前战场形势、东北战场敌我形势，着重讲了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性意见。指出：南满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坚决不能丢；只要守住南满，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敌人在南满的兵力也不够，我们坚持南满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长白山留在我们手里，群众就有信心向着我们，有了根据地和群众，什么事情都好办。与会同志听了陈云的分析，思想开始转变，拥护和赞成陈云的意见，认为陈云的分析是正确的，符合南满斗争和东北战场作战的实际情况。这样就结束了几天来的争论，改变了会议气氛，人人心里亮堂了，意见分歧得到了统一，认识到坚持南满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三，在思想认识统一的基础上，做出了坚持南满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14日晚间的会议上，萧劲光根据陈云的讲话精神，综合与会同志的意见，代表辽东军区党委对会议作了总结讲话。指出，一是要充分估计到东北可能有极不利的情况到来。南满的存在对东北有重要意义，我坚持越好，对东北全局有重大作用。二是要充分估计敌人对南满的压力。目前我很被动，一定要在被动中争取主动。三是在南满生存，要扩大长白山以外更大地区。四是我军的军事部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正面作战。五是要注意提高各级干部的战术指挥能力。六是要注意冬季作战卫生。

在萧劲光讲话之后，与会同志对他的总结及如何坚持南满斗争等具体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最后形成了会议的统一决定：确定坚持南满斗争的方针，坚持南满、保卫长白山，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一分区（辽阳、海城、岫岩、营口、青城一带）；辽宁二分区（西安、开原、沈抚联合县、东丰、西丰、清原一带）；安东三分区（本溪、

田师付、新宾、永陵、沈抚联合县、碱厂一带)。作战部署是：确定三纵队在临江、通化、金川一带，坚持正面防御作战，顶住敌人，巩固现有根据地；确定四纵队插到敌后，分散作群众工作，变敌后为战场，紧密配合正面战场，粉碎敌人对南满根据地的进攻，努力争取改变目前敌强我弱的局面，掌握在东北战场作战的主动权。

三

七道江会议，做出坚持南满斗争的重要决策，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在南满斗争的一次重要转折。它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扭转南满战局的关键，在扭转整个东北战局方面，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七道江会议对改变南满战局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在七道江会议上，经过陈云、萧劲光、萧华等积极努力工作，把是否在坚持南满斗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统一到坚持南满斗争上来，树立了坚持南满斗争的胜利信心。做出坚持南满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这种决策，三、四2个纵队采取正面防御作战与敌后游击作战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配合，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的战略战术原则，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方针，连续打退了国民党4次大规模的进攻，夺取了4次临江保卫战的胜利，从此，南满战场出现了新的形势。这种新的形势，“对加速东北蒋军之被动和发展我军之主动，诚具重大意义”。

第二，七道江会议为扭转东北战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从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东北战场我党我军处在最困难时期，南满根据地出现危急的形势下，做出了坚持南满斗争的重要决策。这一决策，是关系到整个东北战局发展的重要关

键,这是“整个东北战场形势上极端重要的一着”。七道江会议前夕,南满形势十分险恶,整个东北战场也是敌强我弱之势,广大干部和群众担心我退出南满。由于七道江会议统一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思想认识,做出了坚持南满斗争的决策,从而对保卫北满,建设巩固后方根据地,有着直接意义。这一决策,把大部分敌人兵力拖在南满,使敌人没有力量向北满进攻,没有力量过松花江,更没有力量进攻哈尔滨。这样,不但保卫了北满,而且为巩固北满、南满、西满根据地也赢得了时间,在根据地内可以发动群众搞土改,可以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可以建设和扩大我们的部队,壮大我们的力量。我军在南北两大战场上,实行“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呼应,互相配合”的作战方针,使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我军在运动中抓住敌人的弱点,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夺取了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作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不仅扭转了南满战场形势,而且对扭转整个东北战局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七道江会议是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为我党我军共同奋斗,战胜困难,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七道江会议上,对坚持南满与放弃南满的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但作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辽东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东北局副书记、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的陈云,虚心听取和认真分析同志们的意见,采取循循善诱,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方法,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很快地统一了思想认识。这种民主作风和思想方法,使同志们心悦诚服,拥护和赞成东北局的决定,拥护和赞成陈云、萧劲光的讲话和建议,坚决赞成和服从会议的决策。七道江会议,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样才有群众基础,才有生命力。

一張護照的来历

楊德修

亦有本部少校隨從秘書楊冀
新帶上尉付官田福琛便衣崔金茂
去離石中陽石棧一帶公幹了
解近境情況携帶隨身物品希
所遇各軍界機關驗証放行
並多加協助為盼

限月夜繳清

團長劉國祥

中華民國卅四年六月十六日

这是抗战胜利前夕阎锡山军队的一张护照。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我至今仍保存着。每当看到它,就想起了过去的那一幕场景……

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在晋绥解放区的阎军和国民党军,为了接替日军的防务,阻我解放城市,勾结早已投敌的伪军,企图大举进攻解放区。晋绥军区南线的阎军拟从离石、中阳一线突破北犯,已直接威胁到军区首脑机关。当时同蒲路以西,由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沿线都有阎军安设的据点,不仅柳林驻有重兵把守,就连靠近黄河离三交不远的郝家庄都设立碉堡安下据点。军分区的主力部队17团和离石支队虽在夜间奔袭过,因阎军附近据点出兵驰援,加上对敌情估计不足,我军未能攻克郝家庄。

当时我在离石支队任特派员,是不久才从120师锄奸部(晋绥军区保卫部)调来的,我率支队三连直接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后不久,为了反击阎军、准备反攻夺取城市,三分区司令员杨家瑞和支队长陈仕南令我化装深入阎军腹地了解敌情。

随我一起完成任务的还有17团三营机枪排长田福琛和支队的侦察班长崔全茂。我们着便衣于6月16日起程,到临县的碛口过黄河。从河西到三交对面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找到石楼工委黄石山(解放后,他任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经工委帮助弄了阎军骑二师四团团部的护照,用我的化名(杨冀新)写上“少校随从秘书”、“带上尉副官田福琛便衣崔全茂去离石中阳石楼一带”,“了解边境情况”。我和田穿上阎军的军官服,工委介绍了一些情况,又派地下党石楼县小蒜镇(县城附近的重要据点)的支部书记和我们一起行动。过黄河时,都把手枪和衣物放进一只整羊皮筒内,再用口吹气让它鼓起来,然后每人就搂着这样一个叫做“洪筒”的皮筏(几个连在一起可以行船)入夜偷渡到河东岸。我不会游泳,由崔、田二人架着过的黄河。去时比较顺利,深夜竟走山上小路,于拂晓前到达小

蒜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家。他怕家人发觉泄密，就引我们三人钻进他家在山坡上向阳的一个冬季存放土豆的洞里，洞口很小，猫腰钻进去再用青石板一堵，只能从缝里透进一点阳光。洞里勉强容下三人，直不起腰。因为村里驻有敌军，日间小便只好自己用手扒一个坑往里尿，再用土埋上。等到夜间，我和地下人员接头，调查敌情。

至今记忆较深的，有3个在当时来说是重要的情况。第一，阎军增调石楼的炮兵营由山炮连、重迫击炮连、野炮连、机枪连组成；第二，阎锡山已由吉县进驻隰县，并在城内外构筑工事；第三，驻黄河以西的阎军仍在东调。

因情况紧急，我按石楼工委的委托，安排好敌军工作，和地下党支部书记告别后，于拂晓前上路回返。行军至下午2点多，在海拔1000多公尺的山顶上，突然听到敌军追喊：“哎！你们是哪部分的，等一等一块走。”我们停下来，回头一看，只有两人，我当即回答：“是骑二师的”。对方也说：“是骑二师的”。我已意识到不好，因为我掌握骑二师的情况太少，应付几句可以，对方问多了会露馅。当时我们已经靠近山顶上的一个小庙，以此为依托，我决定等敌靠近时叫田福琛开枪打。田的枪法好，只用驳壳枪连发两下便将前边的军官打下马滚到山沟里，后面扛枪的士兵跳下沟也跑了。我骑上缴获的那匹枣红马和田、崔二人离开现场不久，就听到附近据点出来的敌人打枪，我们绕道于下午4点多到达黄河岸边隐蔽起来，敌人只放枪没有下山追赶。到黄昏时，我叫田福琛按事先规定的信号，朝着石楼工委的驻地连发三枪，不久有石楼工委的船把我们接河西去。在工委没有停留，吃过饭就急着返回部队，向首长汇报。

我们得以通过敌人据点，深入敌腹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打探敌情的任务，是与这张阎锡山军队的护照作掩护分不开的。这张护照是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愿人们能通过它了解那段历史。

入党誓词演变考

薄金花

誓词,古往今来,是人们恪守各种诺言、盟约,用不同的方式立誓。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是中华民族史上最崇高、最壮丽的誓词,因为它发誓的奋斗目标不是为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誓词的演变展示她逐步走向成熟的光辉历程。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入党誓词

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入党誓词作了规定,提出了三个问题:你是否信仰财产共有制的原理是真理?你是否愿意担当义务始终不渝地以言语和行动传播财产共有制的原理,并促使在实践中得到实现而努力?你是否愿意服从同盟的建议?那么,请向我们许下诺言作为保证。当时,凡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必须对上述提问一一答复说:“是的。”并在最后亲口许下诺言,才能成为盟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誓词虽然在形式上沿用了19世纪欧洲流行在教堂内问答式的起誓方式,使誓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人的入党誓词,其内容是革命的,超越了以往任何个人、团体、派别、组织的盟约和诺言,是解放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宣誓书。在这个誓言的激励下,涌现出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批批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

争中用生命和鲜血抒写了不朽的篇章，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红军时期的入党誓词

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及建党原则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入党誓词中的优秀思想也被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充分吸收。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并不是一建党就有的，它是早期共产党员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为捍卫党的组织，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应运而生的。1928年，井冈山地区北田村一位姓贺的农民在画有不规则党旗的书面上写了自己入党誓词：“牺牲个人、言首秘密〔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从党旗〔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在24个字的誓词中，虽然有错别字，内容简单，但它质朴无华，铿锵有力，饱含革命的热情和强烈的战斗愿望，成为后来红军时期入党誓词的基础，在腥风血雨的锤炼中，这24个字的入党誓词更加有序和准确了，这就是：“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至今，我们仍能从这朗朗爽口的誓词中“嗅”到那浓浓的火药味；“听”到共产党员冲锋陷阵的呐喊声；“看”到共产党员为保守党的秘密面对敌人的酷刑、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全部誓词的核心是“永不叛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 入 党 誓 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入党誓词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演变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这个誓词共44个字,与红军时期的人党誓词相比,内容增多、表述规范、前后有序,对党员的要求具体。誓词中新增的“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使遵守党的纪律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比过去的“牺牲个人”的内涵更宽阔,表明共产党员不仅具有排除万难的意志,而且更具有为了党的事业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宝贵的生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使誓词的境界升华,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写入党誓词中,要求共产党员必须确立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念,必须具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这个誓词经历了从马背上的征战岁月到中南海的灯光,至党的十二大前夕,它整整辉煌了50年。半个世纪中,无论是征战还是建设,无论岗位的平凡还是特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明天,把自己的人生准则凝聚成两个字:奉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 入 党 誓 词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载人修改了的人党誓词,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十二大党章第一章第六条明确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誓词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议,保守党的秘密,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个誓词是在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下产生的,与前一个誓词比,它更全面、系统、科学地把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的条件言简意赅地进行了高度概括,透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目

标、宗旨、任务、纪律等，使宣誓人立誓时心灵净化在忠诚和无私的情感中。这是前两个誓词所不能比的，其中：“严守党的纪律”是对前两个誓词的继承，但新用一个“严”字，强调了党的纪律在执政党领导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性，“保守党的秘密”是对红军时代入党誓词“严守秘密”的继承，重申了在和平年代严守党的秘密的特殊重要性，“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指共产党员的全部只属于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生命依然是党员的义务，在“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中，“随时”表明在党和人民召唤时，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命。这比过去“不怕牺牲”内容更充实更严谨，描绘了共产党员特殊角色的风采，最后是“永不叛党”，这是对红军时期入党誓词的恢复，表明执政党的党员在没有枪林弹雨的和平环境中仍然可能出现背叛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可见，在和平建设环境中，“永不叛党”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当我们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时，标志着对人生的重大抉择，又是塑造崇高人格的起点。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无数革命先烈为实践入党誓词在血与火中惊天地泣鬼神，他们高唱国际歌：“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能实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瞿秋白面对刽子手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盘膝坐在草坪上，从容就义，正因为如此，他们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动荡的中苏关系(1942—1944)

[俄]A. C. 潘友新著 峦景和译

编者按：A. C. 潘友新是苏联著名外交家，先后 11 年担任苏联驻中国、美国大使。在中苏关系动荡的 1939—1944 年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1981 年苏联内部出版了潘友新回忆录《大使札记，中国 1939—1944》，该回忆录根据大量的档案材料、原始笔记和亲身经历写成，对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美英等国的对华政策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有着较为客观的记录，对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尤其是两国间的高层往来提供了新的视角。经潘友新之子授权，本辑选刊部分章节。题目为译者所加。

在 莫 斯 科

1942 年 10 月中旬，我接到返回苏联就中国局势情况进行汇报的指示。临行前我同中国许多知名人士进行了交谈，其中包括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经济部长翁文灏、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等。

我了解了苏中贸易的发展、中国战场的局势及战后世界格局情况等。按何应钦的话说，日本人 1942 年秋在中国战场上采取军事行动的军队有 39 个师，战场基本已寂静下来，只是在中国东北日本人继续所谓的“围剿”行动，造成游击队被迫放弃并撤出大部分地区。何应钦强调，所有战场，中国东北是最薄弱的地方。他说，

共产党人领导的八路军在这一地区显然没有足够力量阻止日本人的进攻,而由于共产党人的阻挠,中央政府军队又不能进入该地区。如果八路军和中央政府军队达成协议配合行动的话,就可以收复大片失地,使日本丧失利用当地资源的可能。何应钦同时指出,如果达成统一指挥的话,可以牵制并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但八路军不执行中国中央政府的命令,擅自行事。在回答我的问题,中国中央政府的确不向八路军供应弹药和食品时,何应钦回答说:1941年1月前,曾经正常供给,但在八路军停止执行中央政府命令后,对其供给终止了。为此,何应钦声称,八路军不需要、也未请求中央政府对其供给,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行动地区建立了另外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发行自己的货币,征收税款,执行自己的政策。八路军的特殊情况对未下定决心抗击日本并表现犹豫不定的阎锡山部队产生了相反的影响。

按何应钦的看法,为成功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一个国家不需要两支武装力量和两个政府。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央政府的所有建议。何应钦还通告到,蒋介石召林彪从延安来为解决中共同国民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创造了可能性。

同孔祥熙、翁文灏、孙科及其他人士的交谈涉及了两国贸易问题。

在回答有关战后中国机构特点问题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说: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权利的新宪法;确定政党及团体的地位和作用,并使广泛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项工作。他声称,中国不仅在战时需要苏联的援助,战后的建设时期也同样需要。中国同苏联的相互关系史证明了他们有共同道路。苏联是第一个向中国放弃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国家,为1925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提供了大量援助,在物资和道义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深信这一切为援

助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中国需要这些援助,因为它像一个寻求支持和治疗的病人。中国所遭受的疾病和痛苦应当由苏联富有经验的援助之手来根治。谈话结束时吴铁诚强调,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苏联对中国关系的真诚与友好。

1942年10月16日,我拜会了蒋介石,在回答蒋介石关于我对中国有什么意见和看法问题时,我声明:我们两国间在贸易问题上工作进行得极为不顺利。年度付款期限已过了两个星期,而中国农产品发货只完成了37%,矿石45%。如果考虑到中国应当向苏联支付2500万美元,而签订的合同只有1800万美元的话,那么,农产品的发货不超过14—15%,而且对苏联来讲还面临许多问题。各种商品的价格提高了,例如,1939年1担毛的价格定为18美元,而现在是42美元。我同孔祥熙、翁文灏及其他人士进行了一系列交谈,并指出,我需要中国政府方面就消除债务问题的坚决保证,以便向苏联政府汇报。蒋介石向我保证,贸易情况可以得到改善。按他的看法,这都是由于缺乏燃料和机动车辆造成的困难,如果苏联能向中国提供燃料,中方是可以完成或超额完成农产品及矿石的发运工作。我对此指出,在近来的15个月时间里,苏联向中国出售了大约6000吨汽油和2万美元的汽车配件,但遗憾的是,中国方面未急于将这些物资从新疆运出。

后来,蒋介石请我转告苏联政府,中国将努力改善自己同苏联的关系,这反映在中国政府想共同开发独山子油田和经营新疆飞机制造厂问题上达成协议。关于这两个问题,中国想签订合同,对这些建议我表示完全赞同。最后,蒋介石请我转达对斯大林的个人问候及信件,也同样向莫洛托夫表示问候,对其有关新疆问题的来信表示感谢。

1942年11月末,我被允许返回祖国。1942年12月5日在由重庆返回莫斯科的数天后我被召到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在那里接

见了我。

对苏联人民来讲这是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实施包围法西斯军队,并最终给予粉碎性打击的残酷战斗时期,也是加里宁方面军在魏里基卢基地区和雷日耶夫市以西发动进攻的日子。众所周知,自1942年6月到1943年2月,在历史上进行了一场决定战争命运的鏖战。1943年1月31日,德国第6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赫·帕乌柳斯元帅率残部投降。

在询问我是如何从重庆返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突然问我:“您的英语现在怎么样?”我回答说:刚刚通过英语初级大纲的考试。他了解了什么是最低大纲,我做了解释,并聆听了他要我继续提高知识的建议。这时我回忆起来,1939年7月9日,在谈话结束时斯大林同样向我说了这些。当走出办公室时我还在琢磨,他为什么建议我学习英语而不是汉语?

后来,我详细汇报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及战场情况。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国军队的状况和装备情况,他对中国军队装备薄弱感到有些吃惊。他还询问了冯玉祥元帅和一些中国其他人士的情况,谈话持续了2个多小时。出席谈话的还有国防委员会的4名成员。

谈话期间,斯大林几次走到隔壁办公室,在那里显然是同前线指挥官进行了电话交谈。他当时的情绪很好。交谈结束时,他向在座的莫洛托夫问到:

我们如何回答潘友新带回的蒋介石亲笔信?

莫洛托夫从自己的文件夹里取出文件说:

这里有一份潘友新准备的,我认为是可行的回信方案。

斯大林说请给读一下,听完后说:

咳,回信的方案的确可行。

后来,斯大林拿着信亲自做了修改,并补充了对蒋介石和他亲密助手们的亲热语言,祝愿他们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中国

民族主权和独立斗争中取得成功。

信在办公室很快打好，斯大林在信上签了字。

在后来的数天时间里，我同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面。大约一周后，我飞抵苏联外交部所在地古比雪夫，在那里我同样向维辛斯基和外交部的其他工作人员就中国的形势做了汇报。

1942年12月20日，我飞往阿拉木图，并计划在1943年新年前赶到重庆，但遗憾的是由于天气不好，新年前我未能到达重庆。由于大雪和风暴我滞留在乌兹别克斯坦，在塔什干被叫去接莫洛托夫的电话，解释了滞留的原因。不久，到达了阿拉木图，并在1943年1月的头几天通过了苏中边界。当时我的心情很好，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鼓舞了我们所有人并预示着未来的胜利。但我们的胜利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中国的局势相当紧张。我返回中国时走的是经新疆的这条普通路线，因此，不可能不利用这个机会同新疆省政府长官盛世才督办进行交谈。

1943年1月6日，在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希金和翻译古德留克夫的陪同下，我同盛世才进行了长时间交谈。我向督办声明，尽管总领事馆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就新疆对苏联公民和苏联机构的不正常态度多次声明，但情况没有朝好的方面改变，独山子的局势令人担心。为此，我列举了企图使矿井和炼油厂停产的一系列破坏行为，向督办指出了在新疆大量逮捕苏联公民的情况。但督办大约用了1个小时来证明新疆和从前一样，新疆政府没有改变自己近10年来奉行的对苏政策。涉及逮捕苏联公民一事，盛世才试图解释是对这些人的国籍理解存在分歧，而且他保证到，最近时期逮捕的苏联公民已被释放。他试图让我相信，新疆政府对发展联合体，并使局势正常化是感兴趣的。作为论据他指出，新疆政府似乎为联合体投入了400多万新疆元及很多的人力物力，新疆政府同中国一样需要燃料。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行政当局组织怠工行

动,在联合体内不采取使局势正常化的措施时,督办说,摩擦和冲突似乎是因为苏联和中国行政当局对准确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在回答普希金的问题,最近发生严重的怠工和破坏行为,例如,企图使工厂停产、盗窃苏联方面的财务文件,是发生在联合体开工临时秩序达成协议之后时,督办没有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从这次交谈中我得到明确的结论:首先,我明白了督办完全庇护中国方面对新疆苏联公民和苏联机构采取的非法行为,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对我来讲很清楚,他将会在未来执行同苏联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在交谈中,中国中央政府特别全权代表吴泽湘的出席,证明了盛世才的所为是经中国中央政府完全同意的,后来的事件证实了我的结论。经过几个月后,新疆的局势更加恶化了。

重返重庆与中国人士的会面

1943年1月13日飞抵重庆后,我同外交部长宋子文进行了会面,并进行简短的交谈。我通知他带回了斯大林给蒋介石大元帅的信。他对斯大林的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斯大林亲笔签字感到满意。他建议我把信的内容译成中文。

在这次交谈中我了解到宋子文对新疆石油公司、飞机制造厂和其他涉及苏中两国关系的问题是掌握的。我向他通告,受苏联政府委托通知中国政府,苏联政府同意与中国合作开采独山子油矿。

后来,宋子文了解了苏德战场的战斗进程,请我谈了斯大林格勒的情况,是否在那里包围了22个德国师?我向他通报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如何进行围歼德国军队的情况。

1943年1月17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接见了,我,出席接见的还有外交部长宋子文、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李维国和军事委员会局

长卜道明，大使馆一秘柯瓦廖夫以翻译身分参加了会见。双方互致问候后，蒋介石向我问到，在莫斯科最高统帅部见到了苏联元帅们和在中国政府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卡恰诺夫和崔可夫没有？我回答说，我见到了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斯大林。伏洛希洛夫和季马申科元帅都在前线，未能见到。虽然我见了布琼尼，但因为急于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也未来得及交谈。至于崔可夫将军，我在同斯大林交谈时他说，崔可夫指挥的62集团军保卫斯大林格勒战斗得很出色。我继续讲到，从前在中国的许多军事顾问现在都在苏德战场的各个地区。

谈话还在继续，我向蒋介石转告到，斯大林对收到大元帅的信表示感谢，蒋介石同时也对收到由我转交的信函向斯大林表示谢意。后来，我向蒋介石通告了斯大林赞同蒋介石信中提出的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的看法。蒋介石像从前一样，当他满意时用带有宁波的口音说到：很好，很好。

蒋介石继续问，斯大林元帅如何评价国际局势？我回答说，他没有特别谈到这个问题，但他明确表示，深信“轴心”国将遭到彻底地粉碎，强调了加强我们国家安全的必要。从自己的方面，我指出苏德战场上出现了对苏联有利的形势；盟国在太平洋的力量也得到加强，同时中国军队，其中包括第5战区获得了一系列胜利。我深信这一切证明了“轴心”国必然崩溃的论点。我补充到，在祖国我密切关注着中国军队的战斗情况，蒋介石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军队在最近时间取得了明显成绩，对缅甸和中国东北地区给予了主要的关注。

会见结束时我说，给蒋介石带来一支我们军事技术最新成果的手枪作为礼物。看完手枪，蒋介石对礼品表示了谢意，并请求把说明书捎给他。后来，我向蒋介石通告了苏联政府同意与中国共同开采独山子石油矿一事，有关这些宋子文已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

介石说,他为此感到高兴。谈话到此结束了。

从莫斯科返回重庆后,我简直被中国人士的见面、宴请包围着,这显然是由于苏联武装力量在苏德战场上的胜利促成的。在1943年的前3个月我同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次会面。

1943年1月22日,我邀请外交部长宋子文和一些外交部以及交通部的工作人员共进午餐。我请部长在两方面给予提供帮助:一是加快对到中国苏联人员的手续办理;二是请帮助大使馆找房子,因为在莫斯科我请求给我们补充派遣25名工作人员。宋子文对我们两国间扩大关系表示满意,并保证提供所有的帮助。

1943年1月23日,我同新任命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进行了会面,对即将赴任的大使表示了祝贺。交谈中自然涉及了许多有关战场局势、国际形势和中国驻苏联大使的未来工作等。其中,令我感到愉快的是傅秉常表示准备在苏联学习俄语,在中国大使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当中只有2个人懂俄语。我对他的计划表示欢迎,并说,如果双方互派自己的工作人员到对方那里学习语言、文化及苏中两国历史将不是件坏事。为此,我发现并已经就这方面情况采取了相应措施,请求中国当局允许使馆工作人员费德林、季莫非耶夫及谢列金为更加深刻、认真地研究汉语、文学和中国历史到中国大学里学习。傅秉常声称,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并说在中央、西南和成都大学以及政治学院开设俄语课。他通报到,中国外交部也开设了基础俄语学习班,原来准备建立俄语研究学院,但这个方案未能实施。

第二天,北京图书馆馆长袁都力(音译)同我进行了会面。他来访的目的是对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斗争精神表示钦佩,同时想就补充图书馆苏联图书等问题达成协议。我向他保证尽所有可能为图书馆提供苏联出版物。

1943年2月11日,我邀请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

共进午餐。我们很早就认识，经常见面，所以和他的交谈没有拘束感。涉及反法西斯同盟国立场时，孔祥熙对英国战后的未来立场表示出不信任，这种结论来源于英国代表在美国召开的太平洋制度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似乎证明英国开始计划与日本暗送秋波。孔祥熙担心，在解决战后共同问题上，其中包括对中国的关系上，英国会重演其传统政策。我谈到今天的主要问题仍是战争，而战后问题适合于胜利后再讨论。孔祥熙指出，还是在战争前，英国就企图同日本达成协议，类似这种情绪在中国同日本战争中多次表现出来。他列举了英国人对苏联不友好态度的一系列事实。继续谈到英国对苏联政策时，孔祥熙指出，英国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政策非常不明确，是英国人拖延了第二战场的开辟。我同意孔祥熙的看法，并从自己方面指出，无论出现怎样的军事形势，无论产生什么样的怀疑，但现在战争的正义思想会战胜“轴心”国，并使其遭到彻底的失败。为此，现在需要全力斗争，在取得胜利后可以平稳地讨论所有战后问题。孔祥熙表示，不仅是现在，而且在战后应当加强中苏两国间的合作。我同意并补充到，我们的政策同样如此，即坚定不移地加强苏中人民之间的友谊。

1943年2月中旬，我同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进行了会面。按他的话说，当时在中国战场上没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日本人从中国夺取了原料，完全是满足了他们。然后谈到美国、英国代表们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白崇禧声称，迪恩将军和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来到了中国，并就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结果和在未来向中国供应军事物资的情况通报给中国政府。至于涉及在缅甸开展军事行动的日期，英美统帅部声明，1943年下半年前，在缅甸不可能开展积极的军事行动。

为弄清中国政府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立场，我向白崇禧询问到，在那里是否可以开辟那样的战场？他声称，根据他的看法，

最容易的是在巴尔干半岛国家,特别是土耳其北部,因为在丘吉尔同土耳其总理会面后,土耳其更加服从于盟国方面。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也持同样观点,那时王宠惠说,开辟第二战场最可能的地点是意大利,因为它是“轴心”国链子上最薄弱环节。根据王宠惠的看法,那种方式的可能性已被盟国采取的北非战役所证实。

苏中关系的恶化

像以往一样,我对苏中贸易关系特别重视,这是自然的,因为通过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完全可以评价两国的关系状况。在那个时期,苏联需要重要的战略原料,因此两国贸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履行向苏联发运中国商品的合同问题上,我表现得特别坚决。

1943年6月21日,我拜会了中国经济部长翁文灏,并向他提出:根据新签订的合同,中国应当在1943年向苏联提供钨,但这种金属我们1克也未得到。那时,苏联每月得到从中国发运来的500吨钨,但发货不是定期的,而且是属于执行上一年合同,即还欠款。关于新合同,我们什么也未收到。我向部长声明:作为战略物资,苏联非常需要钨,并希望部长寻找到每月定期发运1000吨钨的可能,以便在年末前,把新合同的4000吨和旧合同剩余的500吨钨发出。后来,我就已签订的从中国进口到汞的合同前景问题向部长提醒到:苏联目前只收到了200吨中的30吨汞。部长不了解这个问题的情况,只是像往常一样认为,中国未能按期发运钨和汞是交通困难造成的。

利用这个机会,我向部长表示了感谢。由于他的大力帮助,在印度通往苏联的道路上运送着大批锡。我向他通告到,为偿付保险和运输费用,需要在近期向纽约银行的苏联帐户汇款50万美元。

当然，我所说的这个数目包括中国政府对苏联偿还借款在内。

尽管在同一系列中国领导人，其中包括在同经济部长的交谈中，我常常强调加快向苏联发运物资的必要性，但这个问题解决得还是非常缓慢。

1943年7月19日，我拜会了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谈到了苏中贸易关系问题。我向孔祥熙声明到，中国方面实际上还未执行1942—1943年度合同，除经过印度发运的1500吨锡外，中国方面未按本年度签订的合同向苏联发运1公斤货物。在此之前，我们签订合同的数额是2772万美元，发出的货物（锡、汞和生丝），根据1943年6月20日统计，共计为212.5万美元，只占合同总额的7.7%，而本年度只剩下了5个半月。我向孔祥熙指出，外贸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工作完成得特别不好。同时，我向他提出了中国方面还未完成1941—1942年度发货合同，例如，苏联未收齐1942年度合同的250担生丝。我为此声明，我们不准备接收中国方面发运无法使用的85吨发霉绿茶的建议。

综上所述，我向孔祥熙声明：苏联方面不能容忍中国方面不能令人满意地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并请求采取必要措施完成中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

孔祥熙试图否认中国方面不积极履行合同，像以往一样，以运输困难为借口，甚至以相应的哲学根据证明自己的看法。他声称，在他看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完成所承担的义务，中国也不例外。为此，他甚至暗示苏联在此前似乎也同样未完成自己的义务，因为苏联没有为由伊朗经苏联到中国的物资提供中转。对此，他表现出可怕的健忘性，正是1943年初，在苏联的南方、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区苏联军队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着残酷的战斗，这自然不能为经过苏联南方地区的物资提供中转可能。

1943年11月13日，我拜会了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并通告他，

苏联外贸人民委员会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向中央航空公司和伊宁航空学校出售航空汽油的建议表示赞同。我指出，苏联方面希望提供的燃料能用于苏联乘客在哈密—重庆航线的往返，中国方面应采取相应措施，定期运送在其他航线上的苏联乘客和物资。

大量的精力需要投入到发展苏中文化关系、中苏文化协会的积极活动上：苏联电影艺术的宣传，包括放映苏联影片等。同时，还要同在中国常常出现的各类反苏报刊、书籍和小册子进行斗争。这项斗争并非轻松，因为中国当局以及反苏集团常常竭力破坏苏中关系，灌输中国人民在心灵上仇恨苏联。为此，由于苏联在战场上的胜利，反苏活动更加活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国家外交代表，特别是英国外交代表促成的。1943年11月12日，宋庆龄在同我交谈时说：英国人担心苏联摆脱战争后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长会议。中国政府未能意识到这次会议能对苏联和英美方面就国家制度和政治矛盾解决，或多或少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对莫斯科会议的准备及其工作，中国中央报刊的说明是极其不足的，而且企图千方百计贬低其意义。地方报刊称，莫斯科会议与中国没有关系，因为它解决的问题只是同反对德国战争的进程有关。在莫斯科会议召开前几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秘密指示，禁止所有报刊广泛讨论同中国问题有关的莫斯科会议情况和决定。同时，中国政府命令外交部次长傅秉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莫斯科会议的必要信息。与此同时，外交部代理部长吴国桢坦然来到莫斯科（会议未邀请中国参加），散布拟在莫斯科召开四国（苏联、美国、英国、中国）会议的消息。根据这个消息，会议将解决战争进程和欧洲、亚洲的战后制度问题。由于对自己感情的伤害，中国领导人不希望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他们不想同美国、英国和苏联接近，但莫斯科会议成功的结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和盘算，被迫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评

价。正如人们知道的那样，莫斯科会议除了其他决议外，1943年10月20日就公共安全问题通过了共同声明，中国晚些时候在这项声明上也签了字。同时，接受中国参加莫斯科声明的事实被中国中央报刊激化苏日关系所利用，中国一些主要报刊在声明公布后发表了挑拨性声明：苏联实际上已对日宣战，形势对中国有利。

1943年10月30日，我邀请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到使馆共进早餐，自然谈到了三国会议。他指出，重要的因素是美国、英国终于明白苏联作为国际因素的真正作用和重要性。现在没有任何人怀疑民主国家的胜利。涉及中国同苏联之间关系发展时，他说：对中国来讲唯一的道路就是同苏联一道为和平而斗争，战后加强合作，建设未来的世界。我对他的看法表示同意后，指出，我们两国应当成为挚友，这种友谊是建立在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困难岁月，对战后时期得到更加巩固有着重要基础。我同时指出，分析部分中国人士，特别是中国报刊的举动令人产生忧虑，因为近半年来在中国报刊上无论是就苏联政治制度，还是其他问题多次发表过反苏意见。我强调，特别令人担心的是重庆和新疆的报刊开始大量写到发展中国西北省份的必要性，而这种发展是以巩固这个地区的必要防御能力为目的。作为实例，我向王宠惠展示了一些在重庆和桂林用中文出版的反苏小册子。

这些情况我在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交谈时也提出过，并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群众被日益增加的反苏情绪利用：新疆地方当局对苏联公民的工作和苏联机构制造了难以忍受的条件，而新疆当地居民根据地方当局的直接指示反对苏联公民；出现大量恶毒攻击苏联的杂志，造成的印象是中国居民有意敌化对苏关系。邵力子指出，他感到非常乐观的是在那样黑暗的世界不去低头看这样的事实，按他的话说，他的乐观首先在于中国想成为苏联的军事同盟。他还对自己介绍苏联书籍的再版赋予了重要意义。邵

力子长期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所写的介绍苏联情况一书非常真实，具有许多优点。当我问到如何看待苏联同中国的军事同盟可能性时，邵力子回答说：那样的同盟实际上存在着。

1943年11月3日，我同立法院院长孙科进行了会面。像以往一样，交谈涉及了刚刚结束的莫斯科三国会议、前线的局势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前景以及苏中关系等问题。孙科了解了建设中苏文化协会文化宫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我曾答应设法搞到一定的资金来帮助解决建设费用，计划建设费用原来确定为100万中国元，后来是500万，而在同孙科交谈之前的建设费又确定为不低于1000万美元。那样的资金我们无法搞到，为此，我对孙科说，我们找不到那样的资金，这件事显然等到情况好转时再办。孙科同意了我的看法，并就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现在的积极工作谈了自己看法，其中，他请求为这个俱乐部提供放影机，我答应办理。

1943年11月15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邀请我共进午餐。他13日从美国返回，同时也去了伦敦，在那里会见了丘吉尔、艾登以及参加魁北克英美会议的其他国家要人。

宋子文本来对美国人就有好感，加上受美国人大量反苏宣传的影响以及同英国人、加拿大人的谈判冲昏了头脑，他与其妹妹宋美龄一样深信英、苏、美联盟的不坚实性，并在一定时期内崩溃。因此，在返回重庆后，他找到了同比利时、挪威、荷兰等国大使们吃饭的时间，而没有时间同苏联方面见面。显然，只是在孙科、邵力子和其他人士的劝告下，他邀请我共进午餐，佯装强调睦邻关系。

他对超长时间握着我的手而没感到难为情，向我说着好话，炫耀着英语知识。午餐摆放非常漂亮，桌子上备有法国葡萄酒，按他副手胡世泽的话说，这酒是给最亲近朋友准备的。宋子文千方百计地向重庆苏联外交官表现出自己的好意。

1943年11月17日，我同捷克斯洛伐克公使马涅夫斯基进行

了有趣的交谈。他谈到对中国非常有趣的新见解，其中涉及中国的政策。马涅夫斯基声称，苏联在未来恐怕会成为阻止中国向西侵略的挡箭牌。他说，中国人很倾向于对领土的要求，中国加入四大国行列，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同僚都被这一切冲昏了头脑。他强调，这种趋势会随着中国国际威望的上升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加强。

随着苏中关系的恶化，中国报刊就“新疆事件”日益散布着各种各样的诽谤性报道。苏联同日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秘密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满洲的日本军队似乎调往中国中部进行军事行动等。中国当局在苏联大使馆周围制造了不正常的形势。在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交谈时我就此指出，由于中国特务机关的无耻行为，中国人害怕拜访使馆，甚至大使馆的中方工作人员、《信息参考》的工作人员、教师和技术人员都害怕在使馆办公，因为中国特务们千方百计地恐吓他们。

1944年1月22日，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邀我前去喝茶，出席会面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作为翻译的卜道明中将。在通常的礼节性问候之后，蒋介石说：他认为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像一条链子上的环节，从整体上讲是对敌人的沉重打击。因此，盟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就统一战略达成了共识。

我指出，盟国会议已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唯一剩下的只有一项，就是真正地去作战。蒋介石继续声称，他得知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对中国的声明和整个讨论有关中国问题上起到了有益作用。蒋介石请我向斯大林转达他的谢意和对中国的肯定态度。

此后，蒋介石谈到日本问题时说：据他所知，日本军事当局现在从日本占领的中国中部和东南地区以及太平洋岛屿向满洲运送所有的机械、发动机设备和其他的军工品，这促使日本的航空工业在1943年大量生产飞机。据有关资料统计，飞机生产数量超过1942年的2倍。蒋介石说：他不想使盟国在评价日本军队战斗力

上出现错误的估算。

应当指出，德黑兰会议召开时盟国虽然认为中国是四大强国之一，但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蒋介石对此表示了不满。中国中央报刊对德黑兰会议的结果进行了广泛的评论，但这次同样也对挑拨苏联同日本关系没有放过，散布各种猜想和推测。这次会议似乎不光提到了有关欧洲战争问题，而且还讨论了太平洋战争问题。

1941年1月末，我邀请《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共进早餐。交谈是非官方性质的，我只是了解该报对苏联、波兰关系的立场。这个时期的中国报刊就苏联政府同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关系进行了各种的猜测。众所周知，这个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进行了反苏宣传。现在，当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国界，并在其领土上进行解放战斗，波兰流亡政府在所有派驻外交代表处的国家展开了疯狂的反苏活动，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向重庆的各国使馆和公使馆散发了所谓《信息通报》。

王芸生说，在波兰问题上中国人的政策首先以自己国家利益、中华民国的利益为主。他指出，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自1939年起就承认满洲国，并多次在国际联盟上为难中国，因此，《大公报》对这个国家从来未表示过好感和同情。这家报纸对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在1940年加入苏联的正义性表示怀疑，但对苏联政府对波兰伦敦政府的立场，以及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就恢复苏波格尔重边界谈判的可能性没有表示怀疑。王芸生直接承认，《大公报》工作人员对苏联在对待波兰问题态度上的宽宏大量立场感到吃惊。

中国政府在苏波关系上对待苏联坚持友好立场，1944年2月1日在我同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的交谈中得到了证实。他向我通告，重庆的波兰大使多次将苏波关系的各类文件捎到中国外交部，目的是在中国报刊上刊登，但一概遭到拒绝。他甚至还到中国外交

部就中国政府拒绝刊登有关波兰文件提出口头抗议。孙科还向我通告,在一次蒋介石出席的会议上,他就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完全明确地表明态度。出席会议的任何人,包括蒋介石在内对他的观点没有反对。孙科的声明再次证明了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波兰问题有良好的了解,不可能不拥护苏联。

1944年3月1日,我拜会了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并转交了斯大林给蒋介石为纪念苏联红军建军26周年贺电的回电。对收到回电表示感谢后吴国桢说,蒋介石给斯大林的电报是他本人亲笔起草的,表达了他对苏联红军的特别感情。

1944年3月22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就苏联空军在新疆东北地区侵犯中国领空一事向我提出声明。我向部长保证,我将根据他的声明将此事通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

1944年3月30日,我来到中国外交部,受苏联政府委托向宋子文做了如下声明:

根据苏联政府所掌握的可靠情报,自去年末以来,新疆地方当局将阿拉泰地区的哈萨克居民向新疆省的南部地区进行大量迁移。部分哈萨克人反对迁移,并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权在自己的领土上将这些哈萨克人做为难民接收。驻扎在新疆东北部地区的中国围剿部队追击哈萨克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从飞机上向这些难民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居民射击。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对入侵其领土的新疆军队予以回击。根据所述情况,我受苏联政府委托发表如下声明:如果新疆军队方面今后继续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苏联政府将根据1936年3月12日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的互助条约,为保护蒙古领土安全,向这个国家提供一切的必要援助和支持。

在口头声明结束后我向部长转交了书面声明。宋子文企图否

认这些,并说中国在新疆没有飞机。我向部长提醒到,盛世才有飞机,伊犁航校也有飞机。

1944年4月3日,宋子文对我的声明给予了正式答复,同时指出,驻扎新疆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进入蒙古领土,是为追击阿尔泰山区的土匪。他同时强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苏蒙1936年协定对中国来讲无效,中国政府不予以承认。

1944年4月10日,孙科通过叶甫根尼·陈的儿子佩尔希·陈打听同我会面的可能,我当时患病,认为在那样情况下不能同孙科会面。但1944年4月12日下午4点,孙科来到我的住所,我不得不接待他。交谈是非官方的,孙科声称,他不久前同蒋介石进行了交谈,提到了有关改善苏中关系的问题。当时,我也向他谈到苏联政府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我为此强调,一切并不都取决于我们。我向孙科解释说,苏联政府从来都是认真地研究中国物资经苏联领土中转问题,但由于战争原因,实际执行不是从来都可以的。后来,我谈到新疆事件并强调,盛世才和新疆政府其他人士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在中央政府内得到了一部分人支持。我指出了中国方面就签订联合开采独山子石油矿协定谈判失败的事实。我最后指出,在1943年里中国报刊经常制造中国公众舆论的反苏情绪,我提醒孙科,在我们的交谈中已经探讨了一些中国人士的那类行为。

孙科说,他非常理解我,他将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他向我提醒到,自1939年从苏联返回中国后,他做了许多关于苏联、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以及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支持与同情的报告和发言,他深信自己的演说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正确理解苏联起到了肯定作用。但他遗憾地指出,国内有一些人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有害的言论和行为同进行反对苏联的攻击是一样的。他同时强调,新疆督办盛世才无论在思想还是信仰上都是军阀。他把新疆变成自己的世袭领地,并在那里坚决破坏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孙科说,一

段时间盛世才冒充苏联的朋友，企图利用苏联的威信，而现在同苏联关系破裂，他又靠回中国中央政府，企图洗刷自己的罪行。孙科通告到，盛世才到重庆时他未能与其见面，他很了解督办的行为，并认为这种行为是有害和错误的。

孙科后来谈到，当得到乌兰巴托来的通报时，一些人怀疑蒙古居民点遭到空中射击情报的准确性。当人们问到军政部长何应钦时，他回答说督办好像是没有飞机。出现了谁也不知道新疆是否有中央政府军队的情况，在回答孙科提出的问题，新疆有多少中央政府军队时，何应钦回答的相当不明确。如果军政部长和中国军队总参谋长表现的那样玩忽职守，他怎么能正确判断新疆的局势和苏联立场。孙科指出，不光是盛世才和何应钦，外交部的主要工作人员也不好在哪里。他们以盛世才的情报为根据判断新疆的局势，完全没有其他的材料来源。显然，盛世才主观而又偏袒地解释事件，使中国中央政府对新疆所发生事件的真实性造成曲解。孙科声称，这一切都证实蒋介石政策的执行者们歪曲了他的指示，使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复杂化。孙科强调，所有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最主要是蒋介石努力改善中苏关系。其中，他表示希望延长1943年8月已经期满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或者签订一个时间为20—30年的新条约。孙科继续通告到，蒋介石准备在任何时候同斯大林会面，并完全明确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孙科请我就此转告莫斯科。

新 疆 问 题

1943年3月末，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来到大使馆观看了她非常喜欢的苏联影片《区委书记》。根据她的看法，这部影片非常好，只是中文字幕太小，中国观众不太理解。

她谈了蒋介石妻子一行访问美国的情况，此行的目的是蒋介

石制度在美国的宣传；还有丘吉尔邀请她访问英国和加拿大，似乎蒋介石的妻子也准备出访苏联。宋庆龄同时谈到了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美国顾问。除此以外，她还通告到，美国外交官，即美国武装力量总部在中国工作人员约翰逊·戴维斯汉语说的很好，受美国政府委托他准备去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戴维斯告诉宋庆龄，他准备通过专机为延安装运药品。

宋庆龄还谈到，中国政府通过自己的教师、官员、传教士在学生和居民的文盲中进行秘密的反苏宣传，散布指责苏联的谎言：苏联似乎企图吞食新疆，并好像同日本有秘密的条约，日本得以从苏满边界上撤出军队用来反对中国。

宋庆龄斥责了英国人。根据她的看法，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苏联是友好的。受到斥责的是英国驻重庆大使赛木尔和大使馆一等秘书盖茨。

谈到蒋介石的政策时她说，蒋介石对苏联是友好的，但像以往一样保持着平衡。

1943年5月11日，我拜会了宋庆龄，她谈到在中国执政当局内反苏情绪上涨。她强调，反苏情绪首先是英国大使馆给加的温。按她的话说，中国有人坚持那样的观点，就是强大的苏联作为中国邻居是危险的，因此当苏联反对法西斯德国出现明显的胜利时他们把自己的愿望投入到反苏情绪上来。她证实，中国政界人士越来越靠向美国，并在自己的政策中寄希望于他们。

中国执政当局政策的变化表现在中苏关系上：蓄意拖延在新疆飞机制造厂和石油公司建设问题的解决，对那里的改善状况不采取任何措施。

1943年5月17日，我就新疆飞机制造厂和石油公司的问题向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吴国桢递交了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讲到：大家知道，在乌鲁木齐建设飞机制造厂是苏联和中国政府共同协商

制定的，即在平等的基础上由苏中双方共同出资。但由于建设已经开始，而后来因不取决于苏联的原因同中国政府的谈判未达成协议，造成所有的建筑费用倒向苏联方面，这不在苏联政府的预算之内。由于中国政府方面后来没有提出建设飞机制造厂的问题，1943年1月22日我向外交部长宋子文声明：莫斯科有同中国政府就飞机制造厂问题进行探讨的想法，如果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同意的话，苏联政府将就这个问题同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尽管这项声明过去了近4个月，我却未得到中国政府对此项建议的答复。当时，我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及外交人民委员会的通报中得知：新疆当局开始加以阻挠，造成飞机制造厂不能正常工作。例如，禁止商贩向工厂出售食品，阻碍招工和向工厂运送物资等。除此之外，虽然督办以前为工厂提供的土地是无偿的，但新疆政府要求工厂对土地的征用付款。

根据以上情况，苏联政府决定停办飞机制造厂，从新疆召回工人、行政技术人员，并且撤走设备、物资和技术资料。

至于独山子石油公司，苏联政府说明了自己的建议，我于1943年1月18日向中国政府转交了协议草案。苏联政府提出的石油公司建议是从符合苏联和中国方面利益平等的条件出发，是公正的。因此，该项建议是两国签订协定的最合适文本，但中国方面对石油公司的建议草案包含着不平等的条件，妨碍了苏联方面在石油公司管理上的权利。

新疆政府明知苏联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非但没有在石油公司停止暴力和违法行为，反而加剧了这样的行动，使公司不能进行正常工作。石油公司中方管理处采用强制手段阻止向苏联机构提供燃料，停止汽车修理，查封了从苏联运来配件的仓库；对公司苏联工人制造不能忍受的条件，有意识地向他们提供不好的伙食，公开指使新疆工人反对苏联专家，向苏联公民采取暴力行为。

苏联政府多次向新疆省政府提出声明没有任何效果，新疆督办盛世才企图利用这些中国中央政府不知道的事实为依据来掩盖自己的行为。

新疆当局方面的以上行为迫使苏联政府决定停止在新疆的石油开采和加工工作，召回专家，撤走设备。苏联政府对飞机制造厂和石油公司采取的决定，自然是考虑到在战争条件下这些企业的设备、材料及专家可以用在比新疆更急需的苏联角度出发的。我的备忘录就是这样的内容。

了解了备忘录内容后吴国桢非常不安地说，这方面问题应当以中苏友好关系大局来解决。

1943年5月24日，我再次拜会吴国桢并向他声明，根据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得到的情报，新疆省对苏联政府关于撤回专家和设备的决定进行了百般阻挠。石油公司冯经理直接声称，他有不放行设备离开石油公司的指示，他将制止与此有关的所有行为。根据冯的指示关闭了油库，并派来了警察，造成运送设备的汽车没有燃料。除此之外，对苏联专家采取了流氓行动，1943年5月15日，苏联汽车在乌鲁木齐市12公里以外遭到众枪袭击，类似过格的举动威胁了苏联专家的安全和贵重设备的完善保存。受苏联政府的委托，我请求中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迫使新疆当局的挑衅行为立即停止，为顺利撤走设备提供可能，为苏联专家撤离新疆提供安全保障。听完我的话后吴国桢说，既然苏联政府决定从石油公司撤走它目前自身需要的设备，中国政府准备好就此向苏联方面提供帮助，他保证就此汇报给自己的政府。

1943年5月25日吴国桢通知我，根据我昨天有关石油公司局势的声明，中国政府给新疆督办盛世才发了急电，要求对独山子石油公司的苏联职员和设备的撤出给予应有的协助。他补充说，给盛世才的指示包括保证离开新疆苏联公民的安全。

1943年6月16日,我在蒋介石的城内官邸拜会了他,并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就新疆问题向他做了如下声明:苏联政府委托我向您详细通告,苏联政府就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新疆的局势而被迫采取了以上决定。同时,我已向中国外交部长通告了新疆当局对苏联专家和机构进行迫害和刁难的情况,以及苏联政府对此采取的相关政策。在1942年7月16日我们的交谈中您说,将指示盛世才支持同苏联合作,尊重苏联代表。过去的时间证明新疆当局没有按照您的指示和相关结论去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改变自己的路线,相反更加使苏联专家的到来和在新疆的苏联机构的工作复杂起来。例如,新疆当局百般阻挠乌鲁木齐飞机制造厂和独山子石油公司的正常工作,关于这个问题,1942年5月17日受苏联政府委托,我已向吴国桢先生进行了通报并递交了备忘录。

新疆当局对苏联贸易机构的活动进行了百般阻挠,对当地商贩同苏联贸易机关签订合同制定了限价,提高了关税;对苏联新疆贸易公司的贸易活动收取税赋,使公司未来的经营明显亏损;大批逮捕贸易机构的当地无辜职员,人为地为苏联贸易工作者在新疆省的往来制造困难。

根据新疆省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多年来向这个省的卫生、经济发展和道路建设领域提供了援助,但尽管如此,最近还是对苏联专家制造了不能够容忍的条件。苏联政府对新疆当局类似行为不能容忍,被迫采取以下措施:

- 1、停办在乌鲁木齐的飞机制造厂;
- 2、从新疆撤回苏联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撤走苏联设备;
- 3、停止在独山子石油开采和加工工作,召回专家并撤回设备;
- 4、减少苏联贸易机构在新疆的经营;
- 5、撤回在新疆的其他苏联专家。

新疆当局企图在一系列情况下阻碍这些措施的实施,采取了

2022年7月11日

专断暴行,新疆当局这些敌对行为的具体情况我已通报了中国外交部长。根据从乌鲁木齐得到的情报,目前新疆当局敌对行为的次数变少了,但不能认为是情况的好转,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馆将继续采取相应措施。我受委托向您提出本声明的目的是让您对苏联政府的这些措施和原因有个正确的了解。

蒋介石听完我的声明后说,新疆当局对苏联代表和苏联专家的态度必须改变,中国中央政府下令新疆省政府对声明中提到的地方当局的行为今后不允许重演。蒋介石请我转告苏联政府,今后让苏联乌鲁木齐总领事同中国中央政府驻新疆的外交代表保持直接联系,所有的问题向他提出。他认为,如果总领事不是和盛世才接触,而是和外交部的代表,那么事情会好许多。我回答说,我将尽快向我的政府汇报他的愿望。

1943年10月8日,我拜会了吴国桢,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请他转交给蒋介石苏联政府对新疆紧张局势的声明。在声明中我远没有举出新疆方面反苏挑衅的所有例子,其中包括逮捕苏联公民;警察和其他人员攻击苏联工作人员,拒绝向苏联公民提供必要的生活食品等。特别出格的是,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哈密机场被扣押,他们不能购买到重庆的机票。

1943年9月22日,在向中国外交部和交通部转交我的报告时,我同交通部长曾养甫进行了交谈。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多次向中国外交部驻新疆政府全权代表吴泽湘进行交涉,但毫无结果。因此,受苏联政府委托我请蒋介石对新疆省政府和中国外交部驻新疆代表做出相应的指示,命令新疆当局停止对苏联公民和机构的挑衅和歧视行为,惩罚其责任者,释放被关押的苏联公民。

新书选介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邓力群著。作者自建国前夕即开始为刘少奇做秘书工作，与刘少奇一起参加会议，作调查研究，聆听了刘少奇的许多指示和讲话。本书是作者根据这些经历，对刘少奇参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活动，特别是党的八大前后，从反冒进到庐山会议，从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回顾，并对建国前刘少奇在白区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再认识。全书 11.2 万字，1998 年 10 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李雪峰回忆录》：本书是作者对其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回顾。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记述了 1937 年 10 月至 1947 年 11 月作者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亲自参加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详细过程。下卷记述了建国后亲历的重大事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些情况。本书资料丰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全书 40 万字。上卷已由中央党史出版社于 1998 年 9 月出版。

《万毅将军回忆录》：该书是作者 1925 年参加东北军至 1997 年 70 多年革命生涯的回顾与思考。万毅作为张学良东北军最年轻的团长、林彪东北第一纵队司令、聂荣臻开创“两弹”事业的助手，亲历了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他在书中回忆了“郭松龄倒戈”、“西安事变”、“九二二锄奸”、“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北平和平解放”、“庐山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全书 21 万字，1998 年 11 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十年论战》：1956 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中国和苏联两大盟国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开始了论争，最终导

致两国关系破裂。吴冷西作为《人民日报》社负责人,亲历了这场论战。他在本书中回忆了中苏论战的全过程,披露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全书20余万字,近期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作为这次转折的见证人,于光远在本书中追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为之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全过程,介绍了这两次会议的具体情节和思想背景。全书25.5万字,1998年11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1998.10):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党的文献和其他原始材料,编写了这本大事记。全书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前夕”、“从党的十二大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三部分,从党的重大决策的出台、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改革开放历程、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对外政策、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党史工作者、干部群众学习研究新时期历史和邓小平理论的工具书。全书40万字,1998年1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刘少奇冤案始末》:本书详细记述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设立专案组,诬陷、迫害刘少奇的过程,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经过。作者黄峥长期从事刘少奇研究,在书中使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内容丰富,史实准确。全书14万字,1999年4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